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37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北京 1929 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新燕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8.875 印张 170 千字

199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500 册

ISBN 7-80023-268-9/K·288

定 价：3.50 元

目 录

文 献

皖南事变文电选..... (1)

回 忆 录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 张崇文(37)
创建东北根据地的群众工作 张秀山(49)
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的回顾..... 刘 春(68)

人 物 介 绍

项英传略..... 王辅一(105)
罗瑞卿传略(下)..... 黄 瑶(154)

专 题 资 料

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 王素园(205)

东北军学兵队简史…………… 学兵队简史编写小组(234)

史实考证

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左纵队全部

经过了青海班玛地区…………… 张世华 索南(261)

中共组织史资料

五大至六大期间山西省党的组织状况…………… 赵 朴(267)

读者·作者·编者

《平津唐点线委员会》补遗…………… 安 捷(276)

皖南事变文电选

编者按：今年是皖南事变50周年。我们选了一组我党有关皖南事变的文电，同时还选了一组国民党方面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电作为附录一并刊出，供研究参考。

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朱彭叶 项复何应钦白崇禧佳电

(1940年11月9日)

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剑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①两公钧鉴：

两公皓（十月十九日）电，经叶参谋长转到奉悉。当以事关重大，处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往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兹特呈复，敬祈鉴察，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祇遵。

（一）关于行动者。职军所有部队，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四年以来，抗御众多之敌

^① 健生，即白崇禧的字。

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明令所嘉奖。即如此次华北百团大战^①，自八月号（二十）日开始以来，已历两月有半，现方进入第二阶段。曾奉委座明令，勗勉备至，全军感奋。又如皖东皖南战役，粉碎敌之进攻，亦属最近期间之事。凡此所陈，非敢自矜劳绩，实欲以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实贯彻于全军之上下，而未敢有丝毫之乖离也。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之一部分发生齟齬事件，如尊电所指者，言之至堪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德等早经迭次陈明在案。最近苏北事件^②，德等已有马（二十一日）电详陈委座。鲁南事件，亦有复杂原因，深堪注意。除令该地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拟请中央选派公正大员，予以彻查，如属咎在职军，德等决不袒庇，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如属咎在他方，亦祈按情处理，以明责任。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事理之正，贵得其平。况在艰苦异常之敌后抗战，多一分磨擦，即多一分困难，自非不顾大局专以磨擦为能事之人，未有不愿消弭纷争团结对敌者。故德等主张彻底查明其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倘承俯允，乞赐施行。

①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大规模战役。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给敌伪以沉重的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的威望。

② 苏北事件，即黄桥战役。1940年10月初，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15000余人向苏中黄桥新四军进攻。新四军陈毅、粟裕部遵照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联络友军和开明绅士，同时坚持自卫原则，集中主力予来犯者以迎头痛击，歼灭韩部11000余人，国民党顽固派将这次失败称之为“苏北事件”。

(二)关于防地者。中央提示案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委座庐山谈话及告沦陷区同胞书中所示，彼等又正衷心遵循，毫无违异。忽令离乡别井，驱迫上道，其事甚惨。自平江惨案^①、确山惨案^②发生后，新四军后方各处，如赣南、闽西、湘赣边区、鄂东、皖西、豫南等地，其家属及留守人员，横被摧残，毫无保障。今又欲华中各部北移，彼等甚惧覆辙相寻，故无不谈虎色变。又况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树叶为粮，道殣相望，该地军民已甚感维持之困难，有请南移者，有请他调者，德等方勉为抑止，告以苦撑，实亦甚难容纳其他之部队。以此种种，故请恩来转陈中央，请予允许大江南北各部，仍就原地抗战。一俟驱敌出国，抗战胜利，自当移动，以就集中之防地。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輿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

① 平江惨案，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杨森部包围新四军湖南平江通讯处，残杀干部涂正坤、罗梓铭等6人，这一惨案激起广大人民的愤怒，延安各界人士举行集会并通电全国强烈抗议。

② 确山惨案，也叫竹沟事变，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特务和军队1800余人，围攻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惨杀抗日受伤的新四军干部、战士和家属200余人。

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德等对于此事，深用腐心。欲顾全地方，则恐违中央之命令，欲服从命令，则恐失当地之人心。而抗战胜利，全赖人心之归属，两公高瞻远瞩，必不河汉斯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此则德等肺腑之言，深愿为两公一吐者。两公虚怀若谷，全局在胸，必能维持调护，挽此艰难之时局，固不待德等多言也。

(三) 关于编制者。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联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因而于敌后凡有敌寇而无友军之处，于驱除敌寇之后，建立抗日政权，创造抗日根据地，以民众之衣粮，给民众之武力，御凶残之敌寇，卫自己之家乡，诚有未可厚非者。虽衣单食薄，艰难奋战，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则精神痛苦，无以复加，故有请中央允予扩充编制之举。中央亦为顾全事实起见，允予酌为扩编，如提示案内所示，职军闻之，实深庆幸。兹所求者，则请早日实行，并请对编

制额数，酌予增加，以慰前线将士之心，亦为国家培养一支可靠之抗战力量。非第楚弓楚得，无庸怀轩轾之心，实以卫国卫家，正赖此干城之选。

(四)关于补给者。敌后艰苦，具如上述，而子弹与医药用品等件，尤为缺乏。职军已14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虽明知中央亦处艰难境地，然职军之特殊困苦，不得不上达聪听，以求于艰难之中，获涓埃之助。其他补给各项，均增列款上陈，敬求一并核示。

(五)关于边区者。陕甘宁边区23县一案，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遭，驻屯大军20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职军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曰大举进攻，即曰准备妥协。德等闻之刺耳，辩之焦唇。良以悬案未决，又加封锁，空穴来风，猜疑易启，亦无怪其然也。理合恳请中央，对于悬案则予以解决，对于封锁则予以制止，释军民之疑虑，固合作之根基，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

(六)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德等认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盖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持久之形势已成，日寇正忙于应付太平洋严重局面，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

中华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领袖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鉴于近月以来，国际国内之各种阴谋活动，诚有不能已于言者。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召分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遵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之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
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同叩佳〈九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
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节录）

（1940年11月15日）

一、根据中央11月7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九）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二、蒋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因此我要积极准备自卫。（略）

三、如我各方面做得好，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虽然我们决不应该估计蒋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这是决不会的），并且还要准备对付投降夹击的最黑暗局面。以上意见请考虑酌行之。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关于可以拖一两个月但须认真
准备北移给叶挺、项英的指示

（1940年11月21日）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

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
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开动完毕致叶挺、项英

(1940年11月24日)①

- (一)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 (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
- (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
新四军立即分批移动致叶挺、项英

(1940年11月24日)②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与资材势必被打散。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② 11月,系编者根据叶挺、项英11月27日给毛泽东等的报告判定的。

叶挺、项英关于部队集结后视情全部走苏南
或一部就地北渡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1940年11月27^①日)

敬〈24日〉2时敬〈24日〉两电同时收到。

(一) 我们正准备北移一切必要措置，但无论如何要在12月底才能完毕开动。

(二) 工作人员及资材先行北上，大部过苏南走，小部由皖南渡皖北。

(三) 部队渡〔随〕后集结，看那时交通情况，或全部走苏南或把一部就原地到皖北。

(四) 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假若是队伍既未到苏南，又已离皖南，在半路上要战斗，则颇不利，但如有何变动，来的快时，则请毛〔无〕须顾虑。我们就在皖南打，资材与人员的损失是顾不了的。如何盼立即复。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同意新四军
由皖东分批渡江致叶挺、项英

(1940年11月^②29日)

感〈27日〉酉电悉：

① 根据中央收电原注“前2百字27日收到，后百多字今天28日才收到——机器坏了”判断为27日。

② 11月，系编者根据叶挺、项英11月27日向毛泽东、朱德的报告判定的。

- (一) 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
- (二) 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叶挺、项英关于部队大部由皖南秘密渡江
报毛泽东、朱德等

(1940年11月^①29日)

(一) 顾已下北移命令为经过苏南转苏北，其内容与希夷见顾时交下参谋处签呈(已转延安)完全相同。

(二) 在命令未下前我再电补充要求顾复下一补充命令：

(甲) 准先发10月、11月经费及6万代金(约30万元)。

(乙) 多划了一条交通线，于泾县出发时可两路前进，并添了一个临时集结地，在溧阳、溧水、高淳交界处。

(三) 我明天开始设兵站，由泾县至竹箐桥与二支队联络，即运动资材及工作人员。

(四) 再电顾要求12月、1月、2月经费开拔费并弹药等。

(五) 我们致顾的电分致上官云相。上官复电谓：吾辈

^① 原件无年月，根据毛泽东、朱德11月30日同意叶挺、项英行动布置的电文，判定为1940年11月。

相见以诚，为国家民族百年大计，自当相助相谅，绝无丝毫意气存在，耿耿此心可赐天日。

(六) 我们决心目前公开走苏南，兵力留后集结，大部密渡皖南，一切完毕仍在年底。

(七) 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渡后。因我大部过皖北则云逸^①、炳辉^②处可稳定，即雪枫^③处亦可遥为声援也。乞复。叶项艳（29日）酉。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朱德关于同意 29 日所报 行动布置致叶挺、项英

（1940年11月30日）

(一) 我们 29 日的布置很对。

(二) 苏北动作不得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以便隔断韩、霍^④，打通苏皖。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三) 日蒋决裂，日汪^⑤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① 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

② 炳辉，即罗炳辉，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第五支队司令员。

③ 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④ 霍，即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一二师师长。

⑤ 汪，即汪精卫。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项英关于目前很难迅速北渡
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致刘少奇

(1940年12月13日)

(一) 军部之重要资材 1300 担，工作人员千余，自寝(26)日起分开苏南，约筱(17)日到达路南，陆续穿插封锁线北运。

(二) 部队在皖南积极教育待命。

(三) 因国民党到处密〔散〕布我军北移，已使敌注意，到处增加兵力严密封锁。

(四) 到皖北道路，敌与顽均在沿江增兵筑工事，大部渡江困难，仅可偷渡一部还要等待时机。

(五) 苏南情况更紧张，如封锁线均增加日军，穿插甚不易。

(六) 因行动已定，消息又已吐露，无法保守秘密与突然行动，则应再延一时，待敌戒备稍弛，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渡。

(七) 战区仍以我军先行北渡再发各种费用，对子弹置之不理，还在交涉中。我们的态度不发饷弹即不开动。我们行动应如何，请电复。

(原件存南京军区档案馆)

中共中央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 部署给叶挺、项英的指示

(1940年12月14日)

(一) 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须注意警戒。

(二) 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

(三) 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

(四) 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

(五) 关于小姚^①行动，以苏南游击区是否便于指导东南各省为断，如有此条件，以随曾山^②去苏南为有利，如不可能，则去江北。

(六) 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③小姚负责指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① 小姚，即饶漱石化名。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② 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

③ 周子昆，当时任新四军副参谋长。

刘少奇、陈毅关于日军增兵扫荡
皖南新四军只能一部移江北，大部经苏南
致项英并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1940年12月14日)

由于国〔民〕党故意在各方宣布和宣传我军北移，使日寇近日在江南各据点及封锁线增加大批日军并进行扫荡。先从无锡、武进、丹北一带扫荡，还更扩大到金坛、句容、丹阳之间地区。同时，天王寺、薛埠、金坛现均增加大兵，拉夫甚忙，有向西扫荡可能。在丹武间我指挥部受包围，损失甚大。路北情形尚不明，但我军大批资材及人员已到路南，有被扫荡危险。江北敌人已在三支附近据点增兵。最近飞机在我地区不断侦察，曾于不久前在沿江之沙洲实行扫荡一次。桂军已在对岸之一口岸筑工事，抢夺我收集之一部分船只。故此种情况如继续发展，实有碍我军之转移。全军由江北转移，据各方考查恐难做到。将来只能以一部移江北，大部还须经苏南。因渡江一次最多只能渡一团多人，不能继续偷渡；如再滞一时，但又碍于顽军在后夹击。如无此顾虑与危险当可分批偷渡，不过顽军绝不会让我如此转移。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朱德关于
向蒋介石交涉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
致周恩来、叶剑英

(1940年12月25日)

据项英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速告结果：

- (1) 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
- (2) 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
- (3) 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
- (4) 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
- (5) 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
- (6) 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刘少奇、陈毅关于向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
要李品仙撤兵让路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报告

(1940年12月25日)

我江南部队准备即日北移，因国民党人大肆宣传，致敌已增兵封锁扫荡，渡江困难，而李品仙又派三个师进至桐城、合肥、无为地区，控制长江北岸渡口，扣留船只，并向我在无为部队进攻，声言要消灭新四军于江北，致我军无法北渡。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令李品仙让路，撤兵至无为、庐江以西，并准我北渡。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
渡江仍应戒备以防袭击致叶挺、项英

(1940年12月27日)

漾〈23〉日区寿年^①致莫德宏称：“为欢送江南之新四军开黄河北抗战复土起见，兹指定经过路线为平汉线南段，沿长江北岸某某路之线，除呈报中央及长官外，请各转令知照。一面务使豫南、鄂东所部官兵与各地民众周知为要，等因，仰各遵照”等语。但新四军渡江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一面请周、叶向蒋交涉，下令李品仙不得在巢、无、

^① 区寿年，当时任国民党第四八军军长。

和、含地区妨新四军北移为要。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刘少奇、陈毅关于皖南新四军速经苏南
分批北移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

(1940年12月30日)

一、我有很多电报给叶、项，请他们速下决心北移或东移，至苏南再北移，但他们仍无决心。

二、现在情况因桂军控制庐江及无为西部数渡口（盛家桥、黄姑闸）及江边渡口，又在梁圆、古河筑有百余里封锁线，由无为东部过淮南路，因要过河数道，亦甚难，故江南部队仍以速移苏南，再设法分批北移较为安全。

三、望你们下决心电告叶、项，即移苏南，否则他们决心很难下，愈迟疑将更困难。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
应分批经苏南北移致叶挺、项英

(1940年12月30日)

据恩来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四县恐不易；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新四军军部关于决定全部经苏南北移
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并致刘少奇、陈毅

(1941年1月1日)

最近情况与我们行动：

甲、自我抗议电以后，顾即复电解释并非改道而且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至苏南，顾复电只允一个团，主力仍经江北。

乙、战区联参于世〈31〉日晚赶到军部商量要求，其意20万款、10万子弹可办到，今早又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

丙、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并增七九师、四〇师到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估计彼怕我先动来缓和，同时也怕我到苏南久据。

丁、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巡逻，少数人也不能偷过。

戊、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态势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迫击，即用战斗消灭之，如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己、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毕了，中央如有指示请于明日(2号)，最迟3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怕难。请转告周、叶。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朱德关于同意皖南新四军
立即开往苏南致叶挺、项英

(1941年1月3日)

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关于中央决定对蒋介石
发动政治上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

(1941年1月15日)

(一)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

(二) 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

(三) 中间派孙、冯^①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坚决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四) 顾祝同称：“新四军在各地之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仓库、修械所及一切非法组织一律封闭，武装解除，人员扣留”等语，令上官云相执行，上官此次消灭叶、项是很坚决的。

① 孙、冯，指孙科、冯玉祥。

(五)上官云相元〈13日〉未称：“鹿角山、东流山，凤里溪、李村一带之匪，元〈13〉日被我击毙俘虏者共7000余人，残匪千余仍在原地挣扎，限于14日午后1时前，彻底肃清。”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谈话

(1941年1月18日)

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兴，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三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环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该军在鄂中之李先念支队，被程汝怀^①等攻击多次；在苏南之陈毅支队，迭受冷欣压迫；在苏北之管文蔚部，则受韩德勤压迫；在皖东之罗炳辉、淮北之彭雪枫部，则受李品仙压迫。该军和平江、在豫西之后方留守人员及受伤官兵，则迭被惨杀，曾发生有名之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即该军参谋长张云逸之

^① 程汝怀，当时任国民党湖北省第二区保安司令。

老妻幼子，亦被拘捕。此皆过去数年之事实，昭昭在人耳目者。近数月来，更变本加厉，苏北、皖东、鄂中各地，大举进攻，名曰剿匪，江淮一带，早已闹得乌烟瘴气。不宁惟是，去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之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副司令及新四军叶项军长，不顾事实，强调所谓军政、军令，勒令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朱彭叶项为顾全大局起见，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是以有佳电之答复。至12月底，新四军叶军长等，业将移动部队准备就绪，正欲开动之际，不意国民党各地言论机关，公开宣布该部北移消息，实际上不啻向敌人告密；同时即闻当局已对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袭击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语。然外表则说已令各部协助通过，决无留难云云。叶军长等以言出负责当局，料可置信，乃于本月4日毅然开动，计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共约万人。不意甫经开动，即遭袭击，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村地区，即突被五二师唐云山、一〇八师戎纪五、七九师段茂林、一四四师范子英、四〇师詹忠言、新七师田钟毅，第十师王劲修等7万余人，统受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分进合击，大举进攻。叶军长等一面仓促应战，且战且走；一面电告当局，质问理由。乃当局在该部被围血战七昼夜中，始终佯称已电顾祝同询问真相，并诡称已令顾氏撤围放行，实则密令各部实行其聚歼计划。至13日，激战已八昼夜，我遵令北移遭遇袭击之新四军，果已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已达当局聚歼之目的矣！至昨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正式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

直认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歼灭，又谓该军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在逃，正缉获中，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等语。一篇堂皇文告，已将其阴谋消灭抗日部队之真面目，赤裸裸的表白于全国人民面前。事有凑巧，正是17这一天，日本同盟社亦从南京发出了一个惊人电讯。该电略谓：“重庆政府严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之共产军，于12月26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使共产军早日移往江北，遂开始在东流附近围攻新四军及共产军各军队，共产军一部已于10日由荻港附近溃退江北。自14日以来，日军各部亦攻击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国民政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至此，一幕消灭抗日武装摧毁异己力量之大阴谋惨案之真实内容，乃益大白于天下。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所谓军纪国法者，不过于聚歼之后，尚有宣布叛逆交付审判之一套而已。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新四军为抗日部队，北移乃遵令行动，乃竟遭围击聚歼之惨变，军纪何在？国法何存？盖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实已无置辩之余地。

当江南新四军惨被袭击歼灭之际，当局复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共2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之新四军，所谓一网打尽之计划，固不仅限于江南一隅而已。同时，在西北方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者，亦有军队20余万。西安特务机关对八路军办事处除实行封锁压迫外，竟于前数日将办事处挑水夫绑去，逼其回去在水内

施放毒药；桂林军警机关则压迫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至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则早已事先调查名单，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大概快要下手了吧！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此等为敌张目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和全世界主张正义之人士，亦绝对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我们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以达到下述各项目的：

（一）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

（二）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

（三）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

（四）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

（五）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

（六）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

（七）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

（八）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

（九）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

我们深信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战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前面，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大多数军民同胞深知在此艰危时局中，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置。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附录〕 国民党方面关于皖南事变的一组文电

国民党军一七六师奉令阻击 皖南新四军渡江北移的部署电

(1940年11月10日)

给指挥所各团长参作灰(10日)电：极机密。奉总副座机兰佳(9日)午电开：虞(7日)电转何总长副总长江(3日)申令计达。惟江南之匪，由三战区实施进剿，其必向江北无为一带渡江，我一七六师应准备以主力阻止其渡江，应逐步肃清江北之匪军为要等因。兹决定部署如下：(一)着陆团以一营分置庐江及盛家桥与张仁中大队及周团在开城桥之营协力防堵，银屏山及巢湖匪军，陆团亲率所部(缺一营)并指挥本部防御，战车炮排、庐江自卫两中队、唐支队第二三两大队，以疾风扫落叶之手段，迅速将牛埠、土桥、厌河、六百丈等处附近之匪，彻底肃清后，以一部在沿岸要点警戒，以主力控置于适宜之机动位置，乘

渡江立足未定而击灭之；（二）陆团（其余两营仍服原任务）以一营，于元（13）日前，开至黄泥河附近，仍归指挥所直辖，策应剿匪部队之作战；（三）陆周两团，防止匪军北渡之区域，由王家套（老洲头以西）至胡家沟之间，归陆团长负责，由胡家沟至无为东南长江沿岸，归周团长负责，两团务须切取联络，确实协同；（四）指挥所无线电班，暂归陆团长使用，另由本部派无线电班到指挥所工作；（五）怀望之敌，当匪军北渡之际，有乘机进犯可能，各守备队务须严密戒备；（六）陆团长须注意一面清剿，一面与各县政人员协力健全基层行政机构，以杜匪源；（七）陆团长须于文（12）日出发。合电，希查照并仰各遵照，仍将奉电日期及遵办情形随时报查为要。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何应钦关于“解决”江南新四军 给徐永昌的亲笔函

（1940年12月3日）

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N4A^①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

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① N4A、英语 New fourth Army 的简写，即新四军。

何应钦 12、3、

本案请照上意速签呈
委座核示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李品仙奉蒋介石命令部署
防堵新四军北渡给四八军的两份密电

(1940年12月4日与24日)

一、12月4日

收总副座机兰冬(2日)辰一电

△密。奉委座令一游电开：据报新四军长江南北两岸联络线及其登陆地点计分六处。一、繁泥线，由繁昌县属之沙洲镇渡江，至北岸无为县属之泥汊镇登陆。二、无刘线，由无为县属南岸舒家坝渡江，至北岸刘家渡登陆。三、无凤线，由无为属南岸观音阁渡江，至无为北岸凤凰颈登陆。四、无胡线，由无为属南岸坨沟渡江，至北岸胡陇登陆。五、铜新线，由铜陵县属坝埂头渡江，至北岸无为县新沟登陆。六、铜土线，由铜陵小湖洲江埂章家仓渡江，至北岸土桥登陆等情，特电知照等因，仰各知照，并仰苏军长^① 飭为注意防堵为要。

二、12月24日

收总副座胥(20日)未参一电

^① 苏军长，即苏祖馨，当时任国民党第四八军代军长。

△密。据孙特派员福安灰（10日）午秘电称：（甲）匪兵现在江南整兵，并拟由旧县^①等处撤至江北。又江北匪军于泥汊、姚家沟沿江港汊架浮桥以备会合前进，已通知周团严防并破坏其浮桥等。匪军声势浩大，恐周团兵力不敷分应付，可否加派得力部队堵截，以免势成燎原。（乙）江南敌军见匪军大批集合，已由大通派来400余人驻扎文兴洲等处，建筑工事防御匪军，并于沿江停泊兵舰汽艇多只等情，仰各知照。仰郑师长严密戒备为要。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徐永昌关于拟即下达“剿灭”

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令第三战区届时彻底
扫荡新四军报蒋介石鉴呈

（1940年12月10日）

签呈 29年12月10日

事因：为使各部按照预定计划准备，不致受匪伪各个击破，拟即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以命令下达，并令第三战区届时彻底扫荡江南匪军由。

一、11月14日拟呈之“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奉钧座12月7日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等因：自应遵办。惟查展缓期限为12月31日止。

^① 旧县，即今繁昌新港。

现已届 12 月中旬，如迟迟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因汤部尚平汉以西，其他李品仙、孙桐萱^①各部，均在原防未动，即到达预定之地点亦须相当时日。又苏北匪军现已先发制人。为避免国军被其各个击破，及声援鲁苏，立于主动地位计，均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计现在下令至实施扫荡，进入鲁苏时机，当在 12 月底以后，与先期下达命令断无抵触也。

二、观察江南 N4A 行动，仍不外推托延宕，且现在距 12 月 31 日之时期不久，该军是否能遵命北渡长江，尚成问题。此时仍应即时下令第三战区，妥为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攻击兴化，或届时（12 月 31 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 N4A 立予解决。

右二项是否可行，仍乞
钧裁示遵。谨呈
总长何 转呈
委员长蒋

职 徐永昌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① 孙桐萱，当时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二军军长。

蒋介石命令“解决”江南新四军
给顾祝同的密电

(1940年12月10日)

特急(有线加表)。上饶顾长官：△密。(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三)右二项仰即遵办具报为要。中^①。灰(10日)酉令(游印)。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国民党第三二集团军围歼皖南新四军计划

(1940年12月29日于宁国万福村)

方针：

一、集团军遵照司令长官顾祝同(20日)午攻召代电暨宥(26日)未攻召电之指示：以策应苏鲁友军作战，决先扫荡苏南皖南一带匪军匪党为目的，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

① 中，指蒋中正，即蒋介石。

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

进剿开始时日另有命令。

指导要领：

二、封锁长荡湖至固城湖间及泾县至马头镇间匪军行军路线，确实隔断苏南皖南匪军之连系，并肃清各防区内及沿途残留匪军与其秘密组织。

三、苏南方面严密守备现阵地。肃清防区内之残匪及其诸设施。

四、任皖南方面进剿队，应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翟、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联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并防其以各个击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汇〕、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

五、攻击开始后，随战况之进展，逐步扼要构筑碉堡，严密封锁，一面继续向旧县、荻港、坝埂头江岸压迫之，一面配合党政扫清残匪，安抚民众，救济农村，恢复原有区乡保甲组织，推行政令。

六、第二线部队于攻击开始后，协同党政机关迅速肃清驻地附近匪党及其秘密组织，并随时保持机动。

部署大要：

七、第二游击区兼总指挥上官云相、副总指挥冷欣，指挥第八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三师、独立三三旅，挺进二纵队及苏南地方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肃清防区内匪军

匪党，并适当控置机动部队，防止该方面匪军为策应其皖南方面作战向我袭扰或暴动等行为，并于适当时机扫清在郎溪至竹箐桥之匪军兵站及其秘密工作人员，截断匪军苏皖交通，忠义军须准备一个团以便于必要时立即分路派出，清扫郎溪至孙家埠间匪军之兵站及秘密工作人员。

八、剿匪右翼军指挥官第二五军军长张文清，指挥第二五军（欠四〇师）附炮一团第二营（欠五六两连），应以一部担任宣城方面之守备，主力与左翼军确取联系，展开于南陵、泾县永济桥、丁家渡之线向戴家会〔汇〕、三里店、汀潭附近匪军攻击，尔后向繁昌方面追剿。

九、剿匪左翼军指挥官副总司令刘雨卿，指挥第四〇师、第一四四师、新七师之第二旅、附炮一团第二营第六连暨战炮总队直属第四营（欠十五连），展开于湾滩、茂林村、苏口、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向云岭、何家湾、沙土角（戴家会〔汇〕西北四公里），各附近匪军攻击而占领之，尔后与右翼军协力向旧县，荻港，坝埂头江岸追剿。

十、第七九师位置于太平石埭间，六二师位置于榔桥河、三溪镇间，随时保持机动。

十一、第一线各部队，务于到达位置后立即完成必要之工事，并即派队占领附近主要山峰，截断或堵塞通敌道路，配备守兵严查行人或断绝阵地前之交通，并多派侦探于远方，一面与友军妥密联系。

十二、各部于未奉攻击开始命令之前，应取防守姿势，并竭力避免冲突。

十三、第二线部队，务竭力准备须能随时立即出动，以

便追剿与应援。

作战地境：

第十集团军 } 焦村一小百店一障吴村一张芝塘一亩桥一虹溪
镇一吕山镇一钱家渡之线，线上属右。

第二游击区 } 焦村（不含）一园树街一四路桥一裘村一南呢
咀一至水阳之线，线上属右。

剿匪右翼军 } 竹园村（三溪北八公里）一双家州一大坑一法
相寺一后山一大岭（汀潭东西二公里）一孝义
岭一三里店一大黄村一戴家会一柏中一大庄
剿匪左翼军 } （赤滩东二公里）一冲里胡（繁昌西七公里）
第二三集团军 } 一小榭山上甲口之线，线上属右。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蒋介石关于命令第三第五战区
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强制八路军新四军
开往黄河以北的密电

（1941年1月6日）

- （一）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
- （二）决强制执行之。
- （三）第三第五战区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 （四）特须注意防止该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别山或豫西流窜，影响大局。
- （五）务避免以大部队在前线致敌所乘，我军应以游击战要领避难就易，避实击虚，计出于万全，勿致牵动全局。

(六) 关于局部及剿抚进退诸机宜，统由各该长官负责处理为要。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顾祝同关于迅速进剿
皖南新四军给上官云相的密令

(1941年1月6日)

叶挺、项英不遵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江就指定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支(4日)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战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纪纲，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予进剿，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督党政方面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绝根株。又对该军化整为零，企图流散时之清剿，并希预为计划及准备为要。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上官云相关于7日拂晓
向皖南新四军发起攻击给所属各部的密令

(1941年1月6日)

(一) 略

(二) 集团军以迅速围剿该匪之目的，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伪暂取守势，即以主力于明(7)日拂晓开始围剿茂

林、铜山徐一带匪军。

(三) 第二游击区应严阵守备，迅即扫清该防区内之残匪及其兵站设施与秘密工作人员。

(四) 右翼军应以有力部队担任宣城至南陵间原阵地守备，以主力展开于后山、湾滩、李庄、溪里凤、东流山之线，与左翼军切取联系，明(7)日拂晓向茂林方面匪军攻击。

(五) 左翼军(并指挥七九师)，任进剿之主力，以一部(新七师)扫荡清弋江以西之匪区内残匪，进出于南陵、戴家会〔汇〕、何家湾之线而占领之，以主力与右翼军联系，展开于屯仓徐、杨家、麻岭、小山、丁家、阴潭、小河口之线，于明(7日)拂晓向茂林、铜山徐方面匪军攻击，并以一部守备章家渡及沿无名河，对茂林方面警戒，以防匪军窜回老巢，该军应置重点于右。

(六) 两翼军作战地境为小葛村、坦里口、东流山、茂林、湾滩、后山、曹家湾、里许、牛头山、南陵县城、峨桥之线，线上属右。

(七) 七九师即归左翼军作战序列，六二师控置于东岸附近待命。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顾祝同命令限电到 12 小时内聚歼

皖南新四军给上官云相的密电

(1941 年 1 月 8 日)

匪军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为期能于短

时间彻底肃清，毋使漏网起见，希即督励所部，协同友军切取联系，努力进剿，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限电到 12 小时内一鼓而聚歼之，勿使逃窜分散为要。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顾祝同转报上官云相围击
皖南新四军军部给何应钦密电

(1941 年 1 月 8 日)

上饶

总长何：3025 密，极机密。鱼〈6 日〉未鞠电计呈，顷据上官总司令虞〈7 日〉利电称：(一)支〈4 日〉晚由湾滩、章家渡南窜之匪军主力约 5000 余，因雨滞留于茂林、铜山徐一带山地中，鱼〈6 日〉辰其警戒部队与我方师搜索部队，在茂林铜山徐附近接触中；(二)集团军基于钧座鱼〈6 日〉未鞠电要旨，以迅速围剿该匪之目的，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伪暂取守势，以主力于本(7)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之匪军；(三)第二游击区应严阵守备，迅即扫清该防区内之残匪及其兵站设施与秘密工作人员；(四)右翼军应以有力部队守备原阵地，主力展开于后山、湾滩、李庄、溪里凤、东流山之线，与左翼军切取联系，防该匪攻击；(五)左翼军(并指挥七九师)任进剿之主力，以一部扫荡清弋江以西匪区内之残匪，进出于南陵、戴家汇、何家湾之线而占领之，另以一部守备章家渡及沿无名河，以防匪军回窜，以主力与右翼军联系，展开于屯仓徐、

杨家、麻岭、小山、丁家、小河口之线向匪军攻击；(六)两翼军作战地境为小葛村(三溪东北12里)、坦里口、东流山、茂林、湾滩、南陵县城、峨桥之线，线上属右；(七)六十二师控置于旌德芳川附近机动。上七项除已分电遵照外，谨电鉴核等情，谨电鉴核。职顾祝同。未鞠键印。

(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顾祝同关于搜捕项英事致

邓吴明、张礼^①电

(1941年1月16日)

据报项英、袁国平于元(13日)晨率队百余在章家渡被我堵击后，窜至溪口街换便衣潜逃。查项英系湖北人，袁国平系湖南人，希迅饬泾、南、繁各县立即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按户清查，毋使漏网。如能将项英、袁国平交出者，各赏洋5000元，如隐匿不报，一经查实定予严惩不贷。仰即切实遵照，并将搜查情形具报为要。

(原件存安徽省档案馆)

^① 张礼，当时任安徽省第六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十天大会”

张 崇 文

在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继而汪精卫也叛变了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党中央为保存和培养干部，把一部分党团的优秀干部派往莫斯科学习。我和我二哥张崇德都是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参加革命工作的，这次也被派往苏联学习。这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在上海住处接到上级党组织的通知，立即赶到吴淞口外的苏联货船上集合。为防敌人的袭击和拘捕，我们化装成运货工人乘小驳轮上了货船，坐在货船底层中，直到子夜时分，轮船驶离祖国很远了，大家才走上船舷活动活动手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到海参崴后住了20多天。10月28日，又乘上没有卧铺、没有暖气的列车，于11月9日到达莫斯科，进了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的校舍是一座四层楼房的方形建筑，座落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沃尔洪卡街16号，里面有100多个房间。楼上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教研室，楼下没有餐厅。校

园环境静谧幽雅。中山大学成立于 1925 年的国共合作时期。1927 年 4 月蒋介石叛变后，国共破裂，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专门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学校分别设有联共党史、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社会发展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维埃法制与国家建设、军事、中文等课程。此外，还有翻译局、印刷厂和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等三个为教学工作服务的附属机构。中国问题科学研究所研究的内容分为中国的基本问题和现实问题两大部分。中国基本问题研究的内容有中国文字改革（汉语拉丁化）、中国不同时期的土地问题、古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等。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研究的内容包括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中国革命道路、外国对中国的侵略等。

我们的宿舍原来设在中国城，后来搬到附近的卡卡林斯基的家宅，那里原本是资本家或贵族的房产，修饰得整洁而舒适。我们都在学校餐厅就餐。那时苏联还处在艰苦的时期，但对我们都给予特殊的照顾，按照每人每月 120 卢布的标准开销，每天供应白面包、牛奶、黄油，还经常吃到鸡、鱼和牛肉。穿着和日常生活用品全部供给。每人发给服装、外套、皮鞋、衬衫、雨鞋等，甚至连手帕、梳子、牙膏、牙刷也发给。此外每月还发给 12 卢布津贴费作零花钱。

学校的文娱活动很活跃，设有俱乐部。俱乐部组织照像、无线电收发报、活报剧、唱歌、音乐、跳舞、绘画、打

球、滑冰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二哥崇德喜欢打篮球，每次比赛都有他。我也在冬季滑冰场学了溜冰。活报剧组很活跃，记得我们演出过打倒蒋介石的话剧，吴福海同志饰演蒋介石，演得很象。以后大家见到他，就开玩笑地喊他“蒋介石”。

从1925年中山大学成立，到1928年初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仍简称“中大”或简称“劳大”），共有四期学生：1925年第一期共有学生三四百人；1926年第二期也有300来人；1927年第三期共有100余人；1928年第四期，从“东大”转到“中大”100余人。前后共有1000来名学生，我是第三期的学生。由于学生的来源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分为以下四种班：

一是正规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其中又分为俄文班、英文班、德文班、法文班。

二是特别班。也称“老头班”。他们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到校的一些较高的党政领导干部，如叶剑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夏曦、方维夏、杨之华、帅孟奇、李国暄、李哲时等。

三是工人预备班。主要是从欧洲去的华工，从国内去的工人。共编两个班。约有八九十人。他们主要是学文化。课程有中文、历史、地理、算术、政治常识、自然科学常识、军事课等，还有少量俄文课。

四是速成班。这个班的时间较短，参加这个班学习的同志是准备早些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的。

此外，还有个翻译班。凡是俄语较为熟练或其他外语

较好的都编入翻译班。他们自学有关课程或当助教，参加各教研室工作。

中山大学学制为两年，改组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后，学制为三年。我去莫斯科整三年，所学过的功课，以学社会发展史收获最大。教我们的苏联教员满脸胡须，是个著名教授。他课讲得好，从浅入深，从具体到抽象。“中大”校楼的第四层，就是社会发展史的教室，里面装置着从猿到人的模型实物。每讲一课后，还到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参观学习。每次参加学习，我们这位老教授总是跟着边指点边讲解。社会发展史确实是奠定革命人生观的理论基础，这门课程使我获益匪浅，回中国后对我从事教学工作和领导工作帮助很大。

此外，还学了西方革命史，讲课的是王稼祥同志；讲经济学课的是傅胜蓝同志；联共党史是由苏联同志讲的，主要是讲斯大林的联共党史教程；讲课最差的是中国革命问题课，没有专职的主讲人。

在苏联三年的学习中，课堂教学、参观学习、工厂劳动三者密切结合。我们曾经去各个大工厂参观，也去过农场，进行过军事野营，去列宁格勒、明斯克、白俄罗斯、基辅等地参观学习。1930年3月，还曾到莫斯科的第七印刷厂劳动过。通过学习马列主义，使我们对于奠定革命人生观，坚定革命意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我所在的“中大”第四班，大学分同学是和我一起从上海乘船到海参崴以后到莫斯科的。有冯定、张祖俭、恽雨裳、徐以新、何子述、曾宗圣、孟庆树、丁云波、朱自

牧、朱自纯、杨莲卿、杨安卿、彭莲清、秋妹子、王云程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附近召开时，孟庆树、朱自纯二位女同志被抽调去参加工作。

在这里谈一点王明在莫斯科的情况。王明原是一个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生，到了中山大学后，由于紧跟副校长米夫（后升为校长），成为“中大”的秘书，深得米夫的信任。他经常以“领导人”自居。来参加“中大”的大会，一讲话就长篇大论，引经据典，摆出一副未来“中国列宁”的样子。

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大”的支部局之后，他们利用反托派的机会，企图斗垮原支部局的领导人、中共老一辈党员俞秀松（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董亦湘、周达明等同志。他们在中国同志中间威信很高。王明一伙造谣说他们组织了个“江浙同乡会”，是反革命组织，还请到莫斯科开会的向忠发前去讲话。向忠发不做调查，就声称他们如不坦白，要逮捕、枪毙。“枪毙”二字说得特别响亮，使在“中大”的江浙学生人心惶惶。大概在1928年七八月间，周恩来同志来到“中大”，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大”并没有江浙同乡会的反革命组织，只是某些学生爱吃中国菜；星期天在一起烧中国菜吃而已。才给这些同志平了反。

“十天大会”

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人，都参加过有名

的“十天大会”。这次会议斗争激烈，惊心动魄，结果导致“中大”停办，几百名学生遭受冤屈，不少人被逮捕，牺牲在苏联；一部分同志被送回国。为米夫所支持的极少数人，则飞黄腾达。

“十天大会”距今已有60余年了，对于这次会议的时间其说不一。吴玉章同志说这次会议的时间是1929年6月。李一凡同志说是1929年9月，他从阿鲁什塔休养所回来后开的。我回忆与李一凡同志说的基本相同。我记得这次会议是1929年9月我与二哥张崇德从克里米亚休养所回校后才召开的。会后，我二哥张崇德被捕。这次会议不可能在1929年暑假之前召开。

王明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从王明档案上看，1929年4月到10月，他在上海作红旗报通讯员，中共沪东区委兼宣传干事。从1929年4月至12月，王明在《布尔塞维克》、《红旗》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这说明他当时正在国内，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他虽然没有参加“十天大会”，但他在“中大”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十天大会”开始，在提主席团7人名单时就引起了争论。名单里有余笃三、李剑如、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张国焘、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还有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里茨。

大会的争论焦点是：支部局执行的路线是否正确。支部局的领导人认为支部局执行了一条“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的路线；广大党团员群众则说，支部局执行了“实践中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

大会由支部局领导人主持。报告一开始就指责广大学

生群众，毫无自我批评。当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说支部局是如何正确，是真正的布尔塞维克时，会场乱哄哄的，呼喊着重要这位区委书记下台，甚至有人要上去把他拖下来。这时，张国焘在台上连连喊着“静下！静下！”会场才静下来。

在大会上发言的，有秦邦宪、盛忠亮、余笃三、李剑如、吴福海、张崇德、李一凡、柳溥庆、唐有章、吴玉章、王稼祥、郭妙根、张祖俭、张崇文等。当时斗争很激烈，张崇德、李剑如的发言同支持支部局的人的发言针锋相对。余笃三、李剑如等也在发言中批评了以王明为首的宗派主义小集团的错误。当时有的还批评学校的中国革命问题教材不切实际；有的批评学校党组织把中国共产党员降为苏共后补党员很不合理；有的批评王明等人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批评了翻译工作中的问题，等等。

据王观澜同志回忆，当时董必武立场是正确的、坚定的。他反对王明一伙操纵、控制支部局，搞宗派，搞教条，搞唯成份论，打击人、整人。把凡是反对他们的都说成是反党分子、托派阶级异己分子，帽子满天飞。

张崇德在发言中，批评了王明一伙捏造“江浙同乡会”的错误，指出周恩来同志已经宣布没有所谓江浙同乡会，而王明一伙至今还说江浙同乡会如何如何，这是完全错误的。

李一凡发言说了三个问题：一、“中大”的任务应是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中、下层干部。上层干部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的实际锻炼和考验，从群众斗争中产生，仅有一知半解的书本知识的人是不能胜任的。二、派往红色教授学院深

造，必须从党的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从较有实际经验的同志中选拔，不能仅凭俄语程度，尤其不能以爱憎取舍。三、批评阿卜朗姆松是个民族沙文主义者，因为他曾污蔑说中国人坐轮船不配坐头等舱，坐火车不配坐头等车厢。

吴玉章在会前就看到右派彭泽湘等活动得很厉害，同何叔衡两人在大会上把彭对他们所说的反党的话都讲了。

大会上的发言，最受欢迎的是共产国际监委主席索里茨。他作过调查，又听了大家的意见，严厉地批评王明一伙说：“你们在这里，在莫斯科，无论说得多好听，都不能完全说明你们是好样的。你们必须在中国，在流血斗争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证明你们是真正好样的。不是这里，而是那里！不是这里，而是那里！”语气一句比一句慷慨激昂。索里茨的讲话，使绝大多数同志受到鼓舞，王明一伙则垂头丧气。

在“十天大会”的第十天，也就是索里茨发言之后两天，支部局把一个《解散团支部局的决议案》提交上午的大会表决。原来，整个团支部局除陈昌浩之外，所有成员都一直与广大党、团员群众站在一起，坚决反对王明一伙。因此，支部局作出了解散团支部局的决定。但是表决的结果，由于许多原来追随王明的人已受了索里茨发言的影响，举手赞成的仅有29人。米夫、王明一伙见大势不好，便把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搬到下午的大会上，用区委的名义命令大会结束。

大会虽然结束了，斗争并没有停止。大概在年底的时候，支部局忽然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支部局组织委

员王云程手拿两页信纸，向大会宣布一个十分骇人听闻的消息：有个河南人，俄文名字叫马马也夫（过后很久才知道他叫赵言清）自杀了。他留下了一封遗书，揭发校内存在着一个庞大的秘密托派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操纵广大党团员群众向党支部局进攻，反对党的领导。他本人就是该组织的头儿，深感对不起党，所以负疚“自杀”云云。并且还提供了一个有百十来人的托派名单。这时王云程晃了晃手中的两页信纸说，这就是他的遗书和名单。此后，就陆陆续续有许多同志从学校失踪了。说这些人是被派送回国或去共产国际谈话去了。实际上是把他们逮捕了，这其中就有唐有章、李一凡、张崇德等同志。

1929年11月，学校党组织宣布全校清党。在清党过程中，实行“人人过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方法简单粗暴。几位清党委员并坐在一张桌子后面，被审查的人站在桌前，就象是在法庭受审一样。由清党委员向被审查者提出问题，旁听者也提出问题，然后由清党委员会做结论。他们既不核对事实，也不进行调查，便根据揭发出的所谓问题，作出结论，开除党籍或予以别的处分。我在被审查当中，当时就有人说我是张崇德的弟弟，应开除党籍。幸得清党委员会主席基尔三诺娃说我在中国参加实际斗争，不能开除，但有错误，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吴福海在“十天大会”上发言反对支部局，以后与博古争论，失手打了他一拳，因此，清党开始之后被开除党籍。他在中共代表团的支持下，向共产国际申诉。由于他家庭出身贫苦，本人成分是工人，参加过上海工人第三次

武装起义，所以，校清党委员会又把对他开除党籍的处分改为警告处分。

孙冶方敢于同王明教条宗派进行斗争，先是被诬为“江浙同乡会”分子，后又被当作阶级异己分子开除党籍。

张崇德在“中大”期间，王明一伙曾多次拉拢他，都遭到严词拒绝。因此，他以莫须有的“江浙同乡会”的罪名被逮捕。未经任何法庭程序，由格别乌的特殊会议判处5年劳改。释放后又抓回，终于被迫害死在苏联。

李一凡同志因反对王明，被送进大牢。捕前，王明曾以共产国际名义找他谈话，把他拉到王明的住所，用俄语对他说：东方部想派你回国接办党中央机关报《布尔塞维克》。李说：“我不会做买卖”。王明很尴尬，被顶得满脸通红。因此1929年清党后，李一凡同志便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等地，遭受迫害达22年之久，直到1958年才回国。

“十天大会”以后，究竟逮捕了多少同志，无法准确统计。按李一凡同志估计，至少有五六十人。

我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以后，于1930年3月被送到莫斯科第七印刷厂劳动，约有5个月左右。后被送回国，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杭州工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办对中国革命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我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开办，为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学习马列主义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条件。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学习奠定了革命人生观的基础，因此是有成绩的。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期间，在米夫的支持培植下，形成

了王明教条宗派集团，在“十天大会”后的清党中，对中国革命事业犯有不可饶恕的大罪。其后，又是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通过六届四中全会，掌握了党中央的领导权，长期推行了一条错误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是问题的又一个方面。

“十天大会”后进行的清党，使我党许多好同志，有的受到警告处分或被开除出党，有的被捕，有的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工，有的被迫害致死。张崇德同志在苏联被迫害致死，至今下落不明。李国暄同志出于同情俞秀松、周达明、董亦湘，为他们送了毛毯而被隔离5年之久，到1937年上半年后，就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了。

余笃三、李剑如两位同志都是坚决反对王明一伙的，在“十天大会”上是主席团成员，后都被送回中国，到苏区工作。据成仿吾写的《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罪行》（《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讲到，余笃三反对王明“左”倾路线被撤掉了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徐以新同志最近告诉我，余笃三在四方面军被张国焘杀害。王嘉翔同志著的《大将许光达》一书中，有三处提到李剑如同志，说王明路线的中央把湘鄂西当时不同意见的争论笼统说成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他们组织肃反委员会杀了許多人，“许光达当十七师师长时的师政委李剑如也被杀害”。王孚美在苏联学习期间，因反对王明被关进监狱，1937年与家中断绝通信，1953年病死狱中。据其在苏联的女儿友兰说：赫鲁晓夫时期已为王孚美恢复名誉（这是他弟弟王愧秋同志告诉我的）。我认为，对上述这场冤案错案进行一次有组织

的清查，并作出应有的结论是完全必要的。

江苏革命史料 1983 年第 8 期上有材料说，董亦湘被王明诬为托派，于 1938 年被捕。经他的苏联妻子和董亦湘的弟弟董涤臣请国际红十字会帮助寻找，苏联中央军事检察院 1959 年通知：“他没有罪行，应恢复其名誉”。这样做是符合实际的，是很得人心的。

柳溥庆同志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被当作“国民党残渣余孽”开除党籍。回国后，他并不灰心，继续努力，于 1950 年重新入党，1974 年病故。1989 年 11 月 10 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知：承认柳溥庆同志 1930 年至 1950 年的党籍，党龄从 1926 年算起。党组织对这些同志的平反、关怀，使活着的人们及其家属深感安慰。

创建东北根据地的群众工作

张 秀 山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我党中央根据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战略任务，从全国各解放区向东北地区调派了2万干部、10万部队，从而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我党运用这支力量，依靠人民群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这场历史性的较量，我军仅用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共歼灭国民党军100多万，解放了全东北。接着，东北我军便挥师进关，从而推动了全国解放的早日到来。

我党在东北地区能取得这样伟大的历史性胜利，除了各方面的因素外，最基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七大”路线的基本点，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把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做为我们事业胜利的基础与保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刚到东北时，毛泽东主席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指出：“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

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那么，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① 1946年7月上旬，东北局在哈尔滨市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东北工作的指示，认真分析了形势，总结了一年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以后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并于7月7日通过了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即“七七”决议）。这一决议后经中央修改批准，成为我党领导东北人民建立巩固根据地、夺取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纲领性文件。决议号召各级干部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通过长期艰苦的工作，发动群众，团结群众，调动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全力投入到这场人民战争中来。会后，东北局动员了1.2万名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开展群众工作。

东北解放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开始的。我们刚进入东北时，东北人民对共产党很不了解。日本投降后，他们所知道的只是所谓“正统”的蒋介石政府。苏联红军撤走时，把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又都交给了国民党。十几万美械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也气势汹汹地从关内开来，占据了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而广大农村则到处都有政治土匪、地主武装，活动十分猖狂，到

^① 毛泽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76页。

处抢劫群众，杀害干部，不断对我们进行骚扰袭击。而当时我们干部数量不多，部队数量相比之下就更少了。我党、我军面临的困难是非常严峻的。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不能尽快地发动起群众，把根深深地扎在群众之中，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那我们就很难在东北立住脚跟，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东北解放战争期间，我先在北满任中共北满分局委员、松江省委书记。辽沈战役前，调任辽宁省委书记，后来又任东北局担任组织部长。根据我的经历回忆，当时我们在群众工作方面着重抓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清 算

我们发动群众，第一步是清算大地主、大恶霸、大汉奸，让群众自己起来斗争，去粉碎一切敌伪残余。通过这场斗争，广大群众倾诉了自己所受的剥削、压迫和心头的积怨仇恨，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他们还通过分粮食、分浮财，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但在清算开始时，我们的一些干部下到农村之后，有的屁股没有坐到赤贫户这一边来，而是坐到富裕户那边去了。有的不能放手发动群众，不相信群众的斗争力量，给群众斗争不适当地划定框框，使工作受到损失。发动群众，就是要动员群众自己起来，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并且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干部要善于体察群众的要求，并善于启发、领导他们去进行斗争，绝不能搞包办代替，也不能有什么“恩

赐”观点。东北局在领导这场群众运动中，及时发现并推广“马宾式的工作方法”。马宾同志做群众工作的主要特点是，深入到最穷苦的群众家里，与他们同吃同住，了解他们的困难和要求；从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群众要求清算就组织清算，群众要求减租就组织减租；不是靠政府和军队给群众的“恩赐”，而是让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开展轰轰烈烈的斗争。他并把工作中发现的贫雇农积极分子组织起来，让他们到新区去开辟工作。这样一来，就能很快从一点发展到了一大片。陈云很赞赏这种作法，号召广大干部在下乡开展工作时，也要这样集中使用干部。他把这种组织工作队一片一片地开展工作的作法称为“蝗虫政策”。

在清算中，我党只有为群众真正谋到了切身利益，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因此，我们每到一地区，都是首先攻破当地的封建顽固堡垒，打掉反动势力的威风，组织群众分地、分浮财。我当时到延寿县蹲点。在高丽营附近，我们工作团发动群众斗争了一个叫“黄大头”的伪满村长。他是当地的一个恶霸，欺压群众是很厉害的。我们组织群众斗了他，分了他的土地和浮财。通过这场斗争，广大农民从切身体验中认清了共产党、解放军才是人民的真正救星。提高了觉悟的农民发出了“要土地，要翻身，打老蒋，保家乡”的革命呼声。不少群众纷纷表示“一不做，二不休，参加革命至死不倒巢”。在这基础上，我们适时地组织起农会，轮训干部，起出地主埋藏的枪支、弹药，成立了农民自卫队。这样，一大批觉悟了

的农民便走上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基层政权也随之建立了起来。我们工作队的同志和群众打成一片，在斗争中和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一些年青干部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疙瘩”（东北土话，即小弟弟的意思）。当时新任命的省委副书记李德仲来到省委报到，他见整个省委机关只剩下一名组织干事看家，便二话没说，打起背包立即下乡去了。陈云当时把干部下乡去进行根据地建设，叫做“大官做小事”，“小事”就是“世界革命”。今天看来，我们党的这种优良作风仍然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光大。

二、剿 匪

东北的匪患由来已久。土匪成份复杂，数量很大。特别是国民党在东北实行了收编土匪武装的政策后，各地土匪剧增。国民党派遣了大批“接收大员”，大肆收罗伪军警宪特、土匪及一切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授予“挺进军”、“先遣军”的司令、军长、师长等官衔，到处招兵买马。我军收编的一些部队，因为成份复杂，后来也纷纷叛变，成为政治土匪。

我军进入东北初期，土匪活动非常猖狂，盘据控制了很多县城。他们到处反攻倒算，杀害我基层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抢劫群众的财产，破坏社会治安，气焰十分嚣张。面对这种情况，要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就必须下大力量，把土匪清剿干净。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于1946年6月作出《关于剿匪工

作的决定》。决定指出：“根据目前斗争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肃清土匪，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东北局要求各地区抽调 1/3 的部队和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下乡，发动群众，深入到深山老林之中，进行大规模的剿匪战斗，并拨出一些主力部队，分散到各个地区。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清剿土匪的战斗开始了。我各主力部队都划定了自己的剿匪责任区，采取了“环环相套”、“猛打穷追”、“分进合击”等战术，分片协作，限期包围，全力进剿。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取得了重大战果，总计歼灭匪特几十万人，缴获枪支弹药无数。这是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决定性的环节和发动群众的先决条件。

在剿匪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建军、剿匪与发动群众”三位一体的工作方针。进一步发动群众，组织农民自卫队，参加剿匪。各屯的民兵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进行群众性的搜山运动。许多匪特头子就是被人民群众捕获的。各地还召集匪伪的家属亲友开会，向他们讲明政策，让他们去做外面当土匪的亲属工作。与此同时，对土匪还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进行分化瓦解，展开攻心战。我们规定：投降者不杀，携械投降者酌情给予奖励；还广泛散发“自新证”和帮助归降的土匪安定下来从事生产。通过这些政策，部分土匪主动向我党我军投诚，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经过这场剿匪斗争，群众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更加相信我党。到 1946 年底，剿匪斗争基本结束，根据地的农村

出现了一片秩序井然、人心安定的景象。

三、土 改

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东北局的七月扩大会议，为土改的全面贯彻执行制定了方针政策。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展开了。

东北地区的土地，大部分集中在少数的地主手中。在北满地区，土改前仅占农户5%的地主却占有40%以上的土地，而50%以上的农户没有土地。这种土地制度深为贫苦农民所不满，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广大农民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实行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对充分发动群众、解放农业生产力，对进行根据地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

东北土改时，各省都派工作队下乡。工作队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宣传党的土改政策，召开诉苦大会，启发贫苦农民的阶级觉悟。同时挑选培养农民积极分子，带动群众起来斗争。当时，我们在每个地区都先搞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在面上进行推广。我们采取的政策是：以贫下中农为骨干，团结中农，照顾富农，分化地主阶级，集中力量打击大地主、大恶霸。并把清算与土改结合起来。这一政

策，由于适合当时的情况，在较短时期内就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但是，在土改中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贫苦农民翻身不彻底，有的地方土改走了过场。陈云把这类情况叫作“半生不熟的夹生饭”。据当时核查，一些农村的和平分地、假清算、假分地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反动地主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破坏土改。我们把他们采用的手法归纳了十种花样。其中，最普遍、最严重的是收买我们的干部和利用狗腿子进行破坏活动。为此，我们决定开展以“查地和挖坏根”为主要内容的煮“夹生饭”运动。

煮“夹生饭”主要是针对一些在土改中走过场的地方。如巴彦县有一个屯子，虽然也对地主进行过三番五次的斗争，但是地主势力并未被摧毁，群众翻身也只是空有其名。屯子仍然被称为“满洲国”、“老中华”的四大户把持着。为此，县委带领三个区的工作队到那里集中试点。工作队进屯后，开始群众还不敢接近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就深入到最贫苦的农民家里，通过了解情况发现，从减租、清算直到分地，“四大户”均没受到触动。秋收时，地主仍是粮垛成山，牛马满圈。分地时，地主都是留好分坏，留近分远，多留少分，并霸占青苗、拖延打场，群众没有分得一粒粮食。另外，他们还挑动穷人斗穷人。这个屯换了四次“头行人”，不是烟鬼兵痞或流氓警察就是跳大神的或是化型地主、伪满兴隆会长。群众反映，过去对四大户的斗争，是干部“坐在地主的炕头上算帐，遇事同狗腿子商量”进行的。群众从未与四大户“撕破脸”，分果实也只是凭抓阄，

明分暗不分。这个屯的自卫队只有一个花名册和一个烟枪队长，枪支都捆放在四大户的朱二八爷家里。工作队根据这个屯的实际情况，重新发动群众，彻底清查了四大户的财产，挖了他们的底财，封了他们的粮垛，收了他们的车、马、牛，使贫雇农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对“四大户”的土地、财产整整分了七天七夜。贫苦农民高兴极了。经过这样煮“夹生饭”，贫苦农民才真正站了起来，翻了身。

在煮“夹生饭”运动中，各地都深入群众，发现问题。我们及时整顿了农会、民兵组织，清除了混进来的坏干部和坏分子，将领导权真正掌握在贫雇农的手里。并通过办短训班的方式，大量培养基层干部和贫雇农积极分子。

在煮“夹生饭”的后期，根据中央关于“挖窖问题”的指示，又开展了一场“砍挖运动”。一方面是挖地主的财宝，另一方面是在政治上进一步打击敌伪残余分子。象拉林县就是采取“挖小蒋介石”的做法，先从斗狗腿子开始，动员他们坦白交待，从而孤立少数地主。延寿县是先从收拾暗藏的胡子开始，凡是“屯不错”（即八面圆滑的人物）多的地方，隐藏的坏根也多。他们把斗争狗腿子和筛除“屯不错”的干部结合起来，作为煮“夹生饭”的一个重要方面。方正县在“砍大树，挖坏根”的运动中，采取了“找须子，拔萝卜，从小坏，追大根，问家属，究逃犯，假探亲，密私访”等一系列作法，在一个较大的村屯就查出大坏根 60 多名，抓回了逃亡地主 10 多人，还有国民党团以上军官 11 人。在煮“夹生饭”运动中，把查地、分浮财与培训基层干部、清整阶级队伍工作结合在一起，使运动更

深入了一步。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半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同年，东北局发布了《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和《东北局告农民书》。各级党组织在东北局领导下，迅速带领广大农民掀起平分土地的高潮。

在平分土地时，首先组织广大农民学习《土地法大纲》，进行广泛的宣传，做好思想准备工作。随后，整顿加强干部队伍，加强农会组织，清除混进来的坏分子，建立贫雇农代表大会和贫雇农团，作为平分土地运动的执行机关。在此基础上，选择重点村进行试点，集中力量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同时，开办重点村附近村屯的贫雇农积极分子训练班，传授重点村所取得的好经验。经过培训后，再把积极分子派回自己的村屯。他们以重点村的经验为指导，在工作队领导帮助下，开始彻底平分土地、分配斗争果实。这样就加快了由点到面的铺开速度，并在广大农村造成了强大的声势。分配土地时，要照顾烈、军属，贫雇农，并考虑到生产上的方便，一家的土地基本是联在一起的。平分土地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后，迸发出了极大的革命热情。36%至85%的贫雇农参加了斗争，并涌现出大量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平分土地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为巩固东北根据地、支援东北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著名作家周立波在他的小说《暴风骤雨》一书中，真

实地反映了当时松江省广大人民群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前前后后的变化。他那带有乡土气息的笔触，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伟大的农村革命。至今每当我拿起这本书时，就不由得想起了当年在松花江两岸，广大人民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宏伟斗争场面。

土改的成绩是伟大的，但也发生过一些偏差。象在“砍挖运动”中出现的“左”的苗头，在平分土地运动中又有所发展。主要表现是：打击面宽了一些，侵犯了部分中农的利益；个别地方也曾出现打、杀过重的现象。中央及时发出了纠偏指示，这些问题都逐步得到了改正。

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土改中得到了切实的利益，加上我军在夏季攻势中的节节胜利，群众的革命信心与积极性大为提高。他们普遍认为“八路黄不了，江山会坐牢”，纷纷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洪流中来。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我们又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党的建设，恢复、发展生产，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

四、建 党

我们初进东北时，各级党组织就把建党当作一项重要任务。但由于那时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建党缺少群众基础，因而采取了控制发展的方针，按照“斗争中发现，个别考察，秘密发展”的原则，发展了少数党员。随着反奸清算、剿匪斗争、土地改革等工作的深入发展，在群众斗争中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为发展党的组织创造了有

利条件。1946年4月，东北局作出了《关于发展党的指示》，指出：“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必须有强大的党组织。现在应该注意在斗争中大量的慎重的发展党员”，要以工人、农民、店员为发展对象，特别要在城市的大企业、大工厂、大商店以及学校和农村的较大村屯发展党组织，“首先在这些地方建立起党的堡垒”。

我们首先把在土地改革中涌现出来的贫雇农积极分子，经过斗争考验后吸收入党，并逐渐建立了村党支部。建党工作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成绩。当然，在发展党员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象过早地提出大量发展党员，派任务，突击发展党员，加之某些干部在发展党员过程中缺乏经验，条件掌握不严，使一些不够党员标准的人和一些坏分子混入党内，从而造成了党内成份不纯的现象。为此，1947年12月东北局在《关于1948年任务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整党的方针和原则。整党中始终坚持正面教育原则，发扬民主，依靠群众，防止了宗派主义与整人的倾向，采取小会酝酿大会批评的方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对新党员进行了重点教育，普遍进行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各地领导干部主动带头参加整党，形成了先上后下，由下而上，从领导到群众，从老党员到新党员的自觉整党运动。经过这次整党，纯洁了党的组织，改进了党的作风，提高了党员素质，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提高了党的威望，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党的组织也在整党中大大得到了发展。

1948年春，解放区开始公开建党。这时土地改革已经

胜利完成，广大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根据地也得到了初步巩固。公开建党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公开建党是将党组织在群众中公开，走出秘密状态，接受群众监督；公开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路线和思想；公开在贫雇农、工人、知识分子中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入党。这样就更加广泛地扩大了党的影响，更多地吸收先进分子，迅速壮大了党的组织。经过公开建党，北满地区的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

在建党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党群关系，尤其是群众对党员、干部的监督问题。在整党中间，我们组织群众对党员进行了评议。对那些工作好的党员、干部，群众提出表扬。对个别表现不好和在工作中出过问题的党员、干部，群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使群众性的监督活动制度化，还制定了一些密切联系群众的措施。整党之后，我们也定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另一方面，我们对党员干部深入农村、深入基层，也都作出了必要的规定，使他们在人民群众中间学会做群众工作，逐步懂得群众工作的重要性。这些办法，使我们的党员干部能经常与广大群众进行接触，及时了解群众的需求，及时帮助群众解决在生产、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从而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群众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员、干部不脱离群众，这样，我们的党才有力量，才能战胜一切困难。

五、生 产

战争形势的发展，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增加财力物力，增强根据地的经济实力，以保证战争的供给和人民生活。为此，各地政府都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中心任务提出，组织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从而把生产与支前结合起来。由于农民在土改中得到了土地，群众性的生产热潮很快就形成了。各地政府还抽调了大批党员、干部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参加指导农业大生产运动。为了解决劳力、畜力不足的困难，我们引导农民进行换工，组织互助组，并发放生产贷款，解决贫困农民的生产资金短缺的问题。此外，政府还制定了精耕细作、奖励开荒、兴修水利、防治虫病、保护牲畜、选择良种、改良农具、推广技术、发展农副业生产等项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8年，仅松江省就开荒132万垧；收获粮食645万石。每垧单产比1947年增产1.53石。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前线军粮供给与后方人民生活的需要。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军需、民用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日本投降后，我党一进入北满，便将日伪所经营的煤矿、金矿、森林工业及一些较大的工厂、企业全部接收，组织力量恢复生产。当时北满工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生产设备不全，技术力量缺乏，资金、管理人员不足。而且工人失业情况严重，生活极为贫苦。面对这些困难，党紧紧地依靠工人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大

家共同出主意思办法。经过艰苦的努力，工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恢复。煤矿在短时间内就出了煤。电力工业保证了工业生产和军、民用电。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还在北满地区建立了14家兵工厂，各省也建起了被服厂。这些军工企业为支援前线作出了贡献。

党在领导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财经工作的领导。为实行财政统一计划、统一管理，以克服“分散经营”的盲目性和浪费现象，保证战争供应，解决财政困难，加强了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和税收工作。1947年1月，在哈尔滨市召开财经工作会议，制定了“长期打算，发展生产，增进贸易，厉行节约，保障供给，支援战争”的基本方针，确定了统一税收，统一金融，统一征收公粮，统一对外贸易的财政统一的管理制度。由于加强了领导，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在大力支援前线的情况下，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财政工作为保证战争供给，促进经济繁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为解决群众生活的困难，扭转国民党对我进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物资供应紧张的困境，各级人民政府都非常重视商业工作。开办国营商业和贸易公司，进行物资的收购、储存和销售，并积极出口粮食，换回所需的工业品、布匹、食盐等物资，供应军需民用。国营商业还以低廉的价格抑制私营商业哄抬物价，从而保证了物价稳定与人民生活的需要。

由于工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财政、商业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东北根据地克服了各种经济困难，这

就不仅保障和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为支援前线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六、支 前

我军取得“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辉煌胜利后，东北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敌人从战略进攻逐步转入战略防御，我军则从战略防御逐渐转入了战略进攻。随后，我军又发动了夏、秋、冬三季攻势，拉开了全歼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序幕。在这种形势下，东北局于1947年5月5日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东北全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同时要求后方“继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保证兵源的补充”和物资供给，全力以赴支援前线。为完成这个任务，后方根据地各省纷纷号召广大翻身农民动员起来，掀起积极参军、扩军的热潮。1948年1月，松江省委作出了《关于扩军与补充兵员的决定》，决定成立松江省独立第七师。仅在4月份内，全省就扩充7500名新兵，成立了三个独立团。同时组建了一些二线兵团，以随时补充野战部队的消耗。广大翻身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为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纷纷报名参军。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农会骨干成为踊跃参军的带头人。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先上战场的动人场面。各地都挑选最好的青壮年送上前线：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至1948年，松江省共扩军12.7万多人。其中光是补充主力部队的人员就有

8.7 万多人。四野的第十二纵队就是由松江的两个独立师（独二师和独四师）组建起来的。松江省的独七师也编入了四野。这些部队进关作战，一直打到了两广。当时只有 210 万人口的松江省，能提供这么多的兵源（还不包括各县的县大队、区中队与地方民兵和自卫队），充分显示了翻身后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具有的高度觉悟和革命热情。

由于根据地的巩固，后方勤务与战争开始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战争初期，国民党大举进攻，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刚刚开始，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斗争还没有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基本上是靠部队单独作战。象秀水河战斗中，我军歼灭敌人一个半团，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缺乏民工的支援，伤员只好由战士抬运。四平保卫战时，反奸清算开始，群众得到初步的发动，但是规模很小，动员四五百副担架就已经很困难了。到了 1948 年 9 月，辽沈决战开始，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需要后方大量战勤人员的支持。为此，各省相继成立了战勤动员委员会，松江省的党和政府发出了战争动员的紧急指示。象要求现有医院，要完成收容 1 万名伤员的任务。各地、县、区也纷纷动员民工，组织担架队、大车队、医疗救护队，迅速开赴前线。许多县的支前队伍，都是由县领导亲自带队。省组成战勤支队，县为大队，区为中队，中队以下分为班、组。每副担架为一组，五六副担架为一班。战勤队伍随军行动，服从配属部队的指挥调动。在战区或战区附近的交通要道上设兵站，负责接收、调动战勤队伍和粮秣供给。民工参战前，不仅认真做好思想动员和具体组织工作，而且对衣

着、用品、伙食等都作好充分准备。对他们的家属也予以照顾，按军属优待。参加支前和战争的广大干部、群众，在 frontline 不顾敌人炮火和敌机的狂轰乱炸，冒着生命危险，夜以继日地向前线输送弹药、粮食和作战物资，向后方运送伤员。在支前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多支前民工立功受奖，获得“战勤模范”的荣誉称号。一些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在吃了败仗后不服气，但看到我军后方络绎不绝的民工、担架、大车支前，在没有军队看押的情况下，主动向前方运送军需物品和救护伤员，便感慨万分地说：“看到老百姓这样拥护共产党，我们是真服输了。”

为了保证决战的胜利，铁路、邮电职工也做出重大的贡献。铁路职工冒着炮火抢修被敌机炸坏的桥梁和线路，向前方运输物资。他们豪迈地保证：解放军打到哪里，军列就开到哪里，坚决保证军运畅通！辽沈战役期间，铁路职工和支前民工配合部队运送到前线的各种物资有 1.9 万多节车皮。邮电工人随军抢架线路，保证通讯畅通无阻。工程队冒着敌机轰炸扫射，随军抢架桥梁。部队打到哪里，公路、线路、铁路就通到哪里。军工工人为前线生产和储备了大量武器弹药。在决战开始后，又补充供应手榴弹 40 万枚，八一、八二迫击炮弹 20 万发，子弹 300 万发，山野炮弹 15 万发，掷弹筒弹和六零炮弹 60 万发。这就及时地补充了前方部队大规模攻坚战和围歼战的消耗。

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全东北共有 160 万名优秀子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胜利后，我军总人数达到了 132 万人，进关部队就有百万大军。三年战争中，支

前民工达 313 万人次，出动担架 20 余万副，大车 30 万辆，马匹 90 万头，提供粮食 450 万吨。如果没有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根据地，是不可能创造出这样强大的人力与物力、从而取得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的。

伟大的辽沈战役已经胜利 40 多年了。在东北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期间，我党、我军在斗争的每一个环节上，都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紧密地和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同心同德共同奋斗的。在建设根据地和各次战役中，人民群众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自己的鲜血和牺牲换来的。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人民革命战争胜利的可靠保证。历史经验证明，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必须牢记这一伟大的真理。我党从事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是不能忘记的。今天更应弘扬光大。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东北人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永远不会忘记东北解放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们。

在陕甘宁边区工作、学习的回顾

刘 春

我原在北京做地下党工作，北方局和北平市委决定我回延安党中央。1937年春，我由北京乘火车到西安，经过中央交通的安排到达延安。先后入抗大和党校学习。9月以后，我被相继调到中央组织部和陕北公学工作。1939年我被调到西北工作委员会，开始做少数民族工作。

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期间

西北工作委员会1939年初在延安成立，管陕、甘、宁、青、绥的工作和党的少数民族工作。西北工委的主任是张闻天，委员有王若飞、李富春、邓发、高自立、李维汉、贾拓夫、陈铁铮（孔原）和高岗等。李维汉是秘书长，贾拓夫是秘书，西北工委的日常工作由他们二人负责。为了系统地研究和解决国内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北工委专门成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研究室由我负责，分两个组进行工作。蒙古民族问题组有王铎、周仁山、孔飞和秦毅。王铎是辽宁人，东北大学边政系学生，在校期间，就接触了蒙古民族问题，而且会蒙文、蒙语；周仁山是甘肃人，北京朝阳

大学学生，曾在宁夏额济纳旗做地下工作，和当地蒙古族上层人士有过接触，会讲蒙语；孔飞是蒙古族，东北大学学生；秦毅是甘肃人。回族问题组有牙含章、沈遐熙和秦毅。牙含章是甘肃河州（临夏）人，他的家乡是回族聚居区；沈遐熙是上海的回族。这两个组都是我负责。西北工委的少数民族和民族问题研究室由李维汉、贾拓夫主管，李维汉曾对清朝回回民族起义的历史作了专题研究。李维汉、贾拓夫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就管过蒙、回民族工作。西北工委其他委员中也有做过少数民族工作的。如李富春长征到达陕北后管过这项工作；高岗曾是那时中央领导下的蒙古工作委员会书记；王若飞抗战前曾在绥远做党的地下工作，很熟悉蒙古民族的情况。

我们党一贯十分重视国内民族问题，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总问题、总任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就把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确定为党的任务和目前的奋斗目标。以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不断提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红军长征进入西北回族区域时，制定并严格遵守了“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的规定，获得了广大回民对党和红军的拥护。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党对少数民族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地下党的秘密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积蓄革命力量，吸收少数民族党员，培养少数民族革命骨干。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长征以及此后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中，都显示出国内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前夕，日寇的侵略魔爪已经伸进华北，继内蒙古东部沦陷之后，日寇继续西侵，策动回族上层中的一些人成立“回回国”，诱使回族上层闹“独立”，搞分裂，企图乘机占领整个大西北。陕北根据地的北面和西面正与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和回族地区相连，作好团结蒙、回民族的工作就更为紧迫。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号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抗日救国，收复失地”。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定》提出：“把蒙、回两族（首先是蒙古）反日、反中国统治者的斗争，提出武装斗争的程度，并把他们的斗争同我们的斗争直接结合起来。”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7年8月我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再次提出动员蒙、回及一切少数民族共同抗日。1938年11月6日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出了“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彝、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的紧急任务。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了我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和基本方针和实现这个纲领和基本方针的民族政策。他说：“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第十三个任务，就在于团结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也确定了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基本

方针和民族政策。

早在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准备少数民族问题材料的任务。这次大会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时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同时，为了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制订的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纲领、基本方针和民族政策，领导、团结和帮助国内少数民族求得解放和发展，进一步作好少数民族的工作，也极需加强对国内民族问题的研究。六中全会以后，中央把研究民族问题的任务交给了西北工委，为此西北工委专门设立了民族问题研究室作为研究工作机构，着手系统地进行国内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工作的研究。从民族的来源、历史发展和现状，直到制定一系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工作纲领的研究。

西北工委根据当时抗日战争的形势以及蒙、回民族和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相连的情况，提出首先研究蒙、回这两个民族的问题。

研究蒙、回民族问题，拟定团结蒙、回民族抗日图存，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以毛泽东的报告《论新阶段》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中关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以及纲领、基本方针、民族政策为依据而进行的。

在当时研究国内民族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资料缺乏，困难不少。虽然从西安买来一些书刊，还是深感不足。延安的几所学校和机关的藏书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当时中央的负责同志只有毛泽东有个藏书室，藏书比较多。由李维汉征得他的同意后，凡是我们用得着的，都借过来了。还有一个来源，那便是从国民党统治区和抗日前线回延安的同志带来的报纸、书刊，可以从中发现一些材料。我们还从大青山、伊克昭盟、甘肃、宁夏回来的同志的汇报中了解蒙、回民族的情况，从和这些地区来的上层人士交往中了解情况。为了更直接地了解蒙古民族的情况，西北工委派出了一个考察团，由王铎带队，到伊克昭盟去实地考察。从1940年11月出发，历时3月余，对伊盟的社会、经济、政治、文艺等方面都进行了调查。虽然这只是内蒙古的一个地区，但对了解蒙古民族的历史、社会发展和现状起了很大作用。这个考察团的团员中有文艺工作者，如古元、王亚凡、刘炽等同志，记得他们回来以后，还在延安演出了自己创作的蒙古歌剧及其他文艺节目，很受欢迎。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主要的是借助于古籍。那时我们有一套世界书局出版的二十五史缩印本，字小得像蚂蚁，只好借助于放大镜，所以至今我还有喜欢用放大镜看书的习惯。

对国内民族问题，历来存在着无产阶级解放少数民族与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继续压迫少数民族的斗争。从少数民族本身来说，也存在着广大人民和民族民主革命者的民族解放道路和反动上层的反动道路的斗争。孙中山虽然领

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也提出过“五族共和”，但只承认五族而没有提中国境内众多的其他少数民族和改变各少数民族的被压迫地位，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1924年，孙中山在我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起草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布：“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可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违背孙中山的遗教，完全继承了清王朝和北洋军阀政府对国内各民族实行民族压迫的传统，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与此完全相反，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坚持解放少数民族的道路，坚决反对民族压迫，坚决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少数民族和汉族完全平等，坚决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族平等政策，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压迫，主张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共求解放。我们党一贯认为中国国内民族问题是中国革命总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解放，是中国革命总任务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华民族是由中华各民族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的解放，必须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解放，不解决国内民族问题，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或者说还不是完全的胜利。无产阶级要求得自己的解放，就必须解放被压迫民族，在我们中国，就是要解放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包括汉族和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各民族。中国是一个各兄弟民族的大家庭，但是各少数民族的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中很小比例，所以更必

须坚决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汉族和一切少数民族完全平等，以便团结一致，共求解放，共同建设自己的祖国。

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为了实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不承认中国境内有少数民族的存在，不承认存在着国内民族问题。为了给它自己实行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制造论据，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就断言中国只有一个所谓的“国族”，中国各少数民族不过是同一“国族”的大小“宗支”，是什么“宗族”。不承认有回回民族，因而也不承认有回回民族问题，只有回教问题，说回回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不承认有蒙古民族，把蒙古民族问题只说成是所谓的“边疆问题”，蒙古民族人民又因此只被称为所谓的“边民”。

我们在国内民族问题的研究中，不仅必须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还有其他帝国主义者）对中华各民族的侵略压迫罪行，揭露日本援助回族“自决独立”，建立“回回国”，和日本扶植内蒙古民族“自治独立”的阴谋诡计，驳斥它分裂中国各民族、灭亡全中国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无耻谰言，还必须揭露国民党大汉族主义者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及其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批判它的种种谬论。对少数民族反动上层的反动道路，特别是他们分裂祖国，出卖民族利益，投降、依附帝国主义的罪恶言行，也必须揭露和批驳。

首先谈谈我们对回回民族研究的情况。对于回回民族的问题，我们党的观点从来就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党一贯认为回回是一个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共产国际对

1928年的甘肃回民暴动也曾有这样的指示：“在……这次暴动的回民农民的斗争中，党首先应认识这种运动之民族的性质。”党对回族一贯主张实行民族平等的政策。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后，领导和帮助回族在豫旺、海原地区成立了豫海回民自治政府，红军中还成立了回民组成的师。但在回回民族问题的研究中，研究室也有回回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汉人信了回教，回回问题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宗教问题的意见。并且认为拿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来衡量，回回即使不是汉人，也是汉化了，不完全具备斯大林所指出的四个特征，因此回回还不能算是民族。这种意见忽略了斯大林在下定义时，是指的现代民族。回回是一个民族，具有民族的特征，不过还不完整，还不是现代民族，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百年来，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中国各民族没有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汉族，以至于被排挤在后面的各少数民族，如回族、蒙古族等等都没有结合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特征的现代民族。但他们仍然是单独的民族，没有与汉族同化（也没有共同融合）为一个民族。两种意见都提到西北工委委员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是由张闻天主持的，王若飞、李富春和高岗等发了言。会议再次肯定回回是民族，回回问题是民族问题。根据现实情况和史料考证的结论是：我国的回回主要是元时从波斯等地来中国的回回人，也包括唐宋时代来中国的波斯、大食人。回回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和汉族通婚和历史上强迫汉人入教等原因，加入了大量的汉人成分，但

回回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没有汉化，更不是汉人信奉回教的“回教徒”或“汉回”，也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回回是由回鹘演变来的。回回民族中也可能有回鹘的成分，不过只能是次要的成分。回回问题虽然不是宗教问题，但由于回族普遍信奉回教（伊斯兰教），回族的发展与回教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宗教问题仍然是回回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过讨论后，对这个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会上同意经过集体研究由我作的回回民族问题的报告，并决定在这个报告基础上，由贾拓夫压缩改写成一个《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经西北工委负责同志审阅定稿，于1940年4月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在审阅时批了原则上同意。这个《提纲》经中央书记处基本上批准后发至各级党委，后来又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和收进《六大以来》文集中。在我们进行回回民族问题研究以前，中央曾经指定王若飞起草一个关于回民工作的文件（题目记不起了），他写了一个稿子，没有上报，我们在研究中参考了他的意见。我们在《提纲》中写了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不反对大汉族主义就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贾拓夫告诉我，毛泽东看后指出，要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是首要的，但同时要注意狭隘民族主义。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分析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为我们以后研究和处理民族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范例。由此我们深感自己马列主义认识水平是很低的。

其次，谈谈我们对蒙古族问题研究的情况。对于蒙古族的问题，由于下述原因，大家在认识上比较一致：我们

党从建党初期起，就非常关切内蒙古的革命斗争，在内蒙古地区和蒙古民族中进行过长期的工作。北方的党组织在蒙古民族中建立了党的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和内蒙古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发展。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更加重视蒙古民族工作，加强了领导，并在伊克昭盟建立了党的工委，派驻了我军的机构。抗战初期，我党我军进入大青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长期的工作，使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已有认识，积累了经验，也比较熟悉情况，所以在研究蒙古民族问题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大的争论。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观点明确。那就是蒙汉应团结一致，抗日图存，共求解放。日寇侵略者非抵抗不可，中华各民族非团结不可。要团结就要实行民族平等，这就必须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国民党的“反共防共”政策。蒙古民族要一致奋起推翻日寇的统治及其傀儡——伪蒙古自治政府、伪满洲国政府，驱逐日寇出内蒙古和全中国，揭露“日蒙民族协和”以及“防共特区”的邪说和阴谋诡计。经过集体研究，由我执笔，起草了一个《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稿子。这个稿子经西北工委修改后，于1940年7月报经中央书记处基本上批准，发至各级党委；并且也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和收进《六大以来》文集中。

西北工委拟定的两个《提纲》，经中央批准后，又决定由我执笔编写《回回民族问题》和《蒙古民族问题》两本书，完稿以后，我又编写了《蒙古社会经济》一书。这三本书统称为“民族问题丛书”，依次分别为“丛书之一”，

“丛书之二”和“丛书之三”。这三本书出版时署名是“民族问题研究会编”，没有用西北工委的名义，这是为了便于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丛书之一《回回民族问题》，1941年4月在延安解放社印刷出版，由新华书店发行，但没有用解放社名义。1945年山东的鲁南、渤海两地先后翻印过。解放后曾由民族出版社再版。这本书出版前，曾经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审查。徐老还为此找我谈了一次话，对这本书作了好的评价，同意出版。这的书序言是李维汉写的，书中还编入了李维汉发表在《解放》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作为第二章第二节。这一章的题目“长期被压迫与长期奋斗的回回民族”就是那篇文章的原题。书中的第三章“什么是伊斯兰教”，是我在《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五期发表过的同题文章；而第六章“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回回民族的出路”，则是我于1939年9月以“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为题在《新中华》报上发表过的。牙含章为搜集回回民族的来源和聚居西北的回族社会经济状况的资料，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丛书之二《蒙古民族问题》和丛书之三《蒙古社会经济》完稿时，适逢西北工委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西北中央局，由于机构的变动，没有付印。我把稿子带到西北局，并作了两次修改补充，但原来西北工委的负责人和以后的西北局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主任贾拓夫工作繁忙，一直无暇审阅，故而迟迟未能出版。直到1945年10月，日寇已经投降，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我要离开延安到前方去了，找到贾拓夫谈及此事，他说：“何必一直等我呢？已经定稿就行了。现在大家都要离开这里

上前线，延安处在繁忙之中，我建议你带到张家口去出版。”我只好把两本书的手稿带到了张家口。正好我留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就把书稿交给了内蒙古出版社。《蒙古民族问题》一书已由这个出版社于1946年8月出版发行了。《蒙古社会经济》一书也已印刷完毕，只差装订便可发行。这时，由于国民党向张家口大举进攻，我们向锡林郭勒草原撤退，出版社把没有来得及装订的书页和全部手稿都装上马车运到贝子庙去。没有想到雇来的马车夫半路开小差跑了。人、马、印张还有出版社的其他东西全都丢失了，我的手稿也丢失了。此后也没有机会把这本书重写出来，真是一件憾事。

在《蒙古民族问题》一书中，特别引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蒙古族委员那素滴勒盖先生的临终遗言。那素滴勒盖因听说国民党反动派在伊克昭盟侵占蒙地而悲愤成疾，在病中又得悉国民党反动派撤退了警备日寇的河防部队来进攻陕甘宁边区，更是义愤填膺。他在临终遗言中着重讲了根据他自己奋斗30年的切身经验所坚决相信的蒙古民族解放的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问题。他说“要打倒日寇，要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光靠我们蒙古民族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与中国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并须获得先进的革命力量的指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先生，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是唯一能指导和帮助我们蒙古民族解放的力量，因为他们真正为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先进革命力量。共产党奋斗的方向，是全中国人民奋斗的方向，也就是真正解

放蒙古民族的唯一方向，德王现在所走的道路是死路，国民党反动派也只能给我们奴役和痛苦，只有共产党能给我们光明和幸福。共产党必将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途，也必能指导我们蒙古民族真正获得解放。根据我的经验，如果没有共产党指导和帮助，我们蒙古民族的解放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们所有的蒙古同胞都必须牢牢记住，并须坚决拥护共产党，并接受共产党、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的帮助与指导，以求我们蒙古民族的解放。”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抗日民族根据地陕甘宁地区民族团结好，民族关系融洽，是执行党的民族平等政策的典范，被少数民族称誉为少数民族解放的灯塔。陕甘宁边区境内，少数民族人口虽然不多，但在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中对如何实行民族平等仍然作了如下的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并付诸实施了。边区的关中、陇东、三边三个专区都有回民居住的乡村，边区政府帮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回民乡和自治区。边区政府还有蒙古族委员，边区参议会会有回族、蒙古族参议员。1941年8月，边区政府又设立了管理少数民族工作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少数民族工作（当时主要是蒙、回民族工作）更是非常活跃。毛泽东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的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说：“多年以来，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各解放区对待蒙回两民族的态度是正确的，其工作是有

成绩的。”

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协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随即组成了以党、政、军负责同志，蒙、回民族的知名人士和负责同志，文化界与其他各界的负责同志以及有关人员为委员的两个筹备委员会，发表了建立两个促进会的缘起。“蒙古文化促进会”的缘起宣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沟通蒙、汉文化，帮助发扬蒙古民族的优良文化，创造与发展蒙古民族之新文化，并使蒙、汉共同努力于抗战建国之事业”。并指出：“全中国文化界，亦应从文化工作上来发扬蒙古民族优良传统与革命精神，以之教育蒙古民族及全国人民，提高并发展蒙古民族的民主文化生活，启发蒙古民族的抗日自信与热忱。”“回民文化促进会”缘起则宣布：“促进回族文化的发展，建立回族新文化，从文化工作上来提高回族抗日的热忱与自信，实现更亲密的回、汉抗日团结，乃是各抗日党派与文化界的重要任务。”“更进一步提高边区回民的文化，并使回汉间对彼此的历史、文化、宗教风俗习惯有正确的认识与了解，进而更亲密回、汉的团结，共同发展，是边区各界目前迫切的任务。”

1940年2月26日，在延安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在成立大会上，代表们提议：建立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延安建立清真寺和回民食堂。这次大会建立了陕甘宁边区回族自己的第一个组织。

“蒙古文化促进会”1940年3月31日成立，成立大会主席台上悬挂着成吉思汗的画像，大会通过毛泽东、朱德、

阿耳木（当时外蒙古大呼拉尔的主席）、沙克都尔扎布（伊克昭盟盟长）、王明、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孙科、于右任、宋庆龄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吴玉章、林伯渠、李富春、高岗、李维汉、乌勒图那素图、阿拉腾扎布、高自立、肖劲光等 23 人为主席团。大会推举毛泽东、阿耳木、沙克都尔扎布、王明、特克斯阿固朗、张闻天、荣祥、白海峰、奇峻峰、王稼祥、康达多尔吉、鄂尔尔呼雅克图、图布升清尔格勒、旺清扎布、奇文英、色登多尔吉、达理扎雅、塔旺扎布、阿凌阿、冯玉祥、邵力子、喜饶嘉错等为名誉理事；吴玉章、林伯渠、李富春、高岗、李维汉、乌勒图那素图、阿拉腾扎布、巴彦图和各方面、各民族的人士等 35 人为理事，吴玉章任会长，还设立了常务理事，由赵通儒主持工作。成立大会热烈通过了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蒙古文化陈列馆的建议。建成后，经由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军负责同志发起，举行了成吉思汗的夏季公祭（农历 6 月 20 日）和纪念堂、陈列馆落成典礼。简短的发起启事是我执笔起草的，用的是文言体。启事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以成吉思汗为杰出”。7 月 4 日隆重公祭那一天，朱总司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高自立、李维汉和王明、高岗等参加了。朱总司令、董必武、蒙古族代表石宝山讲了话，王明、高岗也讲了话。纪念堂匾额下面悬挂题有“世界巨人”四个大字的横幅。

成吉思汗祭典，1939 年在延安也曾隆重举行过。当时是日寇侵华战争更深入了，归绥、包头相继沦陷，伊克昭

盟岌岌可危，伊盟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墓也面临劫难。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侵略和政治渗透是两手并用的，加上有些不明大义的蒙古王公贵族或明或暗地和日寇勾结，灵柩有被夺被盗的危险，蒙古民族有识之士都为此担忧。国民党也怕灵柩一旦被夺被盗，将受到蒙古人民和全国人民的谴责，对他们十分不利。于是主张移灵，移到兰州附近的兴隆山去^①。

成吉思汗陵可以说是衣冠冢，埋葬的是珠宝镶成的一个金属箱子，里面放的是成吉思汗的遗物。成吉思汗的遗体究竟埋到什么地方，史书记载不详，后人解释也不一致，至今无人知道。只知道他死在宁夏、甘肃一带的六盘山。有的记载传说，当时运送棺木的军队把沿途碰到的人都杀掉了，因此没有人见到灵柩究竟送到和埋葬到哪里去了。蒙古族人民都纪念成吉思汗，因此每年蒙古王公都要在陵前为他举行大祭。

移灵途中经过陕甘宁边区时，党中央决定在延安为成吉思汗设隆重的祭典，延安各界有100多个单位约1万多人参加，由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代表滕代远主祭。在祭文中对成吉思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如何评价成吉思汗，是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评论中的一个大问题，迄无定论。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地评价了成吉思汗的

^① 全国解放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隆重地把成吉思汗灵柩迁回了伊金霍洛，重新修建了一座壮丽辉煌的蒙古包式的陵墓，年年隆重致祭。

功与过，认为他还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民族英雄，他前半生统一了蒙古各个部落，对蒙古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建立强大的国家是有很大贡献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党隆重地纪念他，并举行了两次盛大的祭典。第一次的祭文中说：“元朝太祖，世界英杰”；第二次祭文又说“宇宙巨人，……古今无匹”。他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封建时代的帝王，不应因为强大以后曾侵占欧亚许多国家而一概抹杀他的历史功绩。蒙古民族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但是历经明、清两个朝代，特别是清代，被统治者的羁縻怀柔政策和削弱政策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民族的发展。从表面现象看，清朝统治者给予了蒙古民族远远高出汉族和其它民族的地位。但从他们对蒙古民族的政策看来，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消灭蒙古民族的战斗精神。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使蒙古民族和中国各民族共同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处在日寇侵略、占领下的蒙古民族要抗日图存，各兄弟民族共同驱逐日寇出中国和内蒙古地区，最需要的是战斗精神。发扬蒙古民族具有的战斗精神，就能够增强战胜共同敌人日寇的信心和决心，这是最可贵的。根据以上的看法，所以贾拓夫向西北工委提出了在延安为成吉思汗建立纪念堂的建议，并得到中央批准。

蒙古文化促进会在杨家湾打了三孔大窑洞，中间是成吉思汗纪念堂，两边是蒙古文化陈列馆。成吉思汗纪念堂的大字匾额是毛泽东亲笔题写的。纪念堂中央是成吉思汗的石膏像，是鲁艺的雕塑家塑造的。当时要想找到一幅成

吉思汗的画像是很困难的，只在一本书上有一张。据说是外国人画的，头戴缨帽，身穿盔袍，服饰不同于蒙古民族的，倒象中亚一带的服装，与过去看到过的元太祖像不同。但只有这一张，只好依此塑造了一人高的半身像。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上挂的大幅成吉思汗像，也是依据这幅像由鲁艺的画家画的。陈列馆平时是蒙古同志聚会、阅览和游艺的场所，每逢星期六、星期日或节假日，大家便到这里来看书、读报、下棋或进行其它游艺活动，十分热闹。

延安清真寺是1940年10月7日落成的，举行了落成典礼。同日下午，又举行大会，宣告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和陕甘宁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这是继成吉思汗纪念堂落成和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后的又一盛举。与此同时，延安回民食堂也开业了。

延安居民中回民不多，有一些从外面来的商人，各机关、学校中都有回族，不过人数也不很多。但是为了尊重回教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体现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我们党和边区政府仍然积极支持和帮助回民建立自己的清真寺和回民食堂，还于1941年7月从关中地区聘请马生福阿訇担任清真寺的教长。清真寺建在青年文化沟（即大砭沟）内的桃花山上，环境非常幽静，由毛泽东署名亲自题写的“清真寺”三个大字刻在寺前古老的石碑坊上。清真寺的建筑具有伊斯兰教建筑的特色和回族的民族形式。工程壮观，装饰清雅，在当时的延安，可算是漂亮的建筑了。这座清真寺后来被侵占延安的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烧毁。回

民食堂建在青年文化沟口，是一个热闹的地方。食堂开业后，不仅方便了回族，因为菜肴可口，富有回族食品特色，很受欢迎，各民族的同志也都愿来这里品尝，真是座无虚席。

延安清真寺的落成典礼也是隆重举行的，朱德、高自立、谢觉哉、李维汉等参加了典礼并讲了话。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回民文化促进会成立和边区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时，朱德、张闻天、高自立、谢觉哉和王明等参加并讲了话。回民文化促进会由谢觉哉任会长，常务理事主持日常工作。边区回协选举鲜维峻为主任，先后在回协主持过工作的还有金浪白、苏冰（女）、张杰（延安清真寺副教长）。

以上各项工作都是由西北工委提议经中央同意后安排进行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效果很好，影响很大，至今在延安工作、学习过的少数民族同志提起来还是很怀念的。这些工作和活动我都参加了，我也是蒙古和回民两个文化促进会的发起人，并是理事和常务理事之一。

此外，西北工委派出了一部分少数民族干部，分赴蒙、回民族地区做党的地下工作，如派乌兰（女）到伊克昭盟去，马文良（回族）到宁夏去，沈遐熙到甘肃西海固去。乌兰后因被发现回延安了。马文良则被杀害了。沈遐熙（现在是中国伊斯兰协会副主任）到甘肃以后，长期隐蔽下来了，他从满拉（阿訇的学生）开始，一直到当了阿訇、教长。因为他熟读经文，精通伊斯兰教教义，许多老阿訇都比不过他。一个共产党员为了献身于中国革命事业和回族

的解放事业，做到如此地步，是很不容易的。

我到西北工委已经是第二次在党中央部门工作了，这不仅使我能在工作中得到更多的锻炼，也给了我好好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学习是两方面的，一是向中央领导同志学习，向老同志、老红军、老革命和各方面的同志学习；一是读书，主要是读马列著作、党的文献、中央文件和负责同志的著作；还有就是听他们作报告。

西北工委开始工作不久，李维汉带着西北工委和干教部的几个同志（何定华、朱改、孙力余，他们也是从陕公分校调来的）和我去几个中央部门看望过，大概是通报一下两个单位新成立的情况，和请这些部门的负责同志指教、协助吧。在中央组织部见到了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他们作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陈云。他态度平易近人，谈笑风生，还逐个问了我们几个人一些情况。在中央军委，见到了总政主任王稼祥、副总参谋长王若飞。在这里还见到秦邦宪。

张闻天住西北工委、中宣部、干教部所在地蓝家坪，中央负责同志常到这里来。从敌后或国民党统治区回来的同志也常常住在这里。我们偶尔从张闻天住的窑洞外面走过，还听到过毛泽东说话的宏亮声音。刘少奇从敌后回来，在马列学院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报告，我在场听讲，至今仍受教益。邓小平从前线回来，住在上层窑洞里。我同在中宣部工作的吴允中（江西人，陕公毕业，江西省政协副主席）特意去看他，受到亲切、热情的接待。

延安是抗日后方，有一个坐下来学习的好环境。中央

对干部教育非常重视，对在延安工作同志的学习抓得很紧，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就是专管这项工作的。当时中央曾作出关于干部教育、学习问题的指示，中央各部门据此都组织了学习小组和读书小组，从中央负责同志到一般干部都参加学习。小组大体上是依地区组成的。如杨家岭中央直属部门的学习小组，大砭沟中组部，蓝家坪中宣部、干教部、西北工委，王家坪军委各部门的学习小组等等。也有按问题组成的，如哲学读书小组、资本论读书小组等等。各小组都由领导同志亲自负责，带头学习，如张闻天、陈云等都担任着组长。当时的学习空气是非常浓厚的，形成了学习高潮，而且延续不衰。大家都渴求知识，勤奋攻读，真是手不释卷。很多中央负责同志当时都聚集在延安。有他们当教师，作引导，学习条件是很优越的。因此，延安的干部学习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大大提高了干部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参加中宣部这个地区的学习小组和读书小组，每天按计划读书，写笔记。开始好象是读联共党史，后来又参加哲学组、资本论组。吴亮平、杨松、艾思奇等专家学者都参加并主持过读书组。每次讨论会上，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都发言，讲自己的心得。互相切磋，使我这样不懂理论，学识浅薄的人，得到许多启发，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深受教益。因此我虽然学得不好，在小组会几乎没有发言，但学业还是很有进步的。这一段的学习可以说是我读书的“黄金时期”，后来就很少象这样坐下来一心攻读了。

为了进行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教育，张闻天、陈云等分工写了一本“党的建设”教材稿子，我们还参加讨论过。后来毛泽东修改了一部分，重写了一部分，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名的文章。

在延安，中央负责同志经常在重要会议上讲话，或向干部作报告。讲政治形势，讲理论问题，讲工作问题，讲经济、文化等专门问题，讲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理论联系实际总结经验，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引人入胜。这是对干部最好的教育，也是同志们特别是青年同志们最好的学习机会。

但是，我们也还听到过少数被毛泽东称之为教条主义党八股的报告和讲话，真是“八条”（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说党八股有八大罪状）：齐全。对比之下，优劣立辨。王明、康生就是这样。康生在延安时间很长，作过不少有问题的报告，最突出的是有关“抢救运动”的讲话。而且他作报告时总是要搬来一大摞俄文版的列斯著作，讲一句，当场翻释一大段。王明在斯大林60岁生日那天，在中组部会场作了一个报告，介绍斯大林的生平。他一开始就宣布要讲十大部分，也是搬来一大摞俄文原著，不停地翻念。从晚上七点一直讲到凌晨一点，刚讲完了第一部分，还只是一个帽子。他自己声音嘶哑，大家也疲惫不堪，听不下去。台下议论纷纷，只好宣布休会，另定日期再报告。但后来一直也没有继续作。他个子很矮，穿了一双特制的后跟很高很高的高筒皮靴，大家都看不惯。

在西北工委时，我们不仅工作、学习，还参加生产劳

动。中央各机关很早就开始自己搞生产了，西北工委和中宣部、干教部是一个伙食单位，也是一个生产劳动单位。那时工作人员先是星期日帮厨做饭，让炊事员同志休息。后来开始了生产，主要是参加农业劳动。边区大生产运动开始以后，又有纺线、种菜等等，热火朝天，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春季土地解冻开始，我们上山开荒、施肥、打土，接着是间苗、锄草，直到秋天收割、打场，全过程都是自己动手。只有播种，我们不行，需要请来老农帮助。因为土地多在山上，所以种的都是谷子（小米）。多年的荒坡，我们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经验，劳动力又弱，所以收获量不大。但是经过多少天起早贪黑的辛勤劳动以后，看到自己收获的金黄色的颗粒，尽管数量不多，还是令人充满着说不出的喜悦，而且期待着来年把生产搞得更好。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所以在秋收时，更是掩藏不住内心喜悦。在同志们中，我是个弱劳力，在生产中没有得力之处。但是我自己却从生产劳动中得到锻炼，而且是多方面的。从思想到身体，主要是增强了劳动观念和阶级意识，这是非常可贵的。延安的大生产运动是人人参加的，从中央领导同志到一般工作人员，每人都有一定的任务。我看见毛泽东在地里劳动，也看见过陈云挑粪积肥。中央领导同志原先都是参加农业劳动的，后来实在忙不过来，就规定了每人纺几斤纱。同志们出于阶级友爱，都争着替中央领导同志纺纱，他们都不肯答应。在西北工委，藏、彝族同志都是劳动人民出身，劳动力强，也最努力，他们还为我们研究室打了几孔窑洞。

我在西北工委除了研究国内民族问题和做少数民族工作以外，还兼做了一些其他工作。当时抗日缺少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问题教员，罗瑞卿来干教部要求派人。李维汉把我找来作了介绍，于是我到了抗大兼任教员，讲了一期课。后来我又在陕北公学（1940年在延安复校）和党校回民班讲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我还兼任了中宣部编审委员会的委员，但没有分工。除了我在西北工委编写三本“民族问题丛书”以外，没有作其他工作。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集中了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很多革命艺术家、文学家。1939年春，他们对工作、学习、生活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反映到了中宣部，所以由李维汉去处理，他让我一起去了。我作了一些调查，找了很多同志谈情况。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我在中组部和陕公工作时认识的，也有知名而不相识的，如冼星海。李维汉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向中宣部作了汇报并指定我起草一个讲话稿。这个稿子的内容和文字都记不清了，只记得结束时引用了鲁迅这样一段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意思是说：边区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是新的天地。大家认为是圣地，为全国所向往。这块地方是经过流血牺牲才开创出来的。这里所走的道路就是中国革命的道路，这里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方向，是全中国人民的希望，大家都认为这条路走得对。李维汉采用了这个稿子，经过修改，作了报告。

在民族学院期间

1941年5月，党中央决定西北工委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为西北中央局，书记是高岗。西北工委的工作都移交西北局，民族问题研究室也合并到了西北局。当时我曾经向张闻天要求留在中央机关工作，没有同意。西北局设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专管少数民族工作。贾拓夫是西北局秘书长、统战部长兼民工委主任。委员有李卓然（西北局宣传部长）杨一木、刘瑞森、鲜维峻（后兼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我和赵通儒（后兼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等。杨一木兼秘书室主任，我兼研究室主任。研究室还有牙含章、孔飞、克力更、乌兰等。秘书室还有刘景平。这一段工作时间不太长，我和研究室的同志被调到了民族学院。

民族学院是为了适应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培养全国少数民族干部，首先是蒙、回民族干部，于1941年10月在延安成立的。院址在青年文化沟北山波上，是在原青年干部学校校址上建立起来的。

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是根据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学生的特点制定的。民族学院对学生着重进行中国革命问题和各民族团结抗日共求解放的政治思想教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中国国内民族问题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文化知识和时事政

策的教育。在高年级学生中，还进行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理论的教育。

民族学院成立之前，党中央就曾指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分期分批地把一些蒙古族青年骨干送到延安来培养。我记得第一批青年是由奎壁送来的，以后还有张禄、李森等陆续送来的，党中央非常重视和爱护这批少数民族青年。当时延安已设有许多所学校，如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等等，都有一些少数民族学生。西北工委决定从大青山来的同志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专门设立了一个民族部，由王铎任主任，实行专门制定的教学计划。我在民族部兼任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教员。我的爱人伊力当时也在这个学校学习，和奎壁是同班，她和其他几个同志是民族政策的课代表。

民族学院是在陕北公学民族部、中央党校回民班、西北工委研究室的藏、彝族及其它学校里的少数民族学生汇集起来的基础上成立的。院长是高岗，副院长是高克林，乌兰夫是教育处长，王铎是副处长。稍后一些又调宗群也任副处长，赛农（宣侠夫）是干部处长，梁达君是总务处长，田广润是副处长。民族学院专职教员不多，很多工作人员都兼任教职。教务处工作人员和教员有王云、王仲芳、周急（女）海涛（女、回族）等同志。学校还专门设了一个研究部，后改称研究处。是在西北局民工委研究室的基础上组成的。增加了马寅（回族）、董英、韩戈鲁、海明和由晋察冀边区来延安的刘元复（关起义）、包彦（包正言）（他们都是蒙族）等同志。我们研究部部长，后改为处长。

我还受院长、副院长聘请为民族学院教授。研究处后来又由我和乌兰夫负责的中央调查研究局第四分局（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的民族问题研究室。这是民族学院创办初期的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的情况，以后迭有变动。学生分班学习，高年级的课程有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时事政治。低年级只开设政治课（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时事政策常识）和文化课（汉语文、少数民族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和自然常识）。有工作经验年纪比较大一些的以及从大青山来的做蒙古工作的汉族同学，编为研究班。杨静仁（回族）和蒙族同学云北峰、寒峰、陈炳宇、黄静涛、乜子青等同志，当时都在研究班。到延安来的蒙族青年很年轻，如潮洛蒙、浩凡、云世英、云治安、李存义、李明等男同志和云清、云丽文、云曙碧、云曙芬、任斌、黄静波等女同志。还有一些年龄小的，象布赫吧，当时只有十几岁，他们是一批小学员。太小了，只有送到延安保育小学学习了。

民族学院的学生共约 300 人，蒙族学生最多；其次是回族。除了原中央学校回民班的学生，还有参加甘肃暴动的回民。回民班的学生是红二十五军经过陕南、甘肃时，由参加红军的回民组成的回民师的骨干。班主任就是师长马青年，但他没有随班来民族学院。参加暴动的回民学生是西（吉）海（原）固（原）一带的农民。他们为了反抗国民党蒋介石大汉族主义的压迫，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国民党派出了部队，动用了飞机、大炮，残酷镇压。回民

浴血抵抗，伤亡惨重，后来实在寡不敌众，抵挡不住了。知道党和边区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帮助回族解放，派人来接洽，要求保护。中央同意并决定把这个部队全部接进边区。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旅的番号，一个团的建制；人剩下不多了，其中的一部分骨干由团长马思义（“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带着到了民族学院学习。旅长马国藩先生（教主）作为回民代表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由司令员马本斋率领的冀中回民支队，是一支党领导下的在敌后同日寇英勇作战，屡建奇功的回民武装，是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主力之一，被冀中军区嘉奖为“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为此党中央、军委曾颁令嘉奖过马本斋。马本斋的母亲在被捕后，日寇威逼她写信劝马本斋投降，遭到她的痛骂和严词拒绝。她大义凛然，不可侵犯。后因不堪摧残，绝食而死。听说是党中央考虑到这支部队在和日寇作战中损失很大，马本斋又积劳成疾，决定撤回来补充休养，担任保卫党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光荣任务。1944年1月底中央命令支队撤回，2月初马本斋就因病情恶化，不幸逝世了。他临终时为自己不能随军回延安，深为遗憾。延安各族各界为了追悼马本斋，曾于主玛日（3月17日）在清真寺举行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送挽幛和挽联，致以深切的哀悼，表彰中华民族和回族英雄母子的一生。毛泽东的挽幛是：“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联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周恩来的挽联的：“民族

英雄，吾党战士。”吴玉章、林伯渠、叶剑英、贾拓夫等参加了大会。贾拓夫代表西北局在追悼大会上讲了话，指出马本斋“代表着回回民族和中华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延安报纸当时曾作过大量的报导。

1942年初乌兰夫调离民族学院，到中央党校学习。没过多久，中央又调走了高克林。西北局便决定由我任教育处长处理院务。不久又由王铎任秘书长。民族学院设总支，总支书记第一任是杨春林，第二任是王志强，第三任是刘景平。

1942年2月，延安整风开始，下半年全面展开，西北局决定由王铎、宗群、宋友田、王志强、刘景平和我组成整风学习委员会，主持整风学习，我为主任。不久，中央决定把民族学院、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社会科学院、行政学院、自然科学学院等几所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民族学院由青年文化沟迁到桥沟，同鲁艺在一起（1937年中央党校校址就在这里，后来又是鲁艺校址）。延大校长是吴玉章，副校长是周扬，校务委员有各学院的负责人和政治部主任宋侃夫，我也是成员之一。当时民族学院院务由学委会负责，并增加了龚尔群为学委会委员。

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有不少同志受到审查，特别是后期的“抢救运动”中，错把几个同志整为所谓的“特务”，但所有这些都是完全搞错了的。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由我负主要责任。1943年冬，审查干部停止了，被整的同志后来都甄别平反了。

党在革命中心延安成立一所由汉、满、蒙、回、藏、苗、

彝 7 个民族学员组成的少数民族革命学府——民族学院，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解决国内的民族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民族学院受到毛泽东、党中央和西北局的关怀，得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党和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保障学院的供给，扩建校舍、添置设备。少数民族学生粮食供给标准比其他学生多，每人每月还多发 10 斤白面。服装也是每人每年加发一套单衣，每年一套棉衣，而其他机关，学校则是每年一套单衣，三年一套棉衣。每逢民族节日，还按照民族风俗习惯庆祝、会餐。党中央和西北局要求民族学院不仅是学习的学校，还应是一个工作的学校。1944 年 11 月，毛泽东对民族学院的教育方针和学生生活等问题作过重要指示。他说：“要经过民族学院培养一批实际工作（指党、政、军、群工作等等）、一批文教工作干部。”还指出：蒙族“学生蒙、汉文都要学习好”。毛泽东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特别指示对民族学院学生生活要适当照顾，说对民族学院学生生活要“特殊点，优待点”。民族学院就是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办校的，它继承了党创办革命干部学校的优良传统，具有良好的学风和校风。同学们不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与抗日战争的实际知识，学习文化，提高政治、文化水平，还积极参加各种工作实习，培养实际工作能力；并且动手打窑洞，种粮食、蔬菜，烧木炭，在生产劳动中锻炼自己。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民族学院学生开荒，种地、收获都很出色，被称为“好劳动”。原来还计划要进行一个时期的军事训练，才派到抗日前线和工作岗位上去，因

为抗战形势迅速发展，急需干部而没有实施。同学们的课余文化活动也是很活跃的，经常演唱自己创作、编写的歌曲和秧歌剧，还在新年、春节期间进行拥军优属和其他慰问演出，大受群众欢迎，得到延安文艺界的好评。

在延安革命大家庭里，在民族学院这座革命熔炉中，少数民族和汉族学生都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以及民族解放、社会解放觉悟和阶级觉悟；提高了对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认识；提高了对反对大汉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少同志还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党的精心培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延安民族学院培养出大批的少数民族干部，输送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前线以及革命最需要的地方，为各民族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民族院校歌，是音乐家吕骥作曲。歌词原是我写的，谱曲时，由鲁艺文艺系的天蓝作了修改。现在约略想起了歌词的大意是：我们是中华各民族优秀的子孙，我们是祖国大家庭友爱的兄弟。汉、满、蒙、回、藏、苗、彝，亲密团结在一起，今天共同学习武装自己，明天共同战斗并肩抗战。同志们！联合起来！让我们高举中华民族共求解放的革命旗帜，齐心协力，步伐一致，向着平等、自由、幸福各民族统一的新中国，胜利前进！至于歌曲，则记不起来了。

为了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

1941年9月由朱德总司令召集东方民族代表座谈会，讨论筹组“大同盟”的问题，到会的有国际国内的团体20个和国际国内的同志21人，发起成立“大同盟”。发表了召集延安东方民族代表大会宣言。这是民族学院创办后不久的事。发起人有朱德、吴玉章、林伯渠、李维汉、贾拓夫、高岗等。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延安蒙古同学会、延安藏民同学会延安彝民同学会，陕甘宁边区蒙古文化促进会、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和民族学院都是参加发起的团体，民族学院的两位少数民族代表和我也是发起人。

10月26日晚，大会开幕了。东方各国和国内的18个民族的100多位代表参加了大会，显示了东方各民族空前广泛的大团结，充满着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和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激昂情绪和气氛。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作了总报告。毛泽东主席到会讲了话，号召各民族加强团结。大会上宣告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选举出了“大同盟”执行委员，朱德为“大同盟”主席。民族学院有很多同志作为代表出席了会议，有的同志参加了会议的工作，全体师生也都参加了大会。

1944年整风运动结束以后，中央和西北局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已经学习好几年，特别是这么一大批蒙古族学生，年纪都很轻，在延安也没有机会接触实际工作，所以决定把民族学院从延安大学分出来，迁到三边地区，边学习，边工作。那里紧邻伊克昭盟和宁夏，可以接触蒙民和回民，参加一些实际工作。1944年春，民族学院从延安迁到了定边，

和当时的定边中学合在一起。一个是中学，一个是民族学院，统称三边公学。民族学院的建制照旧，我和王铎是民族学院的副院长。到了定边以后，由王铎、宗群等带领民族学院的学生到边区的边境做了调查工作和文艺宣传工作。在定边城郊聚居着主要是从宁夏跑到定边来的忍受不了回族军阀压迫的回民，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成立了一个回族自治乡。民族学院的工作人员和回、蒙等各族学生，都参加了这项工作。1944年7月，我被调到三边地委统战部任副部长，分管伊克昭盟的蒙古民族工作，民族学院由王铎负责。后来民族学院又从三边公学分出来了。

告别延安，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1945年初快到农历年三十了，三边地委接到西北局急电，调我立即回西北局工作。于是在农历正月初四那天，我离开三边地委上路了。

到了西北局才知道，随着革命形势发展，中央决定成立绥蒙区党委、绥蒙政府和绥蒙军区。乌兰夫将出任绥蒙政府主席。乌兰夫这时已经离开中央党校到西北局管民族工作。由于他要走，西北局才决定由我来接替他的工作。

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绥蒙党、政、军负责同志讨论绥蒙工作的会议。当时党中央决定的绥蒙区负责同志的分工是：区党委书记高克林，绥蒙政府主席乌兰夫，副主席杨植霖。军区司令员姚哲，副司令员张达志。党委组织部长

苏谦益，政府秘书长王铎。当时高克林、苏谦益还在偏关、大青山，没有参加会议。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七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总纲，提出了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肃清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大众的压迫，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和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阐述了我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主张和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

乌兰夫、奎璧是“七大”的代表，乌兰夫在会议上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这时乌兰夫等同志，决定带一批干部过黄河到大青山去。

我国南方的革命形势也在大发展。中央决定分几路人马到南方去开展工作。我也想随着去江西的干部队伍打回老家去。组织上没有批准我的要求。我想可能因为我是做少数民族工作的，所以没有同意，因此就不再提了。

没有多久，由于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和内蒙古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8月15日，日寇宣布投降，抗战胜利了。根据当时的形势，党要派大批军队到东北去，延安的同志大部分都要调出去。当时同志们真是兴奋得很，无不等待着组织上的调动，尤其是在延安工作已久的同志，更纷纷向党申请到新的地方和新的岗位上去，我也没有例外。我当

时正在八路军总医院养病，日寇投降的消息促使我提前出院了。我先是向贾拓夫要求到东北去，因为内蒙古东部就在那里，他没有答应。接着我又直接向高岗提出，他同意了。于是我拿着他的信到李富春（中央副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经部长）那里，请求解决行军中的马匹问题。富春谈话时告诉我，组织上已确定我到热河去，这时我真高兴。我说：“西北局给了我一匹马，我一家四口，两个孩子都很小，万里远征，实在困难，所以决心把不到一岁的女孩子送给别的同志。但是还有三岁的男孩子和爱人伊力同行，仅有一匹马要想跟上大队行军是很困难的。”他说：“我这里是没有多的骡马了，这样吧，组织上给你150块银元，自己想想办法吧。”他还告诉我，中央要成立冀热辽中央局，在热河承德，我的工作到中央局分配，他也很快要走了。我这才知道，中央已经决定李富春任冀热辽中央局书记了。

我用钱买到一头驴，于是准备好行装就要上路了。多亏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秘书贺廷俊的帮助。我们把女孩子送给了她的舅舅，他们老两口再三说一定把孩子带好。出发的那天，伊力送孩子，迟迟不归。我真怕她改变主意，又把孩子带回来。等啊等，一直等到太阳落山，她才含着满眼泪水回来了。这时我们的行军大队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了。我没有再问起孩子的事，更没有埋怨她，急忙把三岁的男孩放进筐子里。那头驴一边驮孩子，一边驮行李，让伊力骑在马上，我和公务员刘钧书步行。走了大半夜，才赶到大队的宿营地，总算没有掉队。刘钧书以后在王爷庙

(乌兰浩特)手枪走火，不幸去世了，回忆这段往事时，对他不胜怀念。

渡过黄河到达山西，横跨同蒲铁路时，要在深夜通过阎锡山部队的封锁线，许多长征过来没见过火车的同志，尽管行军那么紧迫，又到处响着枪声，他们还是一个个弯下腰来，用手去摸摸铁轨。到了阳高，坐上了火车，别提他们有多高兴了。我们通过雁门关地区，都是在冰雪满地的高山行军。天寒路滑，有一次毛驴摔倒了，筐子和孩子几乎滑到山谷里，幸亏被一棵小树挡住，没有掉下去。由此领队的同志决定在这段路上，请当地群众背着小孩走，以免出事。

路上走了40多天，我们终于到了张家口，按照行军计划，要在这里休息几天再走。我们住的招待所原来是一家饭店，对面则是解放饭店。我们全家刚到招待所门口，准备把孩子和行李放下来，就听得对面楼上有人喊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乌兰夫正在解放饭店的窗口向我招手。突然相遇，大家都感到很高兴，他邀我们到解放饭店住下了。

原来乌兰夫从延安出来，刚过黄河，日寇就投降了。苏蒙联军进到张北，我军解放了张家口，急需开展内蒙古的工作，党中央决定他不去绥远了，所以转到张家口来了。交谈中，他问我的去向，我说：“组织上决定我到冀热辽中央局去”。他说：“你不要去承德了，就留在张家口吧，这里正在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很需要人”。我说：“李富春要我去承德，到中央局分配工作，怎能不去？”乌兰夫又说：“我告诉你，冀热辽中央局不成立了，承德设立冀热

辽中央分局，受晋察冀中央局（在张家口）领导，去热河的干部可以由中央局考虑分配。这么办吧，我负责向中央局提议，把你留下来”。乌兰夫当时已是晋察冀中央局的委员，他既这样说，我也就不再讲什么了。

第二天，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副部长李葆华找我谈话，通知我中央局决定我留在张家口，并到即将成立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工作。从那以后，我开始了在内蒙古的工作。

项英传略

王辅一

项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运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的长期斗争中，英勇奋斗，历尽艰辛，于1941年3月14日，不幸被叛徒杀害。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诚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

一、青少年时期

项英原名项德隆，又叫德龙，曾化名江钧、张成、夏英等，湖北省武昌县舒安乡项家村人。1898年5月出生于一个职员家庭里。父亲项文轩，是县里管理钱粮簿册的职员，为人忠厚老实。母亲夏氏，善良勤劳。兄妹4人，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下有妹妹。

7岁那年，项德隆进入武昌育才小学读书，学习刻苦。小学毕业那年，项德隆12岁，父亲不幸去世，家境迅速恶化，被迫辍学，三年找不到工作。靠他母亲纺织、刺绣所得的微薄收入养活他和他的妹妹，生活十分艰难。但他人穷志不短。他的叔父项仰之当时担任武昌慈善会会长，为

富不仁，不屑和他往来。

项德隆 15 岁那年，几经周折，考入武昌模范大工厂（纺织厂）当学徒。3 年满师后留厂当工人。工资很少，难以养家，妹妹还得时常去拣破烂。严酷的现实，激发了他对旧社会的憎恨。

1917 年冬，项德隆从进步报刊上得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受到很大鼓舞。1919 年的“五四”运动，对他的影响更大。当年，项德隆参加了董必武、陈潭秋等开办的工人夜校，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阶级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从那时起，他便在工厂中自发地从事工人运动。

1920 年，项德隆利用本厂工人对工头虐待的不满情绪，发动了一次罢工。资本家怕工人拖延时日，事态扩大，影响生意，就很快答应了工人的要求，开除了为工人所痛恨的工头。这是武汉纺织工人的第一次罢工斗争。工人们从中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纷纷参加工会，全厂性的工会迅速组成。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当年 10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包惠僧返回武汉，组织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决定组织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项德隆从《劳动周刊》上得到消息后，就主动地去找包惠僧，要求参加工会工作。包惠僧经过考察，于当年派他到江岸筹备铁路工人俱乐部。项德隆放弃自己纺织工人的职业，立即前往江岸，开始了俱乐部的筹备工作。从此，项德隆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江岸位于汉口北部，是京汉铁路南段的一个大的铁路

地区，居住着三千多名工人。项德隆在江岸铁路工人中，广泛地进行联系，深入地宣传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的《劳动法原则》等主张，深得工人的信任和拥护。他针对江岸铁路工人中帮口较多的情况，宣传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逐步消除了帮与帮的矛盾。他以杨德甫、林祥谦、曾玉良等各个帮口的工人领袖作骨干，进行宣传 and 串连，使工人逐步了解到俱乐部是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要求参加俱乐部的也就越来越多。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在老君殿举行成立大会。项德隆当选为干事。不久，项德隆在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里，办起业余学校，自己担任教员，帮助工人学习文化，提高政治觉悟。他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虽离家不远，但却很少回家探望，每天和工人们学习、生活在一起，亲密无间，深得工人的信赖。

项德隆举办工人俱乐部和夜校取得显著成绩。1922年4月，经包惠僧介绍，项德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武汉地区共产党的人数，总共不过10多人。

同年6月1日下午，江岸机车厂工人黄宝成遭到总查票程炎和铁路护车巡长姜道生无理殴打和扣押。程、姜还扬言：“打了，押了，看俱乐部能把我怎么样！”程、姜二人平日欺压工人，敲诈勒索，这次又蓄意挑起事端，激起工人们无比愤怒。项德隆代表工人起草了《京汉铁路南段工人俱乐部宣言》，在武汉三镇广为散发，揭露程炎、姜道生的罪行，提出查办凶手、鸣放鞭炮、赔礼道歉等条件，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与此同时，工人俱乐部积极进行

罢工的准备。京汉铁路南段段长冯云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久，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改为工会。

当时，项德隆经常以“夏英”的名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工人运动。入党后，便将项德隆改名为“项英”，此后直到牺牲，他都叫项英这个名字。

二、投身工人运动

根据党组织的决定，项英在江岸一带从事工人运动。江岸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使资本家非常恐惧，便勾结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兵镇压，武力封闭了汉阳钢铁厂工会。项英针锋相对，领导工人用罢工进行反击。资本家担心冶炼的钢水、铁水冷却后凝固堵塞熔炉，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武汉地区工会进一步得到了发展，成为当时中国工人运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项英作为湖北的代表，光荣地参加了党的“二大”。他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听取了关于列宁殖民地民族问题理论的传达，参与了制定党纲、党章和选举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工作。项英返回武汉后，迅速将“二大”精神向武汉党组织的负责人作了传达，并在自己的工作实践中加以贯彻。

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过程中，铁路工会发展很快。1922年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在郑州举行。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很重视，派项英、包惠僧、张国焘等

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筹委会，项英任总干事，并确定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在这次筹备会议之后，项英深入到京汉铁路南段的广水、信阳、驻马店等车站，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帮助他们组织基层工会，并将其中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共产党员。著名工人领袖施洋，就是项英和许白昊共同介绍入党的。经过各地工会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到当年年底，京汉铁路全线已组织起16个工会，会员达2万余人。从而为京汉铁路总工会的建立创造了良好条件。

1922年10月10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在武汉成立，项英当选为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他和林育南（秘书主任）、李求实（教育副主任）、施洋（法律顾问）等一起，在工人中培养骨干，积极发展工会，推动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向前发展。

1923年1月底，项英偕武汉地区党组织、工会负责人陈潭秋、林育南、李求实、林祥谦、施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包惠僧，以及武汉地区30多个团体的代表，乘专车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沿途受到各站工人的热烈欢迎。

军阀、官僚对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异常恐惧，阴谋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筹委会获悉这一消息后，立即派人赴洛阳与吴佩孚交涉，迄无结果。

在各地代表商议对策的会上，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将总工会成立的方式加以改变，有的主张改期开会，项英力

主按原定日期开会，慷慨陈词，听者为之动容。会议遂决定按预定计划如期举行。

2月1日上午，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冲破军警的阻拦，拥入会场。军警在外面层层包围，鸣枪威胁，而会场内，在“劳工万岁！”“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革命万岁！”等口号声中，会议紧急宣布开幕，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胜利诞生了。在这次会上，项英当选为总干事。

当天下午，会议代表的住所被军警占领，在饭馆所订的饭菜不准食用，向大会所赠的匾额、礼品全被砸毁，郑州铁路工会会所被封闭。反动军警的恶劣行径，使工人们无比愤怒。

2月1日晚上，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举行全路总罢工，以反对吴佩孚的武力压迫，并将总工会原筹备委员会改为罢工委员会，杨德甫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任副委员长，项英任总干事，强烈要求当局惩处警方与铁路有关人员，赔偿工会损失，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限2月4日上午10时答复。由于武汉工会会员多，组织健全，群众基础好，江岸工人集中，便于指挥，会议还决定将罢工指挥机关移到汉口江岸，进行罢工前的准备工作。

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在江岸正式办公，江岸成为罢工的指挥中心。项英作为罢工委员会总干事，紧张而迅速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再次表现出他的组织才能。

2月4日，工人提出的要求遭到当局的拒绝，京汉铁路

开始了全线罢工。在长达 2000 余里的京汉线上，客车、货车一律停驶，工厂一律停工。由项英参与起草和印制的《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敬告旅客》和《敬告本路司员》等文告，迅速在京汉铁路沿线各地张贴和散发。

罢工得到了北京、上海、湖南、安徽等各地各界人士的声援。

湖北督军肖耀南以武力胁迫工人复工，项英代表工人与之展开面对面的激烈斗争，迫使肖耀南将拘捕的工人放回。面对军警杀头的威胁，项英坚强不屈，毫不畏惧。

2月6日上午，中共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林育南等率领武汉各界代表，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先举行大会，后游行示威，项英、施洋、林祥谦等罢工领导人与之一起，走在数千游行队伍的前列，鼓舞了广大罢工工人和沿途群众。

罢工形势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军阀十分恐慌。吴佩孚看到威胁、利诱等阴谋均告失败，便命令军警在江岸、郑州、长辛店等地同时行动，血腥镇压罢工工人。

2月7日下午，大批军警开到江岸，逼迫共产党员林祥谦下令复工，林祥谦英勇不屈，慷慨就义。项英率工人纠察团同敌人展开了生死搏斗，寡不敌众，大批工人被捕，死伤者数百人。项英幸免于难。在江岸发生惨案的同时，郑州、长辛店等地也相继发生惨案。

项英在脱险后，不顾有随时被军警逮捕的危险，仍留在武汉处理善后工作，秘密指导工人运动。

“二七”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项英始终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才干，赢得了广大工人的信赖。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就“二七”大罢工的问题作了发言，高度赞扬了京汉铁路工人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年仅25岁的项英，第一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4年春，党中央调项英到上海担任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项英到上海后，根据党的指示，以沪西小沙渡作为他的工作重点，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

同年8月，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项英被选为俱乐部委员会主任。在俱乐部里，项英除教大家学文化外，还举办讲演会，宣讲爱国故事和工人斗争史实，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参加俱乐部的工人越来越多。到当年年底，沪西地区就有19个纱厂建立起俱乐部，会员近2000人。项英在俱乐部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当中发展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加强党在工人中的领导力量。顾正红、陶静轩等后来都成为上海工人运动的中坚分子。

1925年1月，项英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同年2月2日，日商内外棉八厂日籍领班任意殴打女工，日本资本家还无理开除一批工人。项英立即与俱乐部

委员会商量对付办法，一致认为应发动工人罢工，来打击日本资本家，借以提高工人的觉悟。党中央对这次行动很重视，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由李立三、邓中夏、项英负责领导这次罢工，并动员全体党员站在斗争第一线。由于这次罢工是以沪西工友俱乐部名义组织的，所以项英当时格外繁忙。他把全部身心都用于罢工的准备工作上。

同年2月9日，在党的领导下，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组织下，沪西各厂工人按预定计划开始罢工。到2月18日，参加罢工的有22家日本纱厂，约3.5万多名工人。这是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罢工。由于工人们团结一致，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最后日商被迫于3月1日答应工人提出的主要条件。

2月罢工的胜利，使上海工人受到很大的鼓舞，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工人中的威信大大提高，工人们纷纷参加工会。在罢工取得胜利的第3天，项英被推选负责筹建上海纱厂总工会。

同年4月，湖北政局由于吴佩孚的失败而发生变化，项英奉党中央的指示返回武汉，从事恢复工人运动和党的活动。不久，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又奉命调回上海，参加罢工领导，随后转入秘密活动。

1926年秋，在北伐军攻占武昌前夕，项英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又返回武汉，秘密从事党和工会的工作。他通过内线关系，瓦解守城的北洋军阀军队，组织兵工厂工人进行反对吴佩孚的罢工，使吴佩孚部队的军火无法补充；发动工人配合北伐军作战，攻占了武昌城。

1927年春，项英在武汉组织武装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他指挥的工人纠察队有4000余人，1000多支枪，配合北伐军维持武汉的社会秩序，还参加了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这时，武汉工会的会员有28万之多，力量是很大的。对于武汉工人在配合北伐军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刘少奇1927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总工会常务工作报告和周士弟在《叶挺独立团始末》一文中，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项英参加了这次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同年6月上旬，项英参加湖北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了中华职工运动情况的报告。随后，由于武汉白色恐怖，项英被党中央派往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项英被指派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同年5月，项英由上海起程赴哈尔滨，经满州里出境，赴苏联参加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举行前，他出席了斯大林召集部分代表和五届中委的谈话会，听取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形势的分析；还出席了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召集的“政治谈话会”，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过去的经验教训及今后的方针、任务，进行座谈讨论。大会开始时，项英作为主席团成员，和布哈林、斯大林、苏兆征、王凤飞一起，主持了6月19日上午的大会。在讨论政治报告、组织报告和职工运动时，他多次在大会发言；他还和其他28

人一起签名，向大会提出提案：“提议用大会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指示正确的政治路线”。其内容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变立即暴动的口号为宣传口号，切实制止盲动倾向，但对群众自发的暴动或乡村式的暴动，仍应积极领导；目前工作重心是挽救党与群众脱离的现状，在反帝运动、城市与乡村的日常斗争中，艰苦地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①。这个提案，得到多数代表的赞同，其基本精神，后被吸收到7月9日《对国内工作指示的电稿》中。在7月10日的大会上，项英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7月19日，在六届一中全会上，项英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随后，项英化名张成，于8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在莫斯科期间，项英还以极大的热情，撰写了《许白昊同志传略》和《郑覆他同志传略》，对和他一起从事工人运动的战友、被反动派杀害的上海市总工会两位领导人，给予高度的评价。

项英回国后，在党中央主要负责领导工会工作。1929年2月，项英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在总工会第二次扩大会上，作了《过去一年来职工运动发展的形势和目前的总任务》的报告。11月，在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上，项英作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报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并兼中共党团书记。在此期间，项英还参与党中

^① 《党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60页。

央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决定，协同周恩来等举办政治干部训练班、军事干部训练班，时常去作报告或回答学员提出的问题。

1930年8月，项英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当时，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主持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要求南京、武汉等地举行暴动。项英到武汉后，在军警密布、叛徒和密探四出活动的险恶情况下，一面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加强组织武装暴动的计划，同时多次用江钧之名，如实反映当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武汉三镇迭经破坏，目前党员数量不过百人，连团员80余人……赤色工会组织更加严重，总共会员百余人（还包括一大半党员），支部生活不健全，不能完全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领导机关“不能知道下面群众的情形”等等，说明武汉暴动的力量离客观的需要“相差得远”^①。

项英在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过程中，坚决执行党的指示，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舍生忘死，艰苦奋斗。特别是在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二月罢工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工人阶级有光辉的斗争历史，项英不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① 《星汉灿烂》第5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

三、在中央苏区

1930年春，党中央根据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不断扩大等情况，提出筹建全国苏维埃的任务。随后，决定成立“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向忠发、项英、毛泽东等为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同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①。同年11月，中央政治局在《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指出：“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②为了贯彻党中央的决定，组建苏区中央局和筹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重托，项英于当年12月底由福建进入江西，与朱德、毛泽东会合。

1931年1月15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小布正式成立，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等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周恩来因工作一时离不开中央，由项英代理书记。在苏区中央局成立的同时，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任主席，朱德任副主席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

^① 《党史通讯》中央党史研究室编，1986年第3期第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32页、第434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

副主席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局成立当天，就发布了《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的第1号公告。

项英进入中央苏区之初，在主持中央局和军委工作期间，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特别是他对当时江西地方和红军中肃反扩大化的问题，提出过以教育为主的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办法。1月26日，即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所发布的中央局的第2号公告中，严肃批评富田事变错误做法，并强调要“纠正过去反取消派AB团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①。

同年2月17日，项英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与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就《总政治部的任务及红军中政治部与政治委员的关系》^②，发布了军委第6号通令，强调了在红军中加强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规定了总政治部在红军中的任务及其地位，明确了总政治部与下级政治委员及政治部的关系、上级政治委员与下级政治委员的关系、上级政治部与下级政治部的关系、同级政治委员与政治部的关系。它对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同年2月29日，项英通过调查研究，在查清富田事变情况的基础上，发出中央局第十一号通告，明确指出：“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

① 《江西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82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政治学院编，第6册第382页。

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①项英并以中央局的名义，通知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到中央局开会，分清是非，解决纠纷。富田事变的领导人接受项英的批评，在会上作了检查。但是时隔几个月，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正确处理，即被“左”倾中央派赴苏区的代表团指摘为“完全错误的”，是搞“调和路线”而加以否定。

同年4月17日，项英以军委主席名义，与副主席朱德、毛泽东联合，发布军委第九号通令，决定在军委总参谋部设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着手搜集、总结各地红军作战经验，准备编写中国工农红军战史。这是在红军以至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要编写战史。

中央代表团同年4月到达中央苏区。不久，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委改组，项英改任中央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各苏区和红军各部队的62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推选主席团和常务主席领导大会的进行，项英是主席团和常务主席之一。在开幕式上，他代表主席团致开幕词。会议期间，他向大会作了劳动法草案的报告。19日，大会选出毛泽东、项英、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27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主席，项英当选为副主席，并兼劳动人民委员及代理财政委员。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

^① 《江西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82页。

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给全国劳动人民带来了翻身求解放的希望，鼓舞了全国人民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

1932年，项英致力于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当时毛泽东主席忙于在前方指挥作战，临时中央政府的日常工作主要由项英负责。他领导、督促各级苏维埃政权机关认真贯彻临时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动员和组织群众搞好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的供应；提倡树立努力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养成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反对不良倾向。

1933年1月，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成员先后到达瑞金，与苏区中央局合并在一起。同年5月，中革军委发出通令，增补项英为军委委员，并决定在军委主席朱德到前方时，由项英代理主席。在这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中革军委发布的许多命令、指示、训令，都是由项英以代主席的名义签发。

同年6月30日，由项英发布命令，决定将“八一”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指出：“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本委会为纪念南昌暴动与红军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①从那以后，“八

^① 《红色中华》报第93期第2版。

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当今中国人民解放的建军节。

同年7月9日，项英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奖励对革命战争的有功人员^①。据此，在当年的“八一”建军节时，中央军委对领导南昌起义和创建红军、指挥作战有特殊功勋的周恩来等，授予一等红星奖章；对领导红军卓有功勋的陈毅等34人，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对作战勇敢、成功卓著的王震等53人，授予三等红星奖章^②，以鼓舞广大红军指战员的革命热情，激励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同年7月28日，项英以训令的形式，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③，要求各级指挥员详细讲解，使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能了解自己的神圣职责。

同年8月1日，项英在赤色首都瑞金主持盛大的阅兵典礼，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6周年。这是红军第一次庆祝建军节。

同年12月，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中国工农红军总部由前方回到瑞金，和中革军委机关合并，仍由朱德任中革军委主席。项英不再代理中革军委主席职务，仍回到临时中央政府工作。

在这一年中，项英为巩固革命根据地、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大量工作。他积极支持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积极主张扩大红军。苏区中央局根据他的

①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政治学院编，第2册第661页。

② 《军事史林》军事博物馆编，1985年第2期第58页。

③ 《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2册第678页。

报告，通过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在他的努力组织实施下，不仅使红军兵员及时得到补充，还建立了不少新的师团。在新成立的红军中，有第三师、第十四师、少共国际师、工人师等，相继开赴前线。

1934年1月，项英参加了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接着，他于1月22日至2月1日，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为主席，项英为副主席，并兼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

这次大会后，项英动员各级干部和苏区的工农群众，集中一切财力人力支援前线，以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当年3月，项英代表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到于都县进行10天的调查，发现于都党政机关不少工作人员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专门寄出《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的调查报告^①，并在4月2日，以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出《继续开展检举运动》的训令^②，要求各级苏维埃政权，把检举违法行为当作一项重要的任务来抓。与此同时，他会同粮食部长陈潭秋，迅速筹集24万担粮食，保证了前方的需要。

同年9月7日，中革军委决定项英代替在病中的王稼祥的军委副主席职务。这样，就在红军被迫长征的前1个

① 《红色中华》报第168期第5版，1934年3月29日。

② 《红色中华》报第177期第3版，1934年4月19日。

月，他又参与军委的领导工作。

项英在中央苏区期间，对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对红军的发展和胜利，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局限等原因，项英也执行过“左”的错误路线，提出过“左”的口号，确定过难以实现的任务，指挥过红军力不胜任的战斗。他本人对有些问题已有新认识，并写进自己的自传中。

四、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负责领导和“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5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二十四师和十军。”^①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部队，连同政府机关人员、伤病员，约3万人。由于中央政治局当时对红军主力战略转移这个重大问题没有讨论过，所以项英并不清楚战略行动的真正意图^②。当时赋予他们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和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开展游击战争，使进占苏区的敌人不能顺利统治下去，准备在适当条

① 《军事史林》1986年第4期第45页。

② 《星火燎原》季刊1982年第1期第20页。

件下配合野战军反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城镇和地区^③。同时，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项英临危受命。他迅速指挥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营接替红军主力的防务，同时，为红军各军团输送了兵员，以增强主力红军的战斗力量。

同年10月12日，项英在瑞金附近的梅坑同党中央、红军总部分别后，迅速与瞿秋白、陈毅等研究，确定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来掩护、策应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主要包括：

第一，阻击、骚扰敌人，迟滞敌人进攻。10月中旬，当红军主力在赣南集结时，他指挥留下的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活动，封锁消息，断敌交通，阻滞敌人前进。10月下旬，当红军主力全线出击后，趁粤敌后撤参与追击，派地方红军前伸，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

第二，对外暂不改变党政机关的办公形式，隐蔽红军主力出征的战略意图。项英要求党政机关在红军主力没有离开苏区前，仍坚持办公，对内以安定人心，对外迷惑敌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仍继续照常出版，内容仍是扩红、征粮情况、动员群众反“围剿”，揭露敌人烧杀抢掠等。为了引人注目，还在报头上标明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

^③ 《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第104页。

报”。

第三，发展游击战争，为长期坚持斗争作准备。10月18日，项英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指出：“发展游击战争，是我们中央苏区整个党与苏维埃目前最中心的任务！”^①红军撤离瑞金后，附近游击武装迅速建立，并开展活动。它给当地人民群众以鼓舞，给敌人增加了压力，给红军主力的转移以有力策应。

第四，抗击进犯的敌人，减轻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压力。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项英指挥各地红军积极阻滞敌人前进，并于谢坊取得歼敌半个旅、击溃敌半个旅的胜利，迫敌由急进为缓进，拖住一批敌人。到1934年底，中央军区所属红军及地方游击队，先后吸引、牵制敌人2个纵队、15个师又2个旅。这是项英胜利执行牵制任务的重要体现。从而减轻了红军主力战略转移中的压力，策应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谭震林曾经指出：“南方的游击战，在红军长征之初，牵制了蒋介石的兵力，使我军主力部队得以大踏步地前进。”^②

第五，接收伤病员和组织运输，保证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在赣南，收容的伤病员就达1万多名。其中，重伤员随后被分散到群众家里，轻伤员医好后参加当地的游击战争。

除此，项英还通过各级党组织进行思想动员，使中央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59页。

②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2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苏区的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对严峻的形势有较清醒的认识，对迎接尖锐复杂的斗争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不可否认，项英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以为红军主力在湘西建立新的苏区，会改变中央苏区周围的环境，还准备在适当时候配合重返中央苏区的红军主力夺取敌占城镇。因而斗争方式转变不够及时，游击战争在开始没有很好地加以组织，甚至还提出：“创造新的师团”的口号，将一些地方游击队充实到独立团，同敌人打硬仗，部队损失很大。正如他后来向中央报告所说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失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①

同年11月底，中央苏区形势迅速恶化，县城全部陷于敌手。项英从严峻的斗争中，消除了依赖主力取得胜利的思想，确立了“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思想。他在向党中央汇报请求的同时，积极吸取教训，和陈毅等研究后，围绕着开展游击战，采取了许多措施：

(1) 派一批得力干部去各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其中，派张鼎丞等回闽西，调赖昌诈任瑞（金）西特委书记，调钟循仁任闽赣省委书记，调阮啸仙任赣南省委书记，还新建立了中共信（丰）（南）康赣（县）特委（后改为赣粤边特委），调红军1个营去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

(2) 在“三角地区”内进行游击战争的动员教育。项英提出：“一切工作为着开展游击战争”，“每个党员要领导

^①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见《江西党史资料》（1）。

游击战争”^①。还举办游击训练班，培养骨干。

(3) 抓紧整训部队。从教育入手，增强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减少层次，充实基层；将在斗争中表现勇敢的骨干充实到领导岗位；学习游击战术；加强组织纪律性。

(4) 开展反逃跑现象和失败主义的斗争。特别对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曾宏毅的悲观失望，违反中央命令的退却逃跑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撤销其职务，将其错误通报各地区。

(5) 继续组织疏散。对老弱病残的干部分散安置，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等送到白区治病。

1935年2月初，项英召集中央分局会议，根据愈来愈严重的敌情，着重研究分局机关和部队如何突出重围的问题。会上意见不一致。项英认为事关重大，涉及到变动中央赋予的任务，应当报告中央批准才行。于是，他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敌情，提出建议，请示行动方针。与此同时，他进一步整顿内部思想，批评悲观失望情绪，坚定大家的胜利信心，还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对精简机关和部队工作作了安排。

就在这时，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于2月5日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万火急”的电报：

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区的问题，认为：

(甲)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目前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斗争的前途是有利的。这一基本原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64页。

则不许可任何动摇。

(乙)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

(丙)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一切重要的军事问题,可经过军委讨论;分局则讨论战略战术的基本方针。先此电达,决议详情续告。^①

项英接到中央的电示后,如同久旱逢甘霖,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传达,研究了进一步精简机关部队,改变斗争方式的部署,确定分局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他领导干部立即分散转移去各地领导斗争。其中,陈潭秋、邓子恢、潭震林到闽西与张鼎丞会合,毛泽覃到福建军区,李才莲到闽赣军区,还派杨尚奎带1个营到南雄油山,派王善孚到安寻。身患重病的瞿秋白,和邓子恢等一起,由武装护送,向福建转移。

项英部署后,和陈毅、贺昌一起,率领机关、部队跳出敌人的封锁线,转移至于都南部地区,一面整理部队,一面等候中央进一步的指示。

几天以后,项英和中央分局收到了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敌后斗争给中央分局的指示》,指出:“放在你们及中央区全党面前的任务是坚持游击战争,是动员广大群众用游击战争坚韧顽强的反对敌人的堡垒主义与清剿政策。应当承认中区目前环境的严重性。但应认识中区的斗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第467页。

争对于全国仍然有极大的意义。应该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坚持群众的游击战争，其效果将使国民党无法顺利统治曾经得到解放的数百万群众，将使蒋介石许多部队受牵制，……”还指出：“对游击战争的坚持性不足是最大危险，因此必须首先把这一斗争胜利前途的坚信，放在你们及全体同志心目中，并向广大群众解释明白。”指示要求立即改变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并提出37条具体要求^①。党中央的指示，为项英和中央分局领导南方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项英接到这个电报后，立即召集中央分局会议，进行传达讨论，大家表示完全拥护，并对部队突围、加强各地领导、白区工作等作了认真研究，他于2月21日向中央作了报告^②。

同年2月下旬到3月初，按照项英和中央分局的部署，中央军区所属部队，分九路先后突围，项英、陈毅、贺昌率司令部及第七十团，于3月4日突围。行前，项英坚持将向党中央报告突围的电报发出再走。但由于当时中央和红军主力天天行军作战，电台联络非常困难，直到当天下午5时，电台才叫通。此时，敌人愈来愈近，电报发出后，他命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从此，项英同党中央及各游击区失掉联系。

3月4日突围那天是异常艰难的。下午3时，贺昌带两

① 江西《争鸣》杂志1985年第4期第3—5页。

② 《军事史林》1986年第4期第46页。

个营先行突围，中敌埋伏，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项英和陈毅带1个营行动时已是晚间，又和敌人遭遇打了一仗。他们在那一带转来转去出不去，巧遇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由曾带着走敌人不曾发现的崎岖小路，几经周折，才突出重围，于3月中旬到达大余东南的油山。接着，蔡会文率领赣南军区突围的部队也到达那里，加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共1000余人。于是，项英和陈毅便在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

艰苦的游击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蒋介石在侵占中央苏区城镇后，调集正规军和保安团三四万人，对油山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他们在政治上推行反动保甲制度，张贴反动标语，破坏游击队与群众的关系，悬赏通缉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游击区，妄图把游击队困死饿死。项英和陈毅研究后，为避强敌“清剿”，保存有生力量，迅即率领游击队大部西移到大余、南雄之间的北山。

同年4月，项英和陈毅在大余县长岭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形势，研究部署。项英在报告中针对指战员中存在的失败主义情绪，指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虽然失掉，但红军主力的存在和游击战争的进行，必将推动新的形势的到来。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他还针对指战员中存在的游击主义倾向，强调指出：“游击战争应以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为主体，反对单纯地打土豪。打土豪要严格执行政

策。”^① 陈毅在讲话中，着重讲了光明的前途，不能和敌人死打硬拼，要转变斗争方式和工作作风。他们的讲话，使大家增强了坚持游击战争的勇气和信心。这次会议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斗争方针：“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军事上，确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主要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②；在组织上，确定在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下，设信丰、南康、大余、南雄、三南（龙南、全南、定南）等县委，部队编成4个大队，下面再分为若干分队，每个分队10多人至20多人，便于进行小规模、分散的游击战；在战术上，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体，反对硬打强敌或与优势之敌决战，以兜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打击弱小之敌，来粉碎国民党军的“清剿”。会议还作出向北、向南、向西分兵的部署，到粤赣边、湘赣边等地发展游击战争。项英先是坐镇北山，同陈毅一起指挥各地，后又转到信丰活动。为了适应分散活动的特点，还确定以油山地区为中心，建立秘密交通线，以便传送情况，指导工作^③。长岭会议及其精神的贯彻，对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有重要意义。

长岭会议后，到1936年上半年，是游击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按照项英自己的说法，就是告别了房子，住在棚子里，在山林里过着流浪生活。面对着敌人“清剿”的严重

①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33页。

② 《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第67页。

③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江西党史研究》（1）第28页。

情况；项英和陈毅以游击队为骨干，与不脱产的游击小组、革命群众相结合，进行小规模、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袭扰打击敌人。他们主要是夜间袭击，抓敌人哨兵和反动区长、保长，或伏击敌人队伍的后尾，打掉队之敌；有时跳到敌人封锁线外，奇袭敌人的据点。先后取得乌经、游山墟、西华山钨矿等战斗的胜利，截获了从韶关开往大余满载军火的3辆汽车。这些胜利，坚定了红军游击队的胜利信心，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项英根据红军行之有效的政治工作制度，结合当时战争的实际情况，规定了游击队的五大纪律、十项注意，编写了《红色指挥员必读》、《红色战士必读》等材料，供干部、战士学习和遵行。项英还及时总结经验，提出搭棚、保密和行军的注意事项，制定守则，以保证红军游击队在艰苦环境中成为坚强的战斗集体。

项英针对敌人的经济封锁，领导游击队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和群众一起来度过难关。他们处处关心群众利益，和游击区的群众一起打土豪，领导赤白交界的群众抗租、抗债、抗税、抗丁，营救被抓的群众，慰问遭受灾难的群众。群众有机会则将粮食、盐巴、日用品送进山里，帮助游击队。游击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他们春天吃竹笋，夏天摘杨梅，秋天吃野菜，冬天找山果，实在找不到时就啃树皮、吃野草。有一次，项英就整整饿了三天，没有吃任何东西。

1936年初，在项英和陈毅领导下游击区的许多村庄建立起贫农田，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这年春天，敌人再次

抄山“搜剿”。项英和陈毅领导军民拆除棚子，消除目标；将机关转移到山外边，暂时分散隐蔽；派游击队到敌后方袭击，吸引敌人出山；发动山外的游击小组割电线，打冷枪，以迷惑敌人。4月12日上午，项英指挥游击队，化装成农民在南雄水口伏击敌人的保安团，击毙保安团长邱万成，全歼这股敌人。又有一次，项英率领游击队夜袭敌池江区公所，消灭了反动武装，抓到恶霸区长。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这个恶霸区长的罪恶后，将他就地枪决，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项英和陈毅率领红军游击队运用正确的政策和战术，克服重重困难，粉碎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使敌人阴谋一次又一次的破产。

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在大余、信丰、南雄等地“清剿”游击队的粤军突然撤走。项英和陈毅趁广东军阀部队撤离游击区的机会，集中分散的游击队，打击反动的保安团和地主武装，来扩大游击区，壮大游击队。在“两广事变”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9月，蒋介石派嫡系部队接替“两广事变”前的粤军，向赣粤边游击区发动新的“清剿”。项英和陈毅召集干部研究，作出了“九月的决议”，制订了灵活的斗争策略。允许赤白交错地区存在“两面政权”、“黄色村庄”。这对建立新的革命基点，保留更多的革命骨干，起了很好的作用。

12月，项英由信丰到广东南雄检查工作时，突然听到发生了“西安事变”的消息。他以革命家的政治敏感性，马

上写了一篇文章，阐述“西安事变”爆发的原因及意义，指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军事上已经成功而正式开展起来，这一形势继续开展，就要使抗日的革命高潮马上到来。”^①

1937年上半年，南方各游击区面临的形势再度紧张起来。此时，蒋介石表面上接受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暗地里却下达密令：“务求乘中央与中共谈判之机，消灭共方之武装及地方组织。”^②在赣粤边区，敌人接连发动进攻，搞分区“清剿”、重点“清剿”。项英和陈毅指挥红军游击队，采取避实击虚、避强击弱的战术，把大部分兵力转移到游击区外打击敌人。同时，利用当年春荒，发动白区群众，开展破仓救荒斗争。由于游击区军民密切配合，使敌人的进攻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从而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中斗争最残酷的岁月！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项英从报纸上得知这一真相后，立即写了一篇题为《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的文章，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愿意联合抗战，为保卫祖国而奋斗！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他们将红军游击队改称抗日义勇军。不久，项英从进步书刊中看到毛泽东当年5月初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摘要，其中讲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了新的变化，为便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定

① 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江西党史资料》（1）第62页。

② 《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11页。

调整当时的国内政策，等等。项英在这时写的一篇《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中指出：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红军游击队必须遵照党中央的路线和要求，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争取合作抗日，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他和陈毅迅速召开赣粤边游击区干部大会，统一由“反蒋”转变为“联蒋”、由内战转变为抗日的思想。接着，在赣粤边游击区内外，用各种形式开展合作抗日的宣传，并派人到其他游击区进行联络、传达。

同年9月上旬，项英和陈毅就赣粤边停止冲突、实行合作抗日问题，前往赣州同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9月24日，项英为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应邀赴南昌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在南昌期间，他看到了中央在9月22日发表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项英同国民党江西省代表谈判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决定改番号为抗日义勇军。他在29日离开南昌前发表的《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中说：“余遵照最近党中央的宣言，已正式宣布停止游击战争，放弃过去一切活动，把全部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统一于国民政府之下，效命杀敌。各地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以便追随全国友军和八路军之后，为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解放而作英勇的战斗。”^①

项英在南昌期间，得知党中央代表博古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南京正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立即给他们发去电

^① 上海《新闻报》1937年9月30日第4版。

报，请他们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简要报告他们的情况，要求派人去联络。

当时正在南京谈判的党中央代表博古看到电报后，立即派从国民党监狱中“保释”出来的认识项英的顾玉良（原名顾建业），以八路军办事处副官的身份，前往赣南联络。项英见到党派去联络的人员，看到博古的信和文件，十分激动。将工作委托陈毅负责后，于10月23日到达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同博古、叶剑英见了面。向他们详细介绍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在赣州、南昌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情况，然后于26日动身去延安。

项英于11月7日到达延安，第二天晚上，党中央专门为他举行欢迎会。毛泽东主席在致词中，对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对项英本人的贡献，都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这期间，项英怀着对抗战的极大热情，写出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一文，发表在当年12月11日出版的延安《解放周刊》第27期上。文章指出：劣势装备的军队，在正确方针指引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是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年12月7日，项英向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汇报了南方游击战争的斗争过程，他指出：“党的领导决定斗争的前途”，“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不能巩固自己的营垒，就不能与敌人坚持斗争到

底。”^① 他对自己当时对形势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斗争的艰巨性准备不够，斗争方式转变不及时等，进行了自我批评。

同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南方游击区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② 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向他们学习。

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精神传出后，使在南方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员受到巨大鼓舞。

五、战斗在新四军

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江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浙江、福建等8个省14个地区（包括赣粤边、闽粤边、闽西、闽北、闽中、

① 《江西党史资料》（1）第102页。

② 《六大以来》（上）第896页。

闽东、闽赣边、浙南、湘南、皖浙赣边、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边、鄂豫边游击区，广东的琼崖除外）的红军游击队^①，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同年12月1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等问题，项英在会上作了报告，介绍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的分布情况，并提出了改编原则。毛泽东称赞“项英同志的报告很好”。会议确定成立党的东南分局，以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为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成立军分会，以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为主席，陈毅为副主席。^②

会后，项英带着党中央对新四军编组的意见，迅速离开延安，和党中央派往新四军的第一批干部一起，于12月23日中午到达武汉。项英与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成员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研究了南方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及集中等有关问题，然后由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就新四军具体编组问题进行谈判，达成协议。项英还同叶挺军长、张云逸参谋长一起，就部队编组集中、干部配备等问题多次进行研究。25日下午，项英与叶挺一起，召集党中央派赴新四军工作已到达武汉的干部及叶挺军长招聘的技术人员开会。分别就抗日形势和上海、南京失陷经过、原因等作了报告，布置

^① 过去常称“红军游击队”，由于红二十八军的番号没有改变过，故以称“红军和游击队”为宜。

^② 会议记录摘抄件，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了工作任务。这是新四军军部机关的第一次会议。

同年12月27日，项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就新四军的编制和主要干部配备提出了意见。第二天，毛泽东复电项英，批准了新四军编为4个支队及支队以上干部配备方案。随后，由中共中央提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任命了新四军军级领导人和各支队主要领导干部。

在这前后，项英还同湘鄂赣游击区负责人余再励、傅秋涛见面，同鄂豫皖游击区负责人高敬亭见面，向他们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听取他们的情况汇报，同他们研究了部队改编、集中等事宜。

1938年1月4日，项英率新四军军部人员从武汉动身，乘“江裕”号轮船去九江。次日转乘火车，于6日清晨到达南昌。迅速展开了部队编组、集中等一系列的紧张工作。

1938年1月中旬，项英和曾山等一起，赴湘赣边游击区，对湘赣边红军游击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示慰问，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以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动员部队迅速集中下山，同谭余保、刘培善、段焕竞等研究哪些开赴前线抗日，哪些留下坚持斗争^①。他们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编成4个支队，共1.03万余人。

项英作为副军长、政治委员，在新四军组建之初，根据当时的条件和环境，十分重视从政治上建设部队。1938年1月10日晚上，项英召集军部机关工作人员，就发扬艰

^① 见段焕竞同志1986年12月谈话记录。

苦奋斗优良传统问题，专门作了一次讲话，提出要求和注意事项^①。随后，以“保持发扬优良传统”8个字，作为8个主力团（国民党政府开始只承认8个团）的代号，例如第1团为“保团”，第6团为“良团”。他不仅讲艰苦奋斗，更注重带头实践，文电亲自起草，吃苦的事走在前面，作风平易近人。项英2月16日在关于新四军编组情况和目前工作意见的报告中，强调以毛泽东的谈话“作为目前宣传纲要”^②。他很注意学习毛泽东著作。

2月14日，项英和陈毅一起向党中央建议：新四军组建后，应尽量前伸，向苏浙皖边区配置。第二天，毛泽东复电同意行动原则，强调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争；同时指出，当时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是苏南茅山山脉。

同年2月，新四军奉命开拔皖南集中。由于红军和游击队高度分散，缺乏通信联络工具，部队大部要徒步行军，至4月中旬，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皖南，第四支队在皖中集中完毕。项英随军部机关于4月4日到达皖南歙县岩寺。决定派先遣支队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在得到党中央的同意后，组成由粟裕任司令员的先遣支队。先遣支队于28日出发。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新四军开赴苏南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战争。6月，陈毅率领的第一支队与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已经会合，着手在茅山地区建立

① 《赖传珠日记》。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2册第86页。

根据地；其他支队建立根据地的问题，项英和陈毅也作了部署。为了便于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新四军委员会，以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

同年7月28日，项英从云岭军部动身，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9月30日上午，项英在六中全会会议上，就新四军的组建经过、展开情况等作了报告。由于华中前线抗日斗争紧张，项英请假先行返回，于10月22日回到云岭军部^①并于10月31日向党员积极分子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根据六中全会的决定，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

项英在延安期间，看到了失散多年从未见过面的女儿项苏云和儿子项学成。项苏云1931年生于上海时，项英已去中央苏区，随后项英的妻子张亮也去中央苏区，项苏云就留在上海，由陶行知送到劳工幼儿院抚养，后转送到苏北新安小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送到延安。项学成1935年生于福建，1937年被送到延安。他这次同失散多年的孩子见面，是他一生中和自己子女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次。他看到两个孩子在组织上和老同志的关怀、养育下，茁壮成长，活泼可爱，十分高兴。国际友人马海德为项英和两个孩子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门前拍下了珍贵的照片，还为他和陈云、李富春合影留念。

1939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

^① 《赖传珠日记》文稿。

恩来到云岭，传达党中央指示精神，与新四军领导人一起商定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指皖南与苏南），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同年三四月份，项英单独或与叶挺军长联名，向党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提出开展江北工作的建议：提出组建江北指挥部，由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以第八团为基础，扩建成第五支队，调罗炳辉去任司令员，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等等。

1940年1月1日，项英考虑到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已到皖东，位于皖中、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归中原局指挥比较方便，于是向党中央建议：“中原局既到皖东，新四军江北前委应取消，统一于中原局。在目前情况下，军部对江北（除苏北外）无法指挥，因情况不明。以后除某些行政上为对外的关系外，一切均归中原局负责，军部不指挥江北部队，以便统一。如何？请中央及军委最后决定。”^①中央1月4日复电：“前敌委员会改称皖东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②同年1月20日，项英向党中央报告：在上海附近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东路大有发展前途。“东路甚富庶，可筹大批款供给四军。伪军及散枪当地约1000支以上，又是国民党力弱地区，应乘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力求发展为江南人、枪、款三项之来源”。“应该使东路同志认识当前抗战局势的严重性，力求发展壮大，搜集枪支，筹大批款，增强南方力量，这才

① 《新四军文献资料选编》送审稿第518、522页。

② 《新四军文献资料选编》送审稿第518、522页。

能应付将来事变”^③。他还提出，应以阳澄湖为基点，灵活开展游击战争，并建议派得力干部去加强领导。随后，他派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为“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员。

除此，项英还先后抽调大批干部，包括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参谋处长赖传珠，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青年部长陈丕显等，到江北地区工作。

项英在抓部队作战和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部队建设，特别是党的建设。1939年7月，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分析了部队党的建设的情况，强调要结合江南地区的特点，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巩固提高部队战斗力。他重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两次指导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以及组织、宣教、敌工等业务会议，对推动部队政治工作建设起了很好的作用。他根据新四军所处环境的特殊情况，注意提高部队指战员的政治觉悟，指出：“必须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反对一切不正确思想和意识，反对忘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使自己混同于国民党军队，反对一切腐化堕落行为，反对自高自大认为劳苦功高，反对个人自由主义。”^④

项英重视加强指挥机关的建设。他两次指导召开参谋工作会议，分别作了《指挥机关与参谋工作》、《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的报告。他主持创办了《抗敌

③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3册第382页。

④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2册第94页。

报》、《抗敌》半月刊。经常亲自撰写重要文章，宣传党的路线、政策和建军宗旨。1939年5月，项英的部分文章被集纳出版社汇编成《项英将军言论集》。项英还委托陈毅起草《新四军军歌》的歌词，亲自和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集体研究修改，突出了“东进，东进”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加上作曲家何士德的努力，使这首军歌具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和号召力。

项英在壮大部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干部培养。1938年秋，根据项英的意见，新四军教导营扩建为教导总队，并指派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教导总队总队长，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教导总队政治委员，负责轮训干部，培养革命青年。他自己还经常亲自去作报告，使教导总队成为培养干部的熔炉，被誉为“南方抗大”。当时，上海、南京、杭州、宁波等沦陷区的大批抗日爱国青年奔赴皖南，经过教导总队的培养，分配到前线工作，为新四军的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不少学员后来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人才。

项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进攻，是主张针锋相对的。1939年10月26日，他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讲道：对顽固派的破坏进攻，要“依自己方针，给予必要反击”。^①1940年3月30日，他在致江苏省委的指示中，指出：“苏北反对我党我军最者为韩派（指韩德勤）；韩部“如进攻，我当坚决消灭之，否则只能退回江南，或听其将我消灭，这是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2册第159页。

关系整个苏北与我军发展之关节”；在反磨擦中，“必须使我发展。只有争得发展，才能有力地争取好转”；“目前在苏北，中心是努力发展自己的力量，争取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来打击韩部与CC，才能取得大的发展”^①。这些，都说明了项英对顽固派的基本态度。

项英作为东南分局、东南局的书记，对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恢复和发展是作出了贡献的。抗战初期，他指导各地以新四军在许多地区建立的办事处、通讯处为掩护，联络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发展新的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组织，使许多地区党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到1938年底，福建全省579个党支部和6000名共产党员中，多数是在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的。皖南地区到1940年，党员达1.2万余名。1940年4月30日，中共华中局在讨论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时，刘少奇曾经指出：“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抗战以来，一般说是有很大成绩的”^②。

项英和叶挺在皖南积极指挥新四军部队抗战，多次粉碎日伪军的进攻和“扫荡”。1940年日伪军有4月和10月两次万人大“扫荡”。其中，4月份那一次，由于叶挺去重庆要求增加军饷、增加部队编制，还未回到皖南军部，指挥责任自然落到项英身上。他指挥第一、第三团和第三支队第五团，利用南陵、繁昌一带起伏的地形，运用以游击战为主的战法，独立地迎战进犯之敌。在父子岭、何家湾

①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3册第95页。

② 《新四军抗日战争史资料选编》第9册第114页。

等地予敌重创。接着又取得狮子山、汪家桥、铁门冢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 900 余人，使敌夺占南陵、泾县，直下寿阳、太平的企图化为泡影。同年 10 月，日伪军以泾县云岭为目标，妄图消灭新四军指挥机关，已进犯到离云岭 15 里的徐家桥及汀潭附近，情况十分严重。项英协助叶挺，指挥第一、第三团等部队浴血奋战，连军部机关和直属队的一部分人员也上了前线，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犯。连同第三支队在铜陵、繁昌等地的作战，共歼敌近 3000 人，保卫了军部机关和后方的安全。

项英对团结使用知识分子十分重视。他不仅政治上关心，在生活上尽可能予以照顾。当时，新四军人员的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人每月只有 4 元，营连干部 3 元，而聘请的专家学者每月则 10 余元至数十元，军医处长沈其震每月达 150 元。在使用上，尽量创造条件，以发挥他们的所长。

在这期间，项英还经常接待来自上海、南京等地的进步人士，接见外国来访的记者，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使皖南新四军军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的一个窗口。

1939 年七八月间，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了关于南方局的工作和关于新四军、东南分局及东南局的工作。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张鼎丞于 8 月 21—22 日在会上作了《关于新四军与东南党的工作》的报告，认为一年多来，东南局完成了党中央给的任务。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肯定了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的工作，也肯定了项英领导的东南局的工作。会议指出：东

南局的工作与南方局的工作，同样取得下述成绩：（一）发展了统一战线；（二）扩大了党的组织；（三）推进了战争的动员；（四）进行了青年和妇女工作；（五）开展了工农运动；（六）建设了部队和武装力量^①。

从1938年到1940年的3年间，新四军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共作战4000余次，歼敌9万余人（内歼日伪军5.5万余人，歼顽军3.49万余人），部队本身发展到近9万人，在大江南北建立起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切，是项英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共中央1940年5月23日给东南局、军分会及项英的电报指出：“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②对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给予了明确的肯定。

六、在皖南事变中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政府用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即“皓电”），强令在华中及长江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间，撤到黄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蒋介石秘密调集部队，准备进攻在华中

^① 见《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第4—5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5—66页，中央档案馆编，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或江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共中央针对上述情况，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于当年11月9日复电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用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事实，驳斥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污蔑，拒绝撤出华中，但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中共中央作出让步，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

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北移，项英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同东南局和新四军领导人反复研究后，进行了准备。

首先，对部队认真进行了动员教育。项英召集干部会议，研究动员的步骤方法，确定印发《进军敌后宣传鼓动大纲》。他强调指出：党中央决定北移，是克服当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的方法之一；北移是对国民党的让步，为了革命利益，这是必要的；以这种让步换得国共两党进一步的合作，是对抗战建国的贡献，为革命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其次，组建挺进团为北移开辟道路。当时从皖南北渡长江的路线，是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至无为地区。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安全，张云逸参谋长的夫人及运至江北的军饷当年3月就被顽固派桂系部队扣留过。为巩固江北桥头阵地，项英为首的军分会决定组建挺进团，由第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兼团长，负责掩护军部渡江。

除此，项英还派原总兵站站长张元寿于11月下旬率精干班子，携带电台，带着侦察分队，去侦察、安排渡江，并已征集到100多条船。

第三，对皖南地区的中共党组织进行了应变部署。有

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项英，鉴于以李步新为书记的皖南特委和各地积极分子身份暴露，决定全部撤出，重新组织以黄耀南为书记的新的皖南特委，留在皖南坚持斗争。

第四，组织非战斗人员和重要物资先行转移。1940年12月，项英和叶挺一起，派宋裕和、薛暮桥、汤光恢负责率领军部和直属队非战斗人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家属，共1700多人，以及1300多担资材，经苏南分批转运江北。但由于日伪军的封锁和“扫荡”，这些物资大部分在途中散失，运到江北的为数甚少。

然而，情况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项英和军部组织皖南部队北移。

首要的是敌情起了变化。国民党当局故意广播皖南新四军北移的消息，日军在长江江面严密封锁。当时在军部作战科工作的叶超，在《回忆皖南事变的经过》一文中，写道：“到了12月下旬以后，情况就有了变化，日寇在江面的巡逻汽艇增加了，有时还停在江中过夜，这在过去是没有的”^①。至于苏南，敌情也起了变化，日伪军“扫荡”茅山抗日根据地，在中心区延陵、九里等地设据点20多处。这就是说，大部队北渡长江很困难，绕道苏南也很难办，自然加重了项英对皖南部队转移时安全的顾虑。

当时，汤恩伯、李品仙指挥反共军东开，华中局势危急，党中央考虑以皖南部队的北移换取汤、李大军停止东进，因此，对皖南新四军北移时间的要求也有变化。当年

^①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4页，1983年。

11月21日，中共中央给中挺、项英的指示中指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①据此，如按1个月，可拖至12月21日；如按两个月，可拖至次年，1月21日。同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致电叶挺、项英，指出：“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1个月”^②意思可以展限到次年1月。这些变化，对皖南军部研究北移也是有影响的。

这时，叶挺军长正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进行谈判，要弹药，要开拔费，并协商皖南部队的转移路线。时任新一支队司令员的傅秋涛，后来在《新一支队皖南突围》一文中写道：“1940年11月底到12月初，我皖南新四军积极准备戎装，根据党中央指示转移。叶挺军长亲自奔走，向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提出北移路线，并要求沿途国民党军队不能阻拦。顾祝同同意我军经泾县、茂林、宁国、宣城、郎溪至苏南敌后北渡，并允许沿途保护。”^③

同年12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要求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始分批移动”^④。26日，中共中央致电项英等，对皖南部队未迅速北移进行了严厉批评。项英原拟渡江北移，后接重庆方面发出警报后，于28日同军领导人确定皖南部队绕道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03页。

② 同上，第109页。

③ 《皖南事变回忆录》第65页。

④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16页。

麓宁国、郎溪到达溧阳，待机北渡。事后，向党中央作了报告。

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①

同年1月4日晚，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开始奉命北移，7日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地区时，蒋介石事先秘密调集的8万军队突然进行围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指战员经7昼夜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至14日，阵地均为国民党军占领。前后有2000余人突围出去，大部壮烈牺牲，一部分失散或被俘。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悲惨的一页。

皖南事变，主要是蒋介石的阴谋造成的。正如中共中央发言人1月18日的谈话所说的：“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属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②中共中央迅速展开猛烈反击，在1月18日发出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公正人士面前，暴露着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③。全国广大人民，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海外侨胞及国内进步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迫使蒋介石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

项英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对皖南部队北移中遭

①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27页。

②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66页。

③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73、第174页。

受严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一，他对在皖南处境险恶的程度认识不够，特别对在苏北形势剧烈变化后，对顽固派的报复估计不足，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其二，他由于担心部队北移时会遭受日伪军的袭击，使转移的决心犹豫不决，丧失了有利时机。其三，转移中的许多做法不当。例如，公开动员，使移动完全公开化；在前进受阻的情况下，选择地形对突围不利的星潭作为突破口，没有协同好，致一误再误；在星潭攻击受阻后，想避免或减少伤亡，寻找敌薄弱部位突围，却又因走错路而被敌制先。特别在行动过程中，他率少数人离队突围，尽管只有一天多时间，但这是个严重的错误。项英对此，在突围中已有省悟，说：“部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到中央后，我要作检查。”^①

项英在皖南事变突围后，躲过国民党顽军大规模的搜捕，几经辗转，隐蔽在泾县赤坑山蜜蜂洞，准备待机北渡，不幸于1941年3月14日晨，被叛徒杀害，终年43岁。全国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遵照总政治部指示，派专人到皖南赤坑山找到项英的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于南京雨花台。^②

项英逝世50周年之际，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

① 《党史研究资料》第3辑，第614页。

② 对项英和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的实际安葬时间，为何和墓碑上的时间不一致，笔者曾专门走访过负责修建三烈士墓的南京军区政治部原副秘书长刘瑞同志。据告诉：原定安葬时间为1955年6月16日，并在墓碑上刻有“6月16日”的字样。由于袁国平的夫人邱一涵提出袁的墓穴舍门太小，以后合葬时不方便，要求把墓穴后门再开大一些。组织上采纳了她的意见。故三烈士的实际安葬时间推后了三天，即1955年6月19日。

府暨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为他修建了纪念铜像。杨尚昆为这座铜像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这是对项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一生业绩的高度评价。

项英的一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皖南事变中的错误掩盖不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他的革命业绩，永垂青史。

罗瑞卿传略（下）

黄 瑶

第一任公安部长

1949年6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召罗瑞卿到北平。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和杨得志等话别后，便与赴青岛休养的徐向前同乘火车到达北平。

几天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公安部长（在政府建立之前归军委建制）。罗提出，希望随四野南下。周恩来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并劝罗不要再提。当晚，毛泽东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7月6日，中央军委公安部成立，8月14日开始办公。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又被政务院任命为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50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领导机构成立，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后，将军队重视抓基层连队的经验运用于公安战线。他认为，公安部门的基层就是派出所。为了摸清派出所的职责范围、工作方法，他多次到北京的几个派出所进行调查研究。近的步行，远的乘公共汽车。有

人怕不安全，建议他坐卧车去。他说：“坐卧车去，人家就可能不敢如实反映情况。”

建国初期，在大陆上的战争刚刚结束，被推翻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不甘心失败，仍然在进行猖狂的复辟活动和破坏活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比如开妓院、吸毒等依然存在，亟待清扫。

在这一情况下，各地公安部门在农村配合解放军和当地群众进行剿匪；在城市，截至1950年10月，侦破潜伏特务案件千余起，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进行了登记，取缔了一些反动会道门。与此同时，各地还开展了封闭妓院、禁毒、镇压恶霸的斗争。罗瑞卿曾亲自微服去看了当时仍在社会黑势力控制下的上海“大世界”。当他看了每层楼站满了由老鸨看管着的妓女后，激愤地说：“这些吸血鬼、这些流氓恶霸，统统要消灭掉。我们要从这些坏蛋手里解放那些不幸的人。”罗瑞卿作为北京市公安局长，还曾亲自部署了北京市封闭妓院的战斗。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封闭妓院决议后，当天下午5时30分即开始行动，一夜之间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集中了老板、领家454人，妓女1268人获得解救。这一史无前例的正义行动深得人民拥护，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在同残余的反革命势力最初的较量中，虽然取得了初胜，但斗争并未结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些反革命分子错估了形势，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他们复辟的时机已到，于是明目张

胆地制造谎言，破坏交通，抢劫物资，焚烧仓库，杀害干部。在上海和广州，公安部门分别破获了密谋暗杀陈毅和叶剑英的案件。在北京，暗藏的日本籍特务还曾策划在1950年国庆节时炮轰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

由于反革命分子气焰嚣张、活动猖狂，不仅抗美援朝运动遭到他们的破坏，土改也受到了严重影响，部分农民怕反革命报复而不敢起来斗争。

针对当时敌我斗争形势，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中央于1950年底作出了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决策。罗瑞卿立即召集全国公安会议，分析敌情，作出行动计划，报毛泽东批准后执行。随后，罗瑞卿组织了许多视察组分赴各地调查。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他亲自考察了11个省市镇压反革命的情况，用亲自调查的第一手材料，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开展镇反运动的决心是正确的，反映了广大群众要求坚决镇压那些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大小小的反革命分子的呼声，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导好这一运动提供了重要信息。

这一运动的方针、政策都是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亲自制定的。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即提出了党委领导和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的群众路线的方针，要求将群众斗争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统一计划，统一行动，既准又狠又稳地打击反革命。到1951年春季，数以万计的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首恶分子受到严厉制裁，残余反革命势力遭到摧毁性的打击，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

5月，在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刻及时转入收缩阶段，

清理积案，组织犯人劳动改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这时召集并主持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前，罗瑞卿将决议草稿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将罗瑞卿召到中南海他的住处，一面询问情况，一面亲笔修改决议。三天之内，毛泽东对这一决议修改了三次。在这一决议中规定了许多重要的政策界限，例如：对于反革命可捕可不捕的，捕了就是犯错误；可杀可不杀的不杀，杀了就是犯错误。对于罪该处决而民愤不大或没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可判处死刑，缓刑二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对党、政、军、文教、工商、宗教、民主党派各界清查出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不杀。可捕可不捕而已逮捕的应一律释放。对反革命分子的关、管、杀发展为关、管、杀、放。捕人须经地委批准，杀人权改归省委（后来又改归中央）等等。这些政策有助于防止肃反扩大化，对于对敌斗争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当时，不仅镇反运动自始至终是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而且整个公安工作都处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关注和监督之下。毛泽东后来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公安部门 and 军队，同属专政工具，是“大权”。对这两个部门，他是抓得很紧的。他绝对不允许这些部门有一丝一毫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存在。一旦发现，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苗头，他都要提出严肃批评。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批道：“公安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否则是危险的。”

罗瑞卿认识到，“各级党委”当然包括而且首先是指的

党中央。他向公安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在以后的工作中一直坚持了向毛泽东、中共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

1953年，斯大林逝世。接着，苏联发生了贝利亚事件。在中国，也有少数干部对公安部门在警卫工作中采取客人见首长要登记等安全措施提出意见。毛泽东认为公安部门这样做是出于好意，从而排除了一些干部的无根据的怀疑。这说明毛泽东对罗瑞卿等公安部门的领导是充分信任的。这不仅是因为公安工作建立以来就始终置于中共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而且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保卫工作早在延安时期批判教条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在纠正抢救运动的错误时，提出了九条方针^①，便同当时被称为“戈别乌”的斯大林肃反部门的路线从认识上划清了界限。建国以后，苏联虽然也派了些顾问到公安部，在罗瑞卿的严格掌握下，这些顾问只能在技术问题上提供咨询，而不能参与重要问题的决策。

1955年，开展了第二次社会镇反和机关内部肃反运动。运动虽曾在一个短时间内发生过斗争面过宽和“逼、供、信”的偏向，罗瑞卿发现后立即严肃指出：“要坚决反对逼供信，谁要犯了这种错误，就要按纪律办事，甚至要负刑事责任。”这种偏向，很快便纠正了，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也发生了潘汉年、杨帆的错案和胡风反革命集团

^① 1943年7月1日毛泽东提出的九条方针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随后毛泽东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使九条方针更加完善。

的冤案。

1956年，他随毛泽东从广州北返，毛泽东决定到武汉后要在长江里游泳。罗瑞卿历来把保卫党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安全看作是神圣天职。毛泽东要去的地方，他事先都要认真检查，亲自察看警卫工作的布置情况，甚至毛泽东要睡的床，他也要先试试，务求做到万无一失，十分周到细致，他被人们称为毛主席的大警卫员。他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对毛泽东提出长江游泳的要求便一口回绝，说“不能游”。当时，罗瑞卿尚不会游泳，不认识毛泽东畅游长江在当时的政治意义。毛泽东知道他没有派人去试水就说“不能游”，非常生气，便狠狠地批评了他，然后自己派人去试水，结果是证明能游。罗瑞卿向毛泽东承认了错误，便去布置安全保卫工作。毛泽东随即畅游了，并写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诗句。罗瑞卿在毛泽东游泳过程中，一直守候在船上，直看到毛泽东游完上了船，他心头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当毛泽东批评他“你不敢下水，就是不敢艰苦奋斗”时，他连连点头承认自己的这个弱点。

这件事给毛泽东和罗瑞卿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林彪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时，毛泽东还说：“他反你，还没有反我。反对我游泳，那是好意啊！”

罗瑞卿虽已过知命之年，为了更好地保卫领袖，他又认真地学起游泳来。到1959年，他就可以跟随毛泽东下水游泳了。1958年，毛泽东又提出要到三峡游泳，罗瑞卿立即率人乘船从宜昌到重庆，沿途反复察看水情，发现礁石

多、水流湍急而且有许多很大很深的漩涡，结果证明是不能游，毛泽东听汇报后很高兴地放弃了这一打算。

在第二次镇反和内部肃反运动结束后，1955年9月，罗瑞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1956年9月，他出席了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大会上，他作了题为《我国肃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发言，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带头为这一发言鼓掌，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一讲话。这篇发言全文不到一万字，自我批评部分占了1200字。会前讨论发言稿时，有些干部建议他将自我批评部分适当压缩，罗瑞卿说：检查缺点错误一个字也不能少。

八大会议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按照这一分析，大会提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

正在全国全党为贯彻八大精神而奋斗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十分担心中国也会出现裴多菲俱乐部。于是，八大路线被搁置而开展了全党整风运动，号召大家鸣放，继而是严重扩大化了的反右派斗争。随后，毛泽东为了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又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于毛泽东这一系列决策，一贯崇敬毛泽东的罗瑞卿都是拥护的。同当时绝大多数干部一样，他真诚地相信，毛泽东制定的决策都是英明

的、正确的。对毛泽东的这种信赖在战争年代形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凝聚力，而毛泽东当时又最善于倾听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从而将革命引向胜利。然而在革命胜利之后，当毛泽东的认识发生偏差，又不再注意发扬民主时，产生错误就不可避免了。

在1958年，罗瑞卿却不可能获得这样的认识。毛泽东提出的“大跃进”对他来说，完完全全是一种鼓舞。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安全、良好的社会秩序，罗瑞卿提出了在公安系统开展安全运动的倡议。

1958年2月，贵州省公安厅提出开展无火灾、无积案、无匪、无盗窃、无烟毒流行、无聚赌的“七无运动”。罗瑞卿指示，以公安部名义加上“我们的公安工作应该赶上去，来个大跃进”的按语转发各省市公安局公安部门。3月，辽宁省公安厅也提出内容大同小异的“八无”倡议，罗瑞卿又指示，加上“公安机关各业务部门之间，提出工作跃进指标进行竞赛的方法是可取的”这样的按语，通报公安部门。

当时，在“左”倾思想迅速蔓延的情况下，一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跃进指标。贵州、辽宁等省公安部门提出的“七无”、“八无”显然也带有浮夸色彩。对此，到1958年6月，罗瑞卿已提出纠正。他在6月26日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公安工作跃进情况的考察报告》指出：“有些地区提出要在半年内或一年内实现几无，甚至有的地方提出了几十无、100无，以至142无，过于绝对化，不切实际，不符合阶级斗争长期性的规律。这种情

况，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指示，经过实践的检验，现在已经和正在改变。”在这一报告中，罗瑞卿把安全运动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同一切危害生产安全、危害社会秩序的现象进行斗争，尽量防止和减少各种破坏和治安灾害事件，而且在事件发生时，力争缩小它们的破坏范围，迅速破案或扑灭。”

显然，按这一内容开展安全运动，在公安部门是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的。这些条件是：

已经建立了一支忠于党忠于祖国、为人民所喜爱的、为敌人所惧怕的公安干警队伍。建国初期，从全国四面八方调来干部。刚刚建立这支队伍时，罗瑞卿便要求大家树立终身从事公安工作的思想，“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

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警民关系。罗瑞卿经常教育公安干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仿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亲自主持制定了《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规定每年春节期间开展爱民月活动，要求派出所要定期向群众报告工作，听取批评和建议，要求交通民警坚持“纠正违章先敬礼”等等，大大密切了警民关系，使公安干警对所管辖的地段的社会情况了如指掌，从而使治安保卫工作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已经从无到有进行了公安业务建设。罗瑞卿要求公安人员又红又专，他说：“要搞得赢反革命，就要精通业务，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在他的倡导下，各地公安部门都开展了大练基本功的活动，公安干警业务水平大大提高。还

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条例，使公安干警处理问题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有了这些条件，加上有力的治安管理工作 and 在各地公安部门蓬勃开展的安全运动，使我们国家的社会秩序日益稳定。但是对于取得的成就，罗瑞卿并不满足。他总是要把工作做得精益求精，好上加好。有一次他到一个城市了解治安情况，汇报的人得意地说：“只发生了工人丢掉自行车的小的刑事案件，还发生过汽车撞伤孩子的小事故，有几次火灾，都及时扑灭了。”罗瑞卿立即批评说：“一个工人用几年积蓄，买了辆自行车，被人偷了，这算做小事吗？小孩撞伤也许会使终生残废；一座油库、一座厂房，由于粗心大意，扔了一个烟头，而被烧掉了，这也是小事吗？”在罗瑞卿的严格要求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从古未有的良好的治安秩序和社会风气。

待到文革“砸烂公检法”后，社会秩序被搞乱了。周恩来曾十分痛心地说：“过去公安机关有一套组织，有一套办法，有一套制度。现在组织没有了，制度没有了，那套办法也没有了。”直到如今，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仍然常常怀念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代良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尚。

在罗瑞卿任公安部长的年代，公安部还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罗瑞卿领导隐蔽战线部门对海外敌对势力的派遣特务进行了隐蔽斗争，一次一次粉碎了他们的阴谋，保卫了国家安全，维护了国家稳定，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

1959年9月17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讨

论并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特赦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同日，刘少奇发布特赦令。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释放包括溥仪在内的33名战犯。改造溥仪等战犯的工作是在罗瑞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对于公安部改造战犯工作，党中央非常满意。1965年李宗仁回国后，周恩来还说：“公安部和××部办了两件大事。公安部改造了一个末代皇帝，××部争取了一个国民党代总统。”

日理万机的总参谋长

1959年4月，罗瑞卿任国务院副总理。6月，毛泽东回到韶山，罗瑞卿随行。离开韶山后，毛泽东便上庐山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罗瑞卿则奉毛泽东之命赴湖北阳新考察救灾工作的情况。

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是总结1958年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左”的错误。7月14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对1958年来“左”的错误提出中肯意见，但“忠言逆耳”，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错误批判。从8月2日起，会议扩大为八届八中全会，主题已变为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斗争。罗瑞卿也于此时上了山。由于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信赖，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8月18日，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又错误地批判彭、黄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庐山会议打断了当时纠

“左”的进程。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共中央军委的工作。根据林彪的提议，罗瑞卿副总理兼任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当罗瑞卿回到军队时，我们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有几段边境颇不安宁。

在北面，以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为导火线，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论战。在中苏关系已经破裂的情况下，在中苏数千公里边界线上需要设防。为此，几年来，罗瑞卿亲自到东北、内蒙和新疆，对边防进行了具体部署。

在东南沿海，国民党军经常派兵袭击大陆。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准备大举进犯大陆。针对他们的图谋，1962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大批部队入闽严阵以待。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派遣小股武装进行袭扰。这些小股武装，除少数逃脱外，大部被沿海军民歼灭。从1962年至1965年1月，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40股，594人。

这一斗争在调部队入闽阶段主要由林彪指挥，到1962年下半年，林彪声称累病了之后，具体指挥主要由罗瑞卿负责。他曾数次深入沿海部队调查研究，总结反武装特务斗争的经验教训。他对此抓得十分具体。1962年10月下旬当他得悉在广东电白县全歼两股武装特务并缴获了电台后，立即建议公安部启用此电台，利用被俘的报务员，与

台湾通报，引诱国民党再派人来，予以歼灭。一个月后，敌人按照电台指引，空投了11具降落伞，有6人和一些物资。这一斗争于1962年年底告一段落。

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军队在警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军队主动停火后撤，战役乃告结束。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决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伯承在战前和战役进行中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起了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在战斗最紧张的10月和11月，罗瑞卿工作异常繁忙，已到了不分昼夜、无所谓上班下班的程度。在他家里许多房间里挂上了作战地图，副总长们和作战部长、秘书、参谋们出出进进，灯光彻夜不息。他经常在家里召开紧急会议，综合分析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各位元帅报告，为他们做出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把他们的指示，化作一道道命令，发到西藏和新疆参战部队。

1961年11月，罗瑞卿兼任了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于是，他又协助周恩来、贺龙、聂荣臻，把发展尖端武器的任务担在肩上。几年来，北到哈尔滨，南到西昌，东到上海，西到戈壁，他多次深入到科研第一线，抓整顿，抓质量，抓安全、抓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的生活。他十分注意处理好国民经济和国防工业的关系，军工生产和科学研究的关系，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关系。

罗瑞卿十分注意充分发挥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和知识分

子的作用。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在这一形势下，不少人认为应给知识分子扣上“资产阶级”这一定语。罗瑞卿不同意。他在听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负责人汇报后说：“知识分子中，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头比较小，中间大的那一部分叫什么呢？最近中央还讨论了一次，要以总理讲的为准^①。少奇同志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报告^②里也讲我国有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现在有一股风，以思想为标准，而把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以此为准。”

罗瑞卿对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仅有原则性的意见，而且十分注意发挥专家们作用，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的进步，关心他们的生活，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作出了非常具体的交代和指示。

1962年，罗瑞卿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加上他对工作具有极大的热情，他的工作经常处于超负荷状态。他的秘书们经常利用他吃饭、更衣的时间向他请示问题。在他办公桌上，秘书呈报的待批文件的卷宗经常是满满的。当他离京时，秘书们便赶紧把待批文件送去，好让他利用乘飞机和火车的时间批阅。

显然，有了这样像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工作的秘书长，就可以节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各位老师的时间，让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下卷）358页。

② 参看1954年的刘少奇《关于修改宪法（草案）的报告》。

他们集中精力多考虑一些大政方针，多考虑一些战略方面的问题。因此，在那国际形势十分紧张、国内经济困难尚未克服的60年代初期，大家都为有这一样一位精明干练的总参谋长而庆幸。可是林彪却对他越来越不满意了。

1965年秋天，林彪曾对人说：“1960年，罗瑞卿和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从1961年起，罗瑞卿和林彪之间的裂痕开始产生，但原因并非是因为罗瑞卿疏远和封锁林彪，而是由于林彪的猜忌心，由于林彪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林彪在下决心要整倒罗瑞卿时，曾在当时作备忘录纸条上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做又一彭黄也——”。

林彪为了夺取更大更多的权力，他需要搞一个山头，而在这山头内的人际关系就是“捧”和“跟”。到1961年，林彪即发现罗瑞卿并不符合这一条件，于是便同罗产生了裂痕。

林彪同罗瑞卿第一次发生冲突，是在1961年5月，林彪和罗荣桓对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发生分歧的时候。罗荣桓主张坚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不同意林彪提出的“带着问题学”。林彪怀疑罗瑞卿站在罗荣桓一边，而冲罗瑞卿发了一通脾气。

1962年秋，林彪再次称病不出。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多次向罗瑞卿提出，要罗多向贺请示工作。

对于毛泽东的嘱咐；罗瑞卿照办了。从那时起，直到1964年，在报纸上经常见到贺龙和罗瑞卿一道参加外事活动和各种会议。尽管罗瑞卿对林彪十分尊重，但林彪却因罗瑞卿与贺龙接触多而对他越来越不满意了，他开始对罗瑞卿旁敲侧击。一天，他在同罗瑞卿谈话时，突然问罗瑞卿：“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叶群也几次打电话给罗瑞卿说：“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陪你钓鱼、打麻将，你还是多来一些吧！”她这里所说的“钓鱼”云云，就是影射的贺龙。

抓 比 武

1963年12月27日，分管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推荐第十二军一〇〇团二连连长郭兴福的教学法。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他认为，这一教学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高潮。

罗瑞卿收到叶剑英的电报后，立即呈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仔细审读了叶剑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象小老虎一样”时，他在下面划了一道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他还说，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林彪看了也很高兴。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

罗瑞卿在看了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影片后，感到很好，他考虑：“政治上个人的模范有雷锋，四好连队的典型有好八连、还有其他连队……在军事教学法方面树立一个典型，来推动一下，会是有好处的。”而他又感到，他“当了四年总长，军队的训练工作可以说没有接触过，自己过去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也很不足”。很需要学习学习。于是，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工作。1月下旬，他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负责人都请到南京，参加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与会者观看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队的军事表演，都感到大开眼界。在看了一个班防御的表演后，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说：“从红军起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一个班的防御搞得这么好。”当看到一个侦察分队表演飞檐走壁功夫，连指导员也上房时，罗瑞卿兴奋地说：“这要拿到北京去卖票，也会满座”。

此时，遭受三年困难的国民经济已经好转。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比学赶帮超成为风行的口号。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向富强之路的冲击，它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三老、四严（三老，指当老实人，说老实话，作老实事。四严，指对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而去掉了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尽管这一冲击后来因为大抓阶级斗争，因为“四清”、“文革”又一次半途而废，但在当时却颇见成效。在这一形势下，不甘于平平静静打发日

子，总是充满激情的罗瑞卿提出了“比武”，也就是比郭兴福教学法。这一年是建国15周年，中共中央已决定10月1日不举行国庆阅兵。罗瑞卿认为，这正好腾出手来搞比武。南京现场会议结束后，罗瑞卿赴广州看地形。在广州向毛泽东、林彪和其它各位军委副主席写报告，建议国庆节搞一次全军比武。毛泽东、林彪和其它军委副主席都表示同意。为此组成了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

叶剑英倡导郭兴福教学法，罗瑞卿便提出“比武”，《解放军报》整版整版发表社论、报导……称病不出的林彪尽管也在罗瑞卿的报告上划了圈，但他认为罗瑞卿又在“大跟别人”，于是，林彪准备另搞一套。

2月间，林彪提出，要大学空军。2月24日，林彪又要杨成武在总参召开学习空军的电话会议，通知在广州的罗瑞卿也参加。当晚杨成武向罗瑞卿作了报告，罗瑞卿立即表示拥护林彪指示。随后，罗瑞卿即按林彪的要求，以主要精力投入大学空军的运动。他在总参机关党委《关于大学空军经验，大整机关作风的实施计划》上指示：“我以为大学空军、大整机关，总参一定要切实遵照林总的指示，作出一些显著的成果来，作出一个好样子来。除了一般号召、思想动员、群众热潮之外，必须要有具体措施……务必不要一哄而起，随之即一哄而散；也务必不要不问具体情况，生搬硬套。”

同时，他认为刚刚兴起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练兵热潮也不能冷却下来。他认为，学空军的对象是机关，学

习郭兴福教学法的对象是连队，二者并不矛盾。2月26日，他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郭兴福教学法还要宣传一下，和大抓机关，各单位要穿插进行。石油工业部的经验说：一国家讲民气，部队讲士气，个人讲志气。三气合一就是革命。毛主席常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3月5日，他赴北京南苑观看了北京军区几个分队的军事表演，在参观侦察分队捕俘训练中的徒手夺枪和徒手对匕首的格斗表演后，罗瑞卿激动地说：“全军所有侦察分队都要象你们这样练，都要练出你们这套本领来，艺高人胆大，勇敢加技术，什么敌人都不在话下。”

4月22日，他听取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和副司令员何正文的汇报。当黄新廷汇报到有一个师拼凑尖子时，罗瑞卿立即说：“这就是弄虚作假，就象1958年搞‘卫星田’并秧的办法，搞上去了也不算数。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这样干是要打败仗的！”他发现某连指战员全是五大三粗的壮汉，便责问：“这个连矮的、体重轻的战士都到哪里去了？今后一定要三老四严，如果不改，这个部队的政委、主任就不能再让他们当下去。搞客里空^①是对推广郭兴福式的教学法的破坏。”

后来，在林彪整罗瑞卿时，把在比武中拼尖子、弄虚作假作为一条重要罪状。其实，早在1964年4月，罗瑞卿已经在坚决反对这种偏向了。

^① 苏联剧作家考涅克在剧本《前线》中塑造了一个惯于虚构捏造的新闻记者形象。这名记者就叫客里空

罗瑞卿批评了客里空之后，黄新廷又汇报了成都军区比武大会准备比赛学毛主席著作，罗瑞卿不以为然。他说：“政治怎么个比法？光讲革命化，没有成果不行，不能服人。四好中政治思想好同其他三好不能分离。学毛著好自然不等于军事训练好，但是毛著学习应当是苦练军事技术的思想基础。”

既然对政治、对学毛著不能孤立地去比，当然更不好孤立地去树立学毛著的标兵了。然而，1964年4月下旬，林彪又提出，要树立廖初江为学毛著的标兵，总政建议增加丰福生、黄祖示，林彪同意，并提出要象军事方面推广郭兴福教学法那样，在政治方面推广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罗瑞卿表示完全拥护，并在4月27日的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彪的“指示”，提出：“武的宣传郭兴福，文的宣传廖丰黄，到一定时候，再把这二者结合起来。”

5月上旬，罗瑞卿接见了丰福生和黄祖示，对他们说：“凡是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工作就做得好。大庆油田是这样，好八连和雷锋、郭兴福也是这样。郭兴福不仅是教学方法好，而且带兵也很好。他们成长也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不仅为了认识世界，而且为了改造世界。”

罗瑞卿这一番话的主题仍然是学毛著要有实际成果，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后来，这也成为他的一条重要“罪状”。

从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5月20日至21日，罗瑞卿和杨勇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贺龙在杨村观看了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技术表演。随后，贺龙向毛泽东汇报了杨村军事表演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有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贺龙立即通知北京军区准备迎接毛泽东的检阅，同时通知在济南的罗瑞卿，让罗回京筹备。罗瑞卿建议增调济南军区的几个分队和民兵参加表演，贺龙同意。

6月15日至16日，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在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在十三陵，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毛泽东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接着，他详细地谈了他的战略防御设想，否定了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

1964年7月2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康生等谈话时又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

毛泽东还号召：“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毛泽东还应罗瑞卿的要求，再一次对战略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

林彪着手整罗瑞卿

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两天检阅军事表演，枪炮都是实弹射击，一点事故也没有出，罗瑞卿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林彪当时正在昆明养病。他对这次检阅的组织者罗瑞卿撇开他而忙前忙后，十分不快。

8月间，毛泽东吩咐贺龙、罗瑞卿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汇报中，毛泽东决定：取消军衔制。罗瑞卿回京后立即向正在兰州养病的林彪报告并请他指示。林彪怨恨贺龙、罗瑞卿又“越位”直接去见毛泽东，把他撇在一边，心里很不满。八九月间，他得知在军委扩大的办公会议和全军训练工作会议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进行总结时，都提到了少数单位在军训中有拼凑尖子、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倾向。林彪决定即以此作为整罗瑞卿的突破口，抓住已为罗瑞卿多次指正并正在纠正的比武中个别单位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问题，给罗瑞卿倡导的比武扣上单纯军事观点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11月下旬，他派叶群插手总政工作组在第一二七师三七九团的调查研究，炮制和搜罗攻击罗瑞卿的“炮弹”。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她共炮制了《关于一连单纯军事观点的报告》、《关于四连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报告》、《关于七连锦标主义、弄虚作假的报告》、《关于团党委把四个第一变成了四个第二的报告》。

12月24日，叶群带了这四份报告，离开这个被她搅得

思想一片混乱的部队，到广州与林彪会合。12月28日林彪听取了总政工作组的汇报后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前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总政工作组将林彪的指示打电话传达给罗瑞卿，罗听后表示：“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

12月29日，林彪亲自审定了由总政工作组整理的林彪《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指示”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

林彪这一指示一出笼，罗瑞卿即在组织纪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予以抵制。

12月下旬，《解放军报》起草了1965年的元旦社论。此稿充分肯定了1964年的军训成绩。罗瑞卿审阅修改后，发到广州请林彪审定。林彪看后十分不满意，指示在广州的总政工作组按照他“突出政治”的指示重新起草。于是由罗瑞卿审阅过的“北稿”之后，又有了一个“南稿”。罗瑞卿看了“南稿”后，感到两稿差距太大，无法统一，便打电话将“南稿”起草人召回北京研究如何修改。12月31日，由于第二天社论就要见报，不允许久议不决。罗瑞卿当即决定，仍以“北稿”为基础。尽管此稿不得不加上“一定

要突出政治”的字样，但仍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训的成绩，因而减轻了林彪指示负面的作用。

1月上旬，军委第八次扩大的办公会议听取了总政工作组在三七九团蹲点的情况汇报，讨论了林彪的指示。在会上，许光达、杨得志、杨勇、陈再道、秦基伟、廖汉生、皮定钧、袁升平、王必成等一致认为，应充分肯定1964年军训成绩，应充分肯定郭兴福教学法。李作鹏、吴法宪的发言强调了突出政治，但他们只占少数。

罗瑞卿看到绝大多数高级将领都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训的成绩，不安心情有所缓和。他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对林总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既要突出政治，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又要把政治工作落实到军训及其他各项工作中去，不要搞空头政治。在解释林彪的把时间让给政治的原则时，他引用林彪过去讲过的话，提出：在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首位的同时，在时间分配上，军训时间要多于政治训练时间。

罗瑞卿还提出，1964年的工作是全面的进步，军训成绩显著。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等毛病在比武之前就存在，比武中也曾发生过，并多次作过批评、纠正。针对林彪关于比武冲击了政治的指责，罗瑞卿具体解释道：“林总讲的是苗头。如果对这些苗头不加克服、不加制止，不及时敲警钟，让它发展下去可能成为偏向。”

林彪得到第八次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的信息后，感到光靠指责比武未必能整倒罗瑞卿，不得不退后一步，表示：1964年的军训发动了群众，以我为主，打破了教条主义框

框，创造了许多经验，成绩是主要的。他指示，由罗瑞卿主持对他的指示作进一步修改。

在修改中，每动一处，罗瑞卿都要打电话给叶群，再由叶请示林彪，林同意后才落笔。重大修改主要有以下三处：

一、在“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上：“当然，这里是指的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

二、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加了一句：“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气可鼓，不可泄。”

三、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

罗瑞卿这几处修改把林彪极“左”的指示往正确方向扳回了一个角度，这完全是好意，这也是对林彪威信的维护。林彪虽然表面上同意了这些修改，实际上对罗非常忌恨。从这时起，林彪开始对罗瑞卿多方刁难。

1965年5月2日，罗瑞卿赴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时，林彪拿出了毛选和党章，在向罗宣读了有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有关章节后对罗规定：“1. 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2. 林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3. 林不在北京时，X日通气一次；4. 重大问题，立即通气；5. 去林处，不要事先通知。”

5月下旬，在作战会议上，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作总结发言，这一信息登在会议简报上。5月25日，林彪看到

这期简报后，立即指示：

“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做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

林彪这一指示传出后，叶群在当天深夜佯装避开林彪，将罗瑞卿召至她家中一个洗澡间，在她的子女陪同下同罗谈话，说林的“指示”已全部收回，又说林是个有脾气的人，如此等等，并表示要调解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叶群一面口称团结，一面企图用羞辱罗瑞卿的办法来激怒他，从而造成整罗的口实。与此同时，她开始秘密布置一些人写揭发罗瑞卿的材料。第一个把材料送来的人是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

挨了林彪几次整，罗瑞卿在处理同林彪的关系上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按照林的规定，定时前去通气。8月初，林彪夫妇住在大连，在北戴河的罗瑞卿要求前往通气。叶群同意后，罗瑞卿夫妇冒着有雷暴雨恶劣天气的危险，乘飞机到大连向林彪汇报工作。林表面客客气气，但就在罗走后不久，他即宣称有病，要罗在两个月内不要再来通气。9月初，林彪转移到苏州。路过北京时，仍拒绝接见罗瑞卿。罗无奈，便改为书面通气。在这期间，林彪夫妇进一步找他的“联络员”们炮制和搜罗罗瑞卿的“罪证”。

10月间，两个月期间已过，罗瑞卿听说陶铸要赴上海。他想同去向林彪通气，又一次被林拒绝。

这一期间，罗瑞卿继续由广东沿海向西，顺着国境线看地形，并参与了对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精心修改。罗瑞卿在琢磨工作，而林彪却在琢磨整罗瑞卿。

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同日，杨尚昆被解除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11月18日，林彪发出《1966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提出：“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几天后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被批判。文革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11月25日，罗瑞卿随周恩来来到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柬埔寨首相朗诺。罗瑞卿想到苏州去看林彪，但怕吃闭门羹，便向毛泽东提出，要去看林彪。毛泽东同意。于是，罗不通知便到了苏州。但林彪已经知道罗要来，叶群也由她搞四清的蹲点地连夜赶回来，在另一间屋内秘密监听罗瑞卿同林彪的谈话。罗瑞卿汇报后，林未置可否，只是问罗身体如何。罗说牙有点疼。林还告诉他治牙疼的偏方。

在上海期间，江青曾找罗瑞卿，借口贯彻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要求在部队召开座谈会，以策动整文艺界人士。罗婉言谢绝。江青怀恨在心。翌年4月，她终于在林彪支持下，开成了这个座谈会，炮制了整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

从上海会议到三月京西宾馆会议

罗瑞卿去看望林彪之前，11月18日，林彪曾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关于55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并附有一封短信。林彪的目的是通过对突出政治的强调，为告罗瑞卿作准备。但未见毛泽东有何反映。罗瑞卿去后，林彪怕夜长梦多，于是又写了一封短信加上半年来苦心搜罗来的揭发罗瑞卿的11份材料，由叶群带着，于罗瑞卿走后的第三天乘飞机去杭州见毛泽东，向毛泽东做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用编造的材料欺骗毛泽东，告罗瑞卿的状。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的材料进行了批复，表示完全同意林彪的看法，指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叶群作了“揭发”罗瑞卿的三次发言。林彪告状的信和呈送给毛泽东的11份材料均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会议开到第三天，决定将正在西南边境看地形的罗瑞卿接到上海，予以隔离，进行背靠背的揭发。

林彪授意叶群对罗瑞卿的指责和诬陷，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1964年组织比

武，奉林彪之命修改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和 1965 年元旦社论，在军委第八次扩大的办公会议上的讲话，都成为“罪证”。

第二个问题是说罗瑞卿反林彪，要夺林彪的权。据叶群说，罗瑞卿曾授意刘亚楼向林彪提出了四条，即：林彪要上政治舞台；二、叶的任务是保护林的健康；三、要林彪“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由他负责”，而“总长不会亏待你（叶群）的”。刘亚楼已于这一年 5 月逝世。

叶群还说，1964 年国庆节期间，罗瑞卿去看林彪，向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还大喊：“不要挡路。”

叶群这一指责是严重的，但是前者因刘亚楼已死而没有证据；后者同样没有旁证。与会的许多人表示怀疑。邓小平听了叶关于刘亚楼的揭发后尖锐指出：“这是死无对证”。刘少奇听了叶群对他的单独汇报后直率地说：“难以置信”。陆定一听了叶的发言后说：“真是奇闻”。但是，也有个别人为林彪、叶群帮腔。康生便把叶群对罗的诽谤称为“罗瑞卿对林彪的‘三气周瑜’”。

在会议上，对叶群的揭发，没有人能补充材料或予以证实。毛泽东在会前即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在会议召开了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说：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12月16日，上海会议结束；罗瑞卿返回北京。由于已无法与林彪共事，罗瑞卿请求辞去军队内的一切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并向县以上党委通报。尽管如此，林彪对这一结果并不满意。他为了要使罗瑞卿“永世不得翻身”，继续炮制整罗的材料。从上海回北京以后，林彪、叶群为罗瑞卿又罗致了一个新罪名，叫做“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罪证依据是，在修改为林彪起草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时，罗瑞卿反对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罗瑞卿曾热心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30本经典著作也作为反对学习毛著的“罪证”。这两条，前者正好说明罗瑞卿正确，后者则是在贯彻毛泽东的指示。

为了打倒罗瑞卿，林彪还在罗瑞卿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动员揭发，无甚收获，又到曾在罗身边工作已经调离的人员中搞材料，终于在一农场找到一个人。此人曾当过罗的公务员，因调戏保姆而被调开。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他诬陷罗瑞卿，说罗每天要他请安，说罗全家衣服都由他洗，把他的手都搓烂了，等等。这些材料一看就漏洞百出。罗家工作人员有好几个，断无唯独要这个公务员请安之理。罗瑞卿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自己洗衣服，家中还有保姆，也断无将所有衣服都交他一人去洗之理。

在1965年至1966年之交的全军政工会议上，林彪指使一些人提出继续开会批判罗瑞卿的要求。经毛泽东同意，3月4日，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简称3月京西宾馆会议）召开，出席者有军队和公安系统负责干部42人。会

前，邓小平和彭真受中共中央委托同罗瑞卿谈话，通知他要开会。邓小平对他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这是他作为战友给予的嘱咐。然而罗瑞卿仍然没有料到即将来临的批斗是那样无情和残酷，邓小平在主持了会议的“开幕式”后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

这次会议一反上海会议的做法，由背靠背改为面对面。罗瑞卿一进入会场便感到气氛变了，过去关系密切的战友和同志顷刻间成为路人甚至仇人。他们或是志愿或是被迫同罗瑞卿划清了界线。一篇篇发言象鞭子一样抽打着罗瑞卿的神经。除了说罗瑞卿反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外，又给他加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名。罗瑞卿对于毛泽东历来是一片赤诚、十分景仰。反毛主席的罪名是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而当“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农奴主”、“定时炸弹”、“帝、修、反的代理人”等帽子朝他扣来时，他的脑海已是一片混乱。

为了过关，他在3月12日违心地作了过头检查，承认反对突出政治，不尊重几位老师、骄傲自满，等等。但是，通不过。吴法宪等“积极分子”说：“这些都是‘小鬼’”。他们要求罗瑞卿把篡党篡军这个“大鬼”亮出来。会议要求罗瑞卿作第二次检讨。

但是，罗瑞卿怎么也检讨不下去。说他反对毛主席，要篡党篡军，这对他来说是奇耻大辱。如果承认了这些，生还不如死。罗瑞卿生性刚烈，参加革命后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的污辱。当时，文革尚未兴起，挨批斗的高级干部还

只是极少数人，罗瑞卿就是其中之一。他感到百念俱灰，于是，在3月18日从他家的三楼平台纵身跳下。然而，他又一次大难不死。但是，腿摔断了。他的问题随之升级，叫做“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似乎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此时，整个国家已处于文革即将来临“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之中。后来，1967年1月15日陈伯达说：“这回尖锐的阶级斗争首先就从军队开始的，从反对罗瑞卿开始的。”这一说法并不完全准确，但它却道出了林彪、江青对整罗瑞卿的重视程度。

炼 狱

罗瑞卿摔伤后，立即被送进医院，住院达9个月。

9个月来，他的腿伤未见好转，而在政治上的境遇却每况愈下。他住院后京西宾馆会议仍然接着开，面对面又改为背靠背。从3月22日起，会议增加了53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中共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4月8日结束，并于4月底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5月16日，中央在发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同时，向全党批转了上述报告。说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这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把罗瑞卿和彭真、陆定

一、杨尚昆联系在一起，进行错误的批判。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耸人听闻的关于政变的讲话后，彭、罗、陆、杨便升级为“反党集团”。

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的权。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4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这一连串事件终于把文革的风暴刮向四面八方。6月底，中直机关在中南海召开声讨“彭、罗、陆、杨四大家族”大会。罗瑞卿在医院不能到场，会议组织者便把郝治平拉到会场上。会后，又逼她写检讨，“揭发”罗瑞卿，并勒令她限期交卷。

1966年12月，随着错误地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地批判陶铸，掀起了揪斗党的高级干部的恶浪。12月20日深夜，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唆使下，一群红卫兵闯进北京医院将罗瑞卿劫持走，同时郝治平从家中被劫走。12月24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了批判所谓罗瑞卿篡军反党集团大会。陪斗的除郝治平外，还有肖向荣、梁必业、王尚荣、陈鹤桥、史进前。这次大会表面上是戴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张罗，而实际上却是林彪、叶群在操纵。这一天，叶群亲临会场，她也是一身红卫兵打扮，所不同的是为了掩人耳目，比别人多了一个大口罩。会后，罗瑞卿被押往一个警卫部队。名为监护，实际上形同坐班房。睡觉时要亮着灯，脸要朝着看守，一翻身便遭看守的呵斥。解手也要报告，得到允许才能上厕所。随后，便

是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直到1967年3月底。高潮是3月4日至5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的，有3万多人参加的“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大会”，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外，有数十人陪斗。

这些批斗会，一个比一个狂热，一个比一个残酷。被斗者脖子上都挂了沉重的木牌，上面写上本人的名字再打上红叉。有的字还倒过来写。每名被斗者左右各站一名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他们一手架着被斗者的胳膊，一手按着被斗者的脖子，迫使被斗者低头弯腰，这就是文革中所谓的“喷气式”。罗瑞卿左腿伤口并未愈合，无法自己走上台。造反派便把他放在筐里，连拖带抬地把他弄上台，他的残肢就戳在筐外。所过处是斑斑血迹。

如此惨无人道地批斗，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的侮辱，而且是对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亵渎。

4月以后，罗瑞卿伤口恶化。林彪等不得不同意他住院，但仍不断把他拉出去，或批斗，或审讯。1967年7月31日，报纸对他公开点名批判，专案组开始对他进行面对面的“审讯”。在文革变幻莫测的风云中，专案组负责人换了好几次。每更换一次，新上任的便说前任右倾，于是便越来越“左”，罗瑞卿的处境便每况愈下。这一年他名义上住院5个月，实际上有1/3的时间在院外。在没完没了的审讯中，罗瑞卿同专案组中故意刁难他的人进行了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他经常用铁的事实把审讯者驳得哑口无言。

1968年，毛泽东亲自批准罗瑞卿住院治腿，301医院已作出手术方案。但是，一心要让罗瑞卿永世不得翻身的

林彪一伙竟毫无人性地授意专案组在3月7日的报告中写道：“目前为了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的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治疗推迟到秋凉之后进行。”

然而，秋凉了也未进行手术，一直拖到1969年初，罗瑞卿左小腿被截去了1/3，随后又摘除了股骨，此时，江青提出要让“犯人”写个人历史，多写几遍，就能找出矛盾。于是罗瑞卿出院后，便奉专案组命写自传，并于1970年8月写完。他在自传的最后写道：

“从1966年12月20日深夜到现在，这3年多来我的经历就是：挨斗、受审、坐班房、写材料。在这些方面我当然是很痛苦的，有许多冤屈！一切人世间的侮辱我都受过了，受够了！”但是，他仍然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作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

转 机

就在罗瑞卿悲愤地撰写自传时，外面的世界正悄悄地变化。197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林彪、陈伯达一伙通过称天才和坚持设国家主席，暴露了林彪想抢班夺权的野心。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随后在同斯诺谈话时，不指名地批评了林彪的“四个伟大”，批评了林彪一伙说假话和虐待俘虏。此时，林彪一伙已经慌了手脚，正忙于铤而走险，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已经顾不上罗瑞卿了。但那些专案组和看守却仍在那里迫

害这些冤屈的“犯人”。对于这一切，罗瑞卿已经适应了。在狱中何时是个头呢？如何渡过这日日夜夜呢？他决心利用狱中的时间，认真读书，他读了毛泽东圈定的那30本马列著作，并认真做了笔记。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了，罗瑞卿等被迁住复兴门外政法干校，生活条件逐渐改善。罗瑞卿通过看报敏锐地觉察到，林彪完蛋了。他以前一直弄不明白林彪为什么要这么凶残地整他，甚至尽量往好里想，认为这或许只是一场误会。现在，一切都豁然开朗。他对同林彪的交往作了认真的回忆，并在1972年上半年开始写揭发林彪的材料，这时，看守通知他，可以同家人会面。他抑制了想看看苦苦思念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愿望，决心首先清算林彪，等把材料写完再会见家人。6月15日，他写完揭发林彪反革命罪行的材料。8月1日，建军45周年之际，他又写完揭发林彪历史上的罪行的材料，共13万字。随后，他住进北京医院。分别已有7年多的孩子们来到了他的病床前，最小的了了1966年时才12岁，现在已成为19岁的小伙子了。1973年11月，解除对罗瑞卿的监护。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作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等人，要给他们平反。1974年1月5日，郝治平从秦城监狱释放，3天后，罗瑞卿同她见了面。罗瑞卿一家终于团聚。

在文革中有千千万万个家庭遭受磨难，而罗瑞卿一家是受苦受难深重的一家。罗瑞卿腿残，罗瑞卿夫妇和他们的孩子罗宇3人入狱，郝治平在狱中患乳腺癌，开过刀。郝

治平父母受株连挨批斗含冤去世。罗瑞卿的孩子们或插队或当工人，西到陕西延长、四川南充，北到黑龙江哈尔滨、扶余，内蒙哲里木盟，星散于四面八方。如今阖家团聚了，“相对如梦寐，感叹亦欷歔”，杜甫这些诗句已不足以描绘他们经历了离乱之后的悲喜交集的心情。

1974年，经曾在福建请一老中医治过腿的张爱萍的介绍，罗瑞卿也来到福建治腿。此时，“四人帮”正在发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妄想组阁。“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觉察了他们的野心后，给予严厉批评。这一期间，罗瑞卿经常同福建省和福州军区的领导人皮定钧、李志民、廖志高等在一起，他们都痛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而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

1975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着手对被“文革”搞乱了的方方面面进行整顿，形势逐渐好转，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他治疗日益见好，走路的步履日益坚实。他的心情很好。开始赋诗。在69岁生日，他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反思，写道：

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
蒋匪屠杀犯众怒，烈士鲜血浇红花。
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廿年耻矜夸。
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千里岂嗟呀！

他还同在北京的老战友魏传统、李文一等书信往返，酬唱应答。在《答友人》中他写道：

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

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

1975年11月，毛泽东不允许邓小平着手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于是开始了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一时又猖狂起来。罗瑞卿将福建省委负责人廖志高、马兴元等请去说：“看来斗争还在继续。我们要准备斗争，要经得起考验。省和军区对小平同志指示执行得很坚决，但人家是不会甘心的，你们不能麻痹。”

11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示后，罗瑞卿仍然对大家说：“要坚持下去，不要动摇”，他边说边用右手食指在左手掌上划了一个三点水，“他们肯定是短命鬼”。皮定钧激动地对他表示：“你就在这儿住下吧。将来他们要翻天，即使上山打游击也要跟他们干。你的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主意就行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罗瑞卿赶回北京，在瞻仰毛泽东的遗容和参加追悼大会过程中，他一直拄着双拐，坚持肃立。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无论自己是受了多少委屈，他这个老卫士，对共产党、对毛泽东一直赤胆忠心、九死不悔。他的崇高气节犹如嘉陵江两岸的修竹，历经千磨万劫而依然坚劲如初。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毛泽东逝世后28天，“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化大革命”这一场恶梦终于结束。但是，中国前进的脚步依然

十分蹒跚。华国锋说：“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便将华国锋的观点概括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

在“两个凡是”禁锢着人们思想的情况下，罗瑞卿仍然时时不忘揭批林彪和“四人帮”。他采用写信等方式对一些问题阐明自己的观点，以力求在思想上划清同林彪、“四人帮”的界限，从而拨正军队建设的航向。

197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1964年林彪又策动‘大比武’”。罗瑞卿立即给军报写信，指出：这是“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那篇文章把射击“打鸡蛋壳”和翻墙头也当作花架子批，罗瑞卿提出了异议。他说：“前者是为了练习对隐蔽在战壕内之敌的精确射击，后者同我们现在练兵中还在实行的超越障碍也差不了多少”。他认为，江青提出的，让部队学习样板戏中的耍大刀，才是花架子。

1977年3月，罗瑞卿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在会上，叶剑英提出，全军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被“四人帮”颠倒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把部队建设好。他提出，要

在全军开展“十个应该不应该”^①的讨论。随后《解放军报》组织撰写了十篇文章，在当时最迫切需要同林彪、“四人帮”划清界限的十个问题上，肃清了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保持了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

罗瑞卿对这一讨论非常关注。《解放军报》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都认真阅读。他还亲自写稿参加讨论。3月31日，他在住院期间写信给《解放军报》社长华楠，提出准备搞两个短篇，题为《林彪全盘否定1964年军训是个阴谋》和《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随后，他同军报的记者详谈了自己的构思。在记者按他的想法整理成文后，他又精心修改，然后以“本报记者”名义分别发表于《解放军报》7月9日和6月17日。他还以“一个读者”的名义为军报写了《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对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起到了指导作用。

在这期间，他还为许多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向中央和军委转信，为了平反这些案件奔走呼号。但是，由于他当时只是一位无实际职责的顾问，他所能起的作用不能不受到限制。

但是，让他能发挥更重要作用的时候终于来到。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罗瑞卿

① 十个应该不应该是：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不应该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应该不应该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应该不应该整顿军队；应该不应该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和规章制度；应该不应该按照接班人“五项条件”搞好老中青三结合；应该不应该强调军队要稳定；应该不应该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应该不应该坚持野战军、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制；应该不应该搞好战备、准备打仗。

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

罗瑞卿到任时，军队由于在十年浩劫中遭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问题成堆，百废待举。当时，“两个凡是”还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实事求是作风遭到背弃，说大话、空话、假话盛行，军队的优良传统被破坏，派性猖獗，内耗严重。有些科研项目被迫取消，拉大了武器研制和装备同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规章制度废弛，纪律松懈，各类事故层出不穷，部队战斗力下降。1975年，邓小平曾将这种状况概括为“肿、散、骄、惰、奢”，并提出进行整顿。

罗瑞卿作为邓小平的助手，一复出便首先抓整顿，并将邓小平所说“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当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华国锋“左”的错误的的影响，十一大仍然在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要用以整顿为纲来取而代之，既要有清醒的认识，更需要无所畏惧的革命精神。

1977年秋季，罗瑞卿负责筹备军委全会，他曾多次对起草文件的工作人员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离口，就是为了打人。”他在向叶剑英、邓小平请示报告后对《解放军报》社长华楠等说：“军队还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也挑不出来。”

“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的基石。撼动这块基石，是破除“两个凡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从1977年秋天开始，罗瑞卿即围绕整顿，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

在思想上，他力主彻底批判林彪、“四人帮”。他大力支持《解放军报》冲破华国锋等设置的只提批“右”不提批“左”的障碍，主张揭露林彪、“四人帮”极“左”的面目。当他在一份文件中看到提及活跃在文革期间的“风派”和“震派”^①人物后，他对起草文件的同志说：“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也是一种危险人物。”他建议《解放军报》撰写专文揭露这三种人。当他看到这些文章后，高兴地说：“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辨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在作风上，他主持开展了以三查三整（即查斗志、查纪律、查作风，整顿“软、懒、散”、整顿官僚主义和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整党整风运动。

在组织上，他积极批转信件，主持平反了大量的冤假

^① 风派，指文革中看风使舵，投靠林彪、江青一伙的人物。震派，指受林彪、江青一伙指使在各单位闹“地震”的人物。

错案，同时清查了“三种人”。随后调整了领导班子。

在军事工作上，他主持战略委员会，重新分析研究国际形势，调整了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

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上，他对军委决定的重点抓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的研制组织大力协调，同时抓紧常规武器装备的改进，以及逐步实现我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在基层工作上，他强调从严训练和管理，恢复和发扬光荣传统，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正规秩序，减少和消灭各类事故。为了推动部队建设，他十分注意运用先进典型。在他倡议下，航一师、硬骨头六连、神枪手四连等单位都受到了表彰。

罗瑞卿在开展这一系列工作时，曾经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主张维持文革后形成的使国家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万马齐喑的不正常局面的人，“两个凡是”就是这种主张的概括。显然，要使党和军队迈开前进的步伐，必须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同时对于贯彻“两个凡是”的华国锋等人重大的错误决策进行劝阻和抵制。

早在提出“两个凡是”的社论发表之初，邓小平便直率地对此提出了批评。他在5月24日说：“‘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当时正在住院的罗瑞卿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

点。他向华楠等人详细询问了这一社论发表的前后经过，然后对华说：“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要坚持科学的态度，亦即实事求是的态度。小平同志强调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决不能不分时间、地点、条件到处搬用，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首先是对我们党的学风的破坏。”1977年8月，他在一首诗中写道：“精通目的在运用，背诵词句等白费。实事求是方本色，万勿空喊最最最。”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发表了一篇题为《标准只有一个》的一千多字的思想评论。罗瑞卿立即发现了此文的重要意义，他把华楠找去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罗瑞卿要华在军报上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1978年5月10日，经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光明日报》供稿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唯一标准》。11日，此文又以“本报特邀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全国各报纷纷转载。此文立即在全国引起热烈的反响。一场关系到党和国家能否从文革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迈开前进步伐的思想大讨论蓬蓬勃勃开展起来。

在华国锋等的支持下，有的人反对这篇文章。他们认为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罗瑞卿则旗帜鲜明地支持这一篇文章。他对解放军报负责人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他又说：“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

就在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已引起尖锐分歧的时候，在军队内又出了一件从表面上看与此次讨论无关而实际却有着密切联系的事情。4月12日，当时的海军主要领导人向华国锋汇报工作，华提出，要在访问朝鲜回国后，到大连看望海军。这位海军主要领导人回来后立即召集海军几位副司令员开会布置此事。提出要立即准备，海军所有兵力，包括鱼雷快艇都要参加检阅。要求绝对保密。参谋长杨国宇提出，此事应向萧劲光司令员报告，这位领导人同意。杨又提出，事先应向总参报告，其余同志也说：还应向军委报告。那位领导人说：“不用，这是我亲自向华主席汇报，华当面批准的。这不是调兵是检阅，向军委、总参报不报，关系不大。”

4月13日，杨国宇向萧劲光报告，萧指示：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4月15日，杨再次向那位领导人提出，要向军委、总参报告，否则调不动部队。那位领导人不得不同意。4月17

日，正在301医院试用假腿的罗瑞卿接见了杨国宇，在听了杨的报告后，罗向杨提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二、既然12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杨国宇向罗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因。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这一期间，罗瑞卿也给华国锋打了电话，想申述自己的意见，华竟拒绝接电话。但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后来，到1979年7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再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以后也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大海军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

此事处理完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在党内仍相持不下。6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6月2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

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这一番话显然是对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中肯的批评。然而，华国锋等人仍然不肯接受。6月15日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汪东兴召集各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仍然批评《光明日报》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党性不强”。他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翻案就是反毛主席。

此时，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正在撰写《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此文是专为反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显然，经过汪东兴那么一讲，此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乃至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都不可能发表了。吴江等想到，《解放军报》曾向他们约稿，便决定将此文送给《解放军报》。

罗瑞卿看到从报社送来的清样后，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他不仅具体指导，而且直接参与文章的修改。他亲自查阅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反对本本主义》、《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又重读了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然后让华楠、姚远方等去同吴江商量，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此文进行了全面修改后，他再次审

阅，并亲自动笔进行修改。修改期间，他就如何改好问题同耀邦通过1次电话，同军报社通了5次电话。

文章基本完稿之后，罗瑞卿又第三次进行审改。定稿后，给军报负责人打电话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的。”

6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由罗瑞卿主持修改、完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翌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统稿。

这篇文章一发，天平便迅速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一方倾斜。尽管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有的还未承认错误，但大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重要准备。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尽管罗瑞卿未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盛会的胜利召开，但是，他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年迸发出的光辉就象那照亮长空的夕阳，喷吐出满天灿烂的晚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发表，罗瑞卿复出仅仅过了11个月，这是异常紧张的11个月，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之长、工作量之大都是十分惊人的。虽然他身残年迈，但壮心不已。他一复出就又同文革以前一样，进入了不分上班下班，没有白天黑夜的状态。他的家庭从他出狱以后形成的短暂的平静不复存在，一切都围绕

着他快节奏地运转。秘书来不及调来，曾患癌症动过手术的郝治平也上了阵。他的桌上文件卷宗越来越多，办公室里电话铃声不断，来访的客人一批接着一批。他平时需坐轮椅，行动不便。为了节省时间，他工作时便不喝水，以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午休时，他连假腿也不摘，便和衣躺着休息一会。他生病住院，病房便成为办公室。他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作战部长和解放军报社社长几乎每天12点左右都要接到他打来的询问情况和交换意见的电话。战友和亲属担心他累坏身体，劝他放慢工作节奏，他却说：“《水浒传》中有个拚命三郎。我们今天就是要当这个拚命三郎。”他还常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着27岁过。”面对国家、军队遭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百废待举的局面，他想赶快干，趁自己头脑仍然清楚，精力还算充沛的时候，多干工作，以追回他因受迫害而失去的十余年时间，以尽力弥补国家和军队十年动乱中所遭受的损失。

罗瑞卿常常说：“做领导工作光坐办公室批阅文件、听汇报，不深入实际了解情况是危险的。”文革前，为了视察海边防，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外的沿海和边疆各省。他到过许多国防工程和工厂。复出以后他在短短一年内视察过京郊、天津、徐州等地的国防工事和部队。有的地方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他便拄着手杖走。一些领导同志出于对他的关怀，便告诉部队，以后罗秘书长到什么地方，汽车、轮椅通不过时，就组织人抬。而这反而使罗瑞卿感到不安。他不愿意麻烦人。渴望着走出轮椅、扔掉手杖，大干一场。

1977年，党组织请了两位西德专家来给罗瑞卿安装一个更轻、质量更好的假腿。这两位医生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从而改善左腿功能。罗瑞卿怦然心动。经过反复考虑，他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组织批准，决定到西德去治腿。

7月15日，郝治平随罗瑞卿离开北京赴西德。在乌鲁木齐，罗瑞卿仍牵挂着工作。晚间，他看了秦腔影片《火焰驹》，非常高兴，立即打电话给文化部长黄镇，向他推荐这部影片。他还打电话给张爱萍，告诉他医生说治好腿有99%的把握。他高兴地对当地驻军负责人说：现在我坐轮椅，等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

7月18日，罗瑞卿夫妇到达波恩。不久，罗瑞卿住进了医院。8月2日上午，医生给罗瑞卿动了手术。中午，从手术室传来消息。手术成功。守候在室外的郝治平激动得掩面痛哭。但因怕感染，医院未让郝治平看望。傍晚，又传来消息，罗已苏醒过来，还用英语对给他动手术的医生说：“Good evening, Thank you!”

看来一切顺利，经劝说，郝治平回旅馆休息。她刚躺下，听到了不祥的电话铃声，接着便有人敲门。等她赶到医院，罗瑞卿因突发心肌梗塞而与世长辞，时间是凌晨2时40分，北京时间为上午9时40分。

罗瑞卿这一生经历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且不说战争年代在枪林弹雨中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也不说他在解放战争年代，既经历过翻车的车祸，也经历过在高空飞机突然出事。他这一生中必死无疑的大难，就经历过3次。每

一次他都从死神手中挣脱了出来。然而，到了1978年8月3日，正当党和国家最需要他的时候，正当他的亲人为他的手术成功而庆幸的时候，他却突然离去。同志们万分惋惜、亲人们悲痛欲绝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

8月10日，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柩迎回北京。1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罗瑞卿的追悼大会。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他致哀。在追悼会上，邓小平致了悼词。他号召全党、全军，化悲痛为力量，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政治敏锐，忘我工作的高贵品质；胸怀坦白，光明正大，对敌狠，对己和，不怕累，不信邪，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接受新事物，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讲求效率，勇于负责，处事果断，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作风。

陕甘宁边区“抢救运动”始末

王 素 园

(一)

从1942年上半年开始，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开展的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内的一次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它的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在党内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是在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①这次整风运动对于加强党的建设，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进一步结合，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对于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都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把进攻重点转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执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1939年到1942年期间，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他们对陕甘宁边区采

^① 见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

取长期包围封锁政策的同时，在边区周围密布特务网点，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破坏捣乱。在政治上造谣诬蔑，拉拢挑拨在边区求学的青年离开边区，给边区造成不良影响；在经济上封锁限制边区与外界的商业贸易，破坏边区建设。他们利用叛徒化装成土匪、便衣捉边区群众，杀边区干部。在洛川设立“劳动营招待所”，专门截劫出入边区的革命青年，胁迫其自首。

整风前和整风期间，陕甘宁边区保卫部门已经破获了一批特务案件。当时著名的特务案件有“军统局汉中特别侦察训练班”（简称“汉训班”）一案。“汉训班”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于1939年底在陕西汉中县陈家营村开办的一个特务训练班。两年左右的时间，训练了几百名特务，其中派往陕甘宁边区的就有40多名。其主要任务，是打入我要害部门，刺探情报和进行破坏。在1940年至1942年间陆续被我破获。与此同时，敌占区的日本特务机关也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

抗日战争期间，大批从敌占区、国统区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涌向延安。延安党员人数也迅速增加，由抗战初期的4万名，到1942年增加到80万名，增长了20倍。在新党员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比重较大，他们经受革命锻炼时间较短。有些知识分子党员反映出的自由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思想意识较为突出。延安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一种是红军干部。他们多数是工农干部，一部分是从中央根据地长征到陕北的，一部分是西北根据地的老干部。另一种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

少数是从沦陷区来的。其中有少数人是地下党的骨干，他们大都是通过地下党组织介绍来的。再一种是年龄比较大的党外知名人士，比如钱来苏、文艺界的萧军、艾青等。当时在新老干部之间、根据地党组织同地下党组织之间、工农干部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本地干部同外来干部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些矛盾不断地表现出来。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为了纯洁组织，整风后期转入审查干部，这在原则上是必要的。但是这项工作出现了严重偏差。特别是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之后，当时的保卫部门，特别是掌握保卫工作大权的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因袭“二战”时期肃反工作“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夸大敌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逼、供、信”，造成大批冤、假、错案，起了很坏的作用。这在党的整风运动开展以后，是一个不应发生的政治错误。党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于1943年底开始甄别，平反了一批冤、假、错案，对错误进行了坚决的纠正。

(二)

整风开始后，党内发扬民主，发动大家提意见，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意见特别多。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反对党八股》报告的第三天，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给毛泽东主席上书，批评延安“衣分五色，食分三等，贫富不均，贵贱有别”等等。同时，在

延安街头出现了一种手抄的名叫《轻骑队》的壁报，贴在大路上，主办人童大林，内容也是批评等级制、不民主这样一些问题。3月，《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批评某些消极现象的文章。当时物资异常缺乏，对领导干部给予一定的物质照顾是合理的，作为知识分子新干部应该理解。当然，对个别不合理的地方，广大青年干部提意见也是可以的。但有些老干部却产生猜疑，认为这是冲着共产党来的，是反对党的领导。6月，中央研究院开展反王实味思想斗争，批判的“温度”越来越高。不久，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①上宣布：不仅要弄清无产与非无产（半条心），并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务斗争。1942年12月6日康生在高干会上作了反奸细斗争的报告。同一天，中央总学委会发出了《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指出：“延安整风学习中暴露了党内‘小广播’的危害性是极严重的。根据各方面材料可以看出：有人将党内政治、军事、党务、组织、经济、教育、锄奸、情报等等秘密消息与秘密行动都泄露出去，破坏党内有关生命的秘密，有的人散布对苏德战争、中日战争的悲观言论，甚至于‘广播’对敌有利的谣言；有的人对党内同志任意污蔑造谣中伤；有的人散布整风是为了打击某些人的谰言，破坏党内团结；有的人替反革命分子‘广播’反党思想；有的人替反革命分

^① 指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

子制造反党言论。这种严重的现象流行在每个角落里，无论在党政军民学各机关中，无论在老干部新干部中，无论公开工作部门中与机密部门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于是，各系统、各单位便发动每个干部填“小广播”登记表，写自传，反省思想，反省历史；调查社会关系。康生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铁的规律”。这样，整风学习便从1942年12月转入了审查干部。

当整风即将转入审查干部的前夕，即1942年11月，康生在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制造了一个离奇的案件——张克勤案件。

张克勤于1936年10月在西安参加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派到兰州做地下工作，并在兰州入党。1939年6月因被敌人怀疑，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调到延安。张到延安后，国民党特务抓了他的父亲樊执一和妻子朱方兰，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被捕后叛党。1942年整风期间，延安保健药社接到重庆李炬寄给张克勤的一份国民党刊物——中央周刊。据张克勤回忆分析，李炬可能是和他妻子鬼混过的特务。另外，西安三青团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批自首人员的名单，第一个名字便是张克勤。加之，延安鲁艺又转来一份检举张克勤是特务的材料，康生便据此于1942年11月的一天，突然派人把张克勤看管起来。当时，张克勤才19岁。审讯的人对他采取诱供、威胁、肉体折磨和车轮战术等办法，张克勤在实在支持不住的情况下，承认自己是特务并交代了

所谓特务组织系统及其他特务的名单。康生不仅不认为对张克勤这种“逼、供、信”的做法是错误的，反而说：这个案子“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对延安的特务分子数目得到了一个解答，使我们的右倾思想有了一个触动。”在他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不仅认为甘肃的地下党是“红旗党”，而且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嫌疑，都是审查对象。四川省工委书记邹风平，当时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邹是大革命时期的地下党员，对党忠诚。他在对敌斗争中把脊椎骨折断了。把伤养好后他的腰从此直不起来，加上胃病、肺病，身体一直很虚弱，但仍坚持对敌斗争。1940年，党中央调他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审干中他被当成“特务”进行批斗，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的妻子当时也在延安，与邹结婚时间不长，审干中她经受不起考验，也说邹风平是特务，并因此离开了他，和别人同居了。这对他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邹风平自杀了。他在绝命书中还申辩自己是被冤枉的。1945年8月，中央党校才给邹做了结论平了反。曾任四川成都市委书记的张宣，当时在延安西北党校任教，也被宣布是“国民党特务”，进行批斗，押送边区保安处关押，直到1946年才平反。陕西地下党也不例外。陕西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董学源，1942年8月到延安参加完组织工作会议后，被高岗留下参加整风学习。在“抢救运动”中也受到审查、批斗、关押，1945年平反。还有西北局民运部的10多个干部，全系西北各省地下党的

知识分子干部。1941年民运部机关党支部办了个墙报，叫《西北风》，陈元方任主编。第一期墙报贴出后，反映强烈，高岗认为有“小资产阶级情绪”，是“发泄对他的不满”，以后便停办了。当年底，陈元方调到靖边县委任常委兼统战部长。1943年4月初，突然通知陈回西北局机关，一进机关，挎包还未放下便叫去参加批判会，要陈交代《西北风》问题。而且说《西北风》和《轻骑队》一样性质，都是反党的。接着便是无休止地批斗，到5月说陈是“死顽固”，进行假枪毙后送到边区保安处关押，直到1946年7月1日才结论平反。在康生的指示下，还将曾经在甘肃工委工作过的许多同志，先后押到延安接受审查。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他的高级参谋胡公冕（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对我态度友好）为首的一个代表团来延安和我方谈判，并派特务分子侯声（胡宗南部队的副师长）同行，让侯刺探我边区布防情况。康生以“防止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宗南代表团来往”为由，亲自圈定所谓“叛徒”、“特务”、“反革命”嫌疑分子名单，指令边区保安处于4月1日夜晚逮捕了200多人。他还得意地说：“4月1日晚来了个突变，一夜鸡犬不闻就捉了200多人。”逮捕前，有同志提出过证据不足，康生则说：“先抓起来再说，正因为不清楚才关起来审问。审问就是为了弄清问题。”

1943年4月3日，党中央作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提出整风的目标，除了“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外，还要“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于是边区各系统便都在审干中增加了反奸内容。边区政府在

1943年整风方案中决定“审查干部，不仅要审查干部的思想，又要审查干部的历史和政治面目，发现和清洗隐藏的奸细，这是整风的一个主要目的。”

1943年4月10日以后，审干由内部转为公开，开展了群众性的坦白运动。首先让“坦白典型”张克勤骑上高头大马，戴上大红花，先后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八路军大礼堂、绥德抗大总校、绥德师范等单位去作“坦白动员报告”，进行“现身说法”。张克勤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西北公学召开的号召坦白的大会上，一个一个地盯住看，看着谁象就叫谁承认是‘特务’。承认了‘特务’就叫你上台‘坦白’，结果大礼堂坐着的一大半人都成了‘特务’。”接着，各系统各单位纷纷掀起“坦白”高潮。开大会、小会、规劝会、斗争会、控诉会，“坦白”的花样越来越多。在当时形成了一种“坦白”光荣，不“坦白”就有问题的气氛。行政学院九班有一个组的同志，全部“坦白”成“叛徒”、“特务”、“反革命”。于是他们便立即举行庆祝大会，大家捐钱买了花生、红枣，还邀请其他组没有“坦白”的人去参加。大家漫谈反省的思想过程，启发没有“坦白”的同志回到本组去“坦白”。边区政府总务处有一批勤杂人员出身贫苦，历史清白，文化程度较低，苦于没有问题“坦白”。老处长因此弄得吃不下，睡不好。总务处里的同志平时和老处长关系融洽，他们便私下商量：一是为了解除老处长的苦恼；二是“坦白”了能戴红花，吃饼干，于是大家一齐“坦白”成“特务”。这样“坦白”的人没有感到压力，老处长也因而笑逐颜开。5月22日，边区政府大礼堂

也召开“坦白”大会，从表面上看是个人自觉反省与集体帮助相结合，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偏差。这样从保安机关到一般机关，假坦白越来越多。在“坦白”热潮中，埋下了冤、假、错案的种子。

针对出现的问题，1943年7月1日，毛泽东给康生写信，明确提出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并指示将此批语刊登在《防奸杂志》第六期上，以引起重视。

但康生并没有执行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这时，康生虽然被迫停止了秘密地大批地捕人，但他仍然坚持“左”的错误做法。他说：“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个特务”，“延安新市场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下滚来滚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坦白”运动继续迅猛发展，“坦白”的人数越来越多。到7月9日，已有450人“坦白”了问题。

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

劫不复的境地。”他还解释为什么要“抢救”：因为“一个小孩子失足河中，如果是平时，还可以从容的去救，如果是涨大水的时候就要抢救。”“自然界的失足者，主要是靠外边的人来救，而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抢救的时机，却主要是依靠自己。”康生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这个报告把反奸斗争推向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机关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镇到农村，直至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大搞坦白检举。当时康生除领导整个运动外，还负责领导中央机关的运动。边区系统是罗迈（李维汉）负责，西北局系统是高岗负责，各单位的运动，分别由各单位的领导负责。李维汉回忆：“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7月16日召开抢救大会”，“在短短十多天中，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以‘坦白’号召‘坦白’”。“把张克勤请来作‘坦白’报告，要他现身说法，劝说别人‘坦白’。这叫作思想发动。第二次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欢迎上台‘坦白’。气氛极为紧张。”“如文书科的一个女同志，在‘抢救’她的时候，满头大汗，紧张极了。”“第三次控告。”“由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如果有人提议处以死刑，也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当时，“台下还高喊：‘捆起来，捆紧点！’”监狱的情况更为严重。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地下党员朱子彤^①回忆：“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

^① 朱子彤现任西安市顾问委员会主任。

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待问题。”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促使他们交待问题；有时组织被关押的所谓“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坦白交代”，给他们施加压力。张宣回忆：“抢救运动扩展到群众中后，保安处领导要我到延安市民的‘抢救’运动大会上‘现身说法’，坦白自己的‘特务’问题。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去是可以，但我在群众会上先要声明：我本来不是特务，是保安处领导布置的任务，叫我来讲的。他们听了，把我训了一顿，要我严肃考虑。过了几天，问我考虑好没有？我说我去不合适，我只能是那个办法。我既要服从组织，又不能欺骗群众。他们又发了一顿脾气。一天，他们派人押着我去参加延安市民的‘抢救’大会，我向押我的人说，我要讲的内容前几天早都说过了。到了会场我直往台上走，押我的人一把拉我下来，怕我讲上面的话，便又把我押回了保安处。”

这时候，边区保安处关押的人越来越多。凤凰山坡上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已经挤满了人，又新挖了一些窑洞。原来一个炕睡四人，后来睡五六人，“挤得翻不了身”。^①

这时候，逼、供、信已很明显，逼、供、信的花招也越来越多。

一、凭主观臆断，任意指鹿为马。“以主观推论代替调

^① 引自张宣：《延安审干与“抢救”运动的回忆和认识》。

查研究，将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将许多新知识分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信为坦白彻底。”^① 康生常常拍着胸膛说：“看×××那个样子就像个特务”。“×××要不是奸细，把我康字颠倒写。”甚至说有的女同志“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等等。他不仅怀疑抗战初期进边区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迫害一些老干部。如对中央组织部一个老同志，因为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国语，就被整成“意大利特务”。把一个在1935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老同志打成“叛徒”。平时，他可以任意指定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送干部去受审查。一次他让李维汉先后送到边区政府的三个干部，结果只放回两人，一人音讯杳无。

二、利用受审人员精神上受刺激的变态心理诈取口供。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19岁），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人是汉奸，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3天3夜不让她睡觉。并威胁她说，如果再不承认是特务，就放两条大蛇到她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记》里的情节胡编一套假口供。康生说要“犯人”反省“那些最不愿意叫人知道，最

^① 引自中央社会部：《整风审干材料汇集》（1944年3月23日）。

对不起党，最怕人说的，人家一说就翻脸的事情”。当诱逼出大量口供后，康生又说：“犯人供出那么多问题，谁知道哪些是假的？哪些是真的？怎么能不追查呢？”他教干部号召“犯人”坦白后一律宽大处理。有干部问是不是对交待好的宽大释放。他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待不清楚，交不上卷嘛。”他还教审讯人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犯人”永远答不完。康生还发明一种叫被审查人员“填月表”的办法。就是突然让被审查的人当场填写每个月的历史，如果记不清或填写的内容和过去交待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有些地方提出“五分钟解决问题”，搞“坦白竞赛”等。

三、施以各种肉刑，进行刑讯逼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24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致死。

从1943年7月15日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逼、供、信更为严重。据一个县委扩大会议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17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91人，私自被关押的29人。经过“抢救”，延属各县共挖出了2463个“特务”。军委三局电讯学校200多人，挖出170个“特务”。中央秘书处60余人，也挖出了十几个“特务”；西北公学500多人，只有20人没有被“抢救”。有的事情后来简直成了“笑柄”。有一

个新婚不久的同志，一天因工作回家迟了，半夜到家，新媳妇仍独守孤灯等待他。他不仅不为之感动，反而认为她有问题，硬揪着她到一位负责同志那儿交待问题，弄得大家啼笑皆非。陈元方回忆：“逼、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叉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说承认后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籍等等。”“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在一次批斗陈元方时，由于他拒不承认是“特务”，便被五花大绑，整整48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紧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建国后还没有蜕尽。^①康生对于他报告后各单位取得的“成绩”，很得意地说：“你们麻木不仁，说延安不会有特务。现在你们要多少？一个排？一个连？……一个旅都够了。”

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多方面的报告，发现了抢救运动中的问题，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了审查干部的9条方针，纠正反奸扩大化和逼、供、信错误。1943年8月29日西北局关于绥德反特斗争给地委的指示中强调：“不要多逮捕人，尤不可多杀人，少数需枪毙者，亦暂时不枪毙。”^②1943年9月7日，西北局再次发指示，要求在反特务斗争中“要做到少捉不杀或

① 引自陈元方：《党内斗争的一场灾难——“抢救运动”》。

② 引自《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文件汇集之三》。

少捉少杀，保证在审查干部与反特务斗争中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个别罪大恶极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特务分子，自应处以极刑，加以镇压，但也不必急于杀掉。可待清理完毕，报告上级，再行处理。各地在未得到西北局批准前不得杀人。”^① 在这些指示下达后，延安以外地区抢救运动仍处于高潮时期，“逼、供、信”错误尚没有得到有效制止。9月21、22日两天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连续刊登了《延安县开展防奸运动》和《绥师失足青年纷纷悔过，控诉国民党特务机关万恶罪行》的报道。报道称：绥师“已有160余人觉悟改悔”，“在大会上自动坦白者280余人，被揭发者190余人”，“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16岁的男小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的武器。”^② 绥师的控诉会一直开了9天，在这些十几岁的小孩中，最后竟挖出了230个“特务”，占该校总人数的73%。

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看了绥德反奸斗争大会的材料后批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须使各地委坚持此种政策。”同年12月18日，西北局社会部又发出第二号通知，批评许多地方的保安科仍有对犯人肉刑审讯和变相肉刑。要求“各地逮捕反

① 引自《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文件汇集之三》。

② 见1943年9月22日《解放日报》。

革命特务分子及反革命嫌疑分子，应恢复过去负责人签字的办法，经过党的锄奸委员会或军队锄奸委员会的负责人签字，不准随便乱捕人。”^①

为了防止逼、供、信的错误扩大，党中央、毛泽东多次给各中央局及分局发指示、通报，要他们“不要把一切从敌占区及国民党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人员等等，一切犯过错误的半条心的人，一切坦白分子及逮捕了的犯人，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党的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② 要求在已经发动坦白运动的地方，广泛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使他们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危险，绝大害处，不仅可以冤枉同志，而且必然会中特务的诬害阴谋”。要求根据具体情况，订立反奸纪律在群众中公布。据不完全统计，在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后不到两年时间内，党中央先后发过有关反对逼、供、信错误的指示 24 次，使错误不断得到纠正，青年剧院打死人的事也得到处理。

反奸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

一、打乱了工作的正常秩序。当时有 1000 多名工作人员的通讯部门，因许多人打成了“特务”，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许多通讯工具无人掌握，使延安和各根据地、各省的联系一时中断。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外勤工作，也因为审

① 引自《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文件汇集之三》。

② 引自中央社会部：《整风审干材料汇集》。

干，把各据点的负责同志和外勤干部抽到延安接受审查，外勤工作交由各分处代管，而各分处也由于审干、反奸，集中全力于内部，因而外勤工作处于停顿状态。

二、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挫伤了一批人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有的貽恨终生，有的因而丧命。由于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边区与国统区、敌占区处于隔绝状态，而大部分被“抢救”的人又是从国统区、敌占区投奔革命的知识分子，这些问题很难在边区内部查证清楚，所以有些人的“包袱”一直背了几十年，直到全国解放后才作结论。有的审干中的问题被当成“辫子”和“尾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被揪住不放，挨整了几十年。有一个被康生诬为“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的女同志沉痛地回忆说：一生“前后（被）审查14年之久，前7年是我一踏进革命的门就受审查，还是美好的青年时期，当时只有19岁；后7年正当壮年，是可以很好工作的时期，都丧失在康生的反动血统论和主观主义的逼、供、信之下了。”1986年，笔者见到甘肃省政协常委张克勤老人，他深有感慨地说：“今年是我参加革命50周年，50年中一半时间是在挨整。”“1943年‘抢救’，开始就戴上‘特务’帽子。抗战胜利后，戴着‘帽子’调到东北”，“1959年又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被康生点名，关了5年半监狱。”彭尔宁同志193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国学系，由于追求进步，投身抗日，从沦陷区历尽千辛万苦才在1940年春辗转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到自然科学学院工作。整风时，为墙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

生硬说此画是心向日本帝国主义，把他打成“日特”兼“国特”的“双料特务”，直到1980年康生问题被揭发后，这一桩38年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但他年已古稀，为祖国作贡献的大好年华已一去不复返了。彭的父亲钱来苏是老同盟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因不满蒋介石对日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反共政策，于1943年3月在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帮助下，带着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住在延安交际处。来后不久，正值反奸斗争进入高潮，儿子被打成“特务”，女儿女婿也都受到隔离审查。1944年元旦和春节，钱来苏老人独自一人，心情郁闷。当时交际处其他客人也都不敢和他多交谈。他找到交际处的领导激动地责问说：“第一，是不是在这里每个人都要搞成特务才算？外边来的人皆不能相信？”“是不是下面的人把所有的人都搞成特务，到上面去报告功劳就愈大？第二，既要我来，又如此对付我，到底为什么？我出来是为了抗日救国的，难道是来干这个（指当特务）的？如这样，我不如在家当汉奸，我还冒险跑出来干什么！”有些人经受不起冤枉折磨而自杀。仅延安一地自杀身亡就有五六十人。曾被誉抗日“爱国五青年”的蔺克义，1936年在陕西西安师范上学时就加入地下党，积极从事学生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兰州、西安等地从事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工作中，一直表现很好。在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中，

立场坚定，勇敢顽强。”^① 1939年9月到延安，先后在中央青委、延长新华书店、中央出版发行部等单位工作，1940年冬派他到晋西北工作。延安“抢救运动”中，有人被逼供出蒯克义是“特务”，检举材料由中央社会部转到晋绥抗战日报社（蒯当时任抗战日报社出版发行部主任），蒯以“特嫌”被单独看管。最后确定转晋绥公安局关押审查。在送走前，晋绥分局后方负责人廖井丹找他谈话，廖回忆说：“黎印（蒯克义）始终是痛哭流涕地讲他不是特务，没有政治问题向党隐瞒。”^②以后一直被关押在晋绥公安局看守所。“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一位负责人指示，要求在历史老案（指整风中关押起来的）中，罪行比较严重的处死一批。”^③蒯克义便是这批被错误处死者之一，时年仅29岁。他的案子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平反。

三、造成革命营垒中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人人自危。有的被错整的干部精神上的创伤深重。1946年下半年，四川地下党的一个干部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挨了整，平反后组织派他回四川工作。中央布置陕西省委把他带出封锁线，到了白区，由他自己回去。当时省委在柳林镇有一个工作据点，公开名义是骡马大店，负责人邢志舟。省委让邢志舟找个可靠的关系把他带出边区。邢委托耀县的一个保警队长，连夜带着那位四川同志越过封锁线，到保警队楼上隐蔽起来。由于那个保警队长晚上穿的是便衣，第

^{①②③} 引自中共陕西省委组织部《关于蒯克义案件的调查报告》（1981年10月29日）。

二天早上他换上国民党的警察服，那位四川同志一见以为他被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保警队长一再解释，那位同志就是不肯下楼，并把墙上挂的一支步枪举在手上说：“谁敢上楼就打死谁！”无奈，保警队长又马上跑到柳林据点去报告。等到柳林据点派人赶到保警队时，这个四川的地下党员已经神经错乱，在楼上自杀了。^①

(三)

1943年底，中央决定对反奸运动中被审查的人逐个进行甄别。1944年春，毛泽东把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和中央社会部干部师哲叫去询问运动中坦白分子口供材料是否真实。并指示：“你们回去把那些口供交给犯人，说明要他们自己修改。一字一句错了，就改那一字一句；一段错了，就改那一段；全篇错了，就让他们推翻重新写。不要怕翻案，我们是实事求是的，要真实的事实，不要假口供、假材料！他们是交待问题，不是写文章，更不是写小说。必须是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一句假话，一切不实之词都不要。”此后，甄别工作从延安到绥德、关中等地，先后转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有的地方仍是由原来的整风领导小组领导，有的机关、学校新成立了甄别工作委员会。比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了以帅孟奇为主任，周扬、王子宜参加的甄别委员会，加强对甄别工作的领导。绥德成

^① 引自陈元方：《党的斗争的一场灾难——“抢救运动”》。

立的甄别委员会，还吸收党外人士参加。

党中央分析了坦白运动的情况，将坦白的人分为六类，确定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政策界限，制定了对待各类人员的政策。区分六类人的界限是：“第一类是特务分子，他们是受一定的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的主使，对我们进行过或进行着特务工作（长期埋伏，也是一种潜伏工作），确有真凭实据的。”区别职业特务有三个条件：“加入特务组织，有特务机关，有特务行动。”“第二类是变节分子。其中有的是破坏过党的组织，捉过人，杀过人的；有的自首后写过反共文件，但未做过其他坏事的；有的被敌人短促突击，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但回来既未实行也未报告的；有的是内战时作过坏事，抗战后中立或改过的等等。”“第三类是党派问题。他们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他党派。在加入我党后并未向党报告，但还不是特务分子。”“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分子。有的是在敌人红旗政策下不自觉的被特务利用，有的因半条心或幼稚无知，作了特务的工具。”“第五类是党内错误。如假造历史，虚报党龄，欺骗组织，包庇坏人，损人利己，思想错误，政治错误及贪污腐化等等，在坦白运动中被怀疑而误认为特务。”“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害的。”“特务分子中又有职业与非职业、自觉与被逼、首要与胁从之别。”中央对待这六类人员的政策是：对坦白了的特务分子和变节分子，如果证据确凿，采取一个不杀，团结抗日的政策；如果没有真凭实据，不要加以深追，以免造成对立僵局，有碍争取，或中敌人诬陷同志的奸计。对有真凭实据的暗藏的破坏分

子，应继续执行宽大政策。即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给改过自新者将功赎罪的出路。对一时审查不清的重大嫌疑分子，不要急于求得解决，以免造成逼、供、信。可以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或暂时按他讲的作一结论，然后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和秘密侦查。对有党派问题的、被欺骗蒙蔽的，或仅属于党内错误这三种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或被特务诬陷的，一经查清，立即平反。对新知识分子，必须注意到他们从抗战以来在战斗的环境中出生入死的实际表现。在审查他们时，绝不要忘掉这个重要根据。对他们的方针“既要详细审查，又须关心爱护。”要随时防止和纠正老的工农干部对新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与报复情绪。正确估计新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好的，特务只是极少数，不要将他们的思想问题与特务问题混为一谈。

虽然中央一再强调特务是极少数，但甄别工作初期，仍然没有摆脱“左”的影响，定为特务叛徒的比例明显偏大。延安经过3个月甄别了800人，占坦白人数的1/4。中央社会部、中央直属机关、边区政府、边区保安处、党校、延大、联司（指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等7个单位，经过8个月甄别的487人中，特务64人，叛徒41人，仅特务、叛徒比例就占甄别人数的22%。其中康生直接领导的中央社会部甄别了27人，结果职业特务就有6人，叛徒2人，两者占甄别人数的30%。直接负责审查敌特的边区保安处工作人员中，甄别了96人，其中特务就有36人，叛徒2人，

叛徒特务占40%。而康生在1944年8月11日所作的《关于甄别工作进展报告》中还说：“说明不是没有特务”，“从机要部门来看，是非常严重的。”

随着工作的进展，调查研究逐渐深入，甄别工作也就比较细致，比较实事求是了。比如边区政府的甄别工作“坚持一个人作一个结论，不留‘尾巴’，并同本人见面。因之，一般说，甄别工作是做得比较好、比较快、比较令人满意的。”^①行政学院的甄别工作也比较细致。行政学院共有908名学员。甄别工作采取先易后难，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层层研究调查，上面提名，下面讨论，再上报审，分期分批进行的。第一批是1942年4月间“坦白”的边区工农干部，问题简单，容易甄别的，共11人。第二批是外来干部、在延安工作的“特务分子”，有相当的材料，坦白较好不是反复无常的，共20人。第三批是“抢救运动”后集中的边区政府各厅、院、局、行的一部分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54人。在甄别工作中，他们抱着尊重被审查者的态度，使被审查者感觉他们确是帮助他弄清问题的。向四方面作调查：向本人，向同案及有关人员，向原来领导机关，向敌、顽、友方面，把问题弄得水落石出才下结论。还提出“自己负责解决自己的问题”，提高被审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根据具体情况，对被甄别的人分别作出结论。结论分四种情况：完全可以做结论的；按问题做部分结论的；结

^① 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513页。

论带“尾巴”的，即主要问题清楚，次要问题待查的；难于结论的。经过按级批准后宣布结论。

经过一年多艰苦细致的甄别工作，到1945年春，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甄别工作已基本结束。在2475人的初步结论中，党外政治问题约占30%左右，其中叛徒、特务、自首三者约占10%。党内错误问题，约占40%左右。完全弄错的约占26%左右，保留问题的约4%。这些保留问题的，大都因当时条件限制，无法查证，难于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经过逐级请示，最后毛泽东说：现在东北快解放了，需要大批干部，让他们到前线自己去做结论吧。是共产党人，一定留在共产党内；是国民党人让他跑到国民党去。怕什么呀。这样一来，被“抢救”的人就全部解放了。只有极少数的人直到解放后才做结论。张克勤就是到1950年4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组织上才作了历史上没有问题的结论”。^①

边区保安处被关押人的甄别，则大部分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进行的。当时中央决定要派大批干部到东北，催促保安处对关押的五六百人抓紧甄别。保安处干部力量不足，就从被关押的人中抽了陈元方、王文源、何定华、周建南等20多人参加甄别工作。由保安处给他们分派被甄别对象，然后阅读甄别者的全部交代材料，找本人谈话，提出鉴别意见，提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由保安处三科同意后向被甄别者宣布。到1946年上半年，被关押的人基

^① 引自张克勤：《延安抢救运动中我的经历》。

本甄别完毕，大部分到了东北。最后，保安处决定，参加甄别的人，由他们自己甄别自己，自己给自己写结论，保安处三科审阅后，本人签字定论，重新分配工作。

对于反奸斗争中的问题，当时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多次公开承担责任。1944年元旦，领导通讯联络工作的王铮领着一批被搞错的干部向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对他们说：“这次延安审干，本来是让你们洗个澡，结果灰锰氧放多了，把你们娇嫩的皮肤烫伤了。这不好，今天，我向你们敬个礼，你们回去要好好工作。”一次是在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毛泽东当着大家的面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并向大家鞠了一个躬。再有一次是在王震、王首道那个部队南下时，毛泽东说：“整风并不是完全好的，有过抢救运动，整错了人，搞冤、假、错案。我给大家敬个礼，如果对方不表示态度，我的手就不放下来，一直要对方表示态度，然后我这只手才能够放下来。”^① 还有一次是在1945年“七大”前夕，在中央大礼堂的一次有中央机关和边区系统干部参加的大会上，公开向被“抢救”错了的同志道歉。并且要求各单位对在什么场合因“抢救”戴错了帽子的，要在原场合取下来。以后机关学校都照着毛泽东的指示办。1945年10月19日，李维汉在边区政府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检讨，向错“抢”的同志道歉赔不是，当场取下了错误戴上的“帽子”。

为了防止今后审讯工作中的逼供信错误，甄别工作开

^① 引自1986年6月27日薄一波在湖南省顾委委员和部分老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始，西北局社会部还制定了《审讯工作基本条例》，强调审讯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逼、供、信。

这样陕甘宁边区反特务斗争，从端正指导思想，到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不断完善，走向正轨。全面总结了由抗战初期的右，到坦白运动中的“左”，又由“抢救运动”中的“左”到最后正确甄别的经验。

(四)

陕甘宁边区的反特务斗争，从1942年底审干坦白运动开始，经“抢救失足者”，到1945年甄别工作结束，历时两年多，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

第一，必须确立一条正确的反奸路线，这是端正反奸斗争的方向盘。陕甘宁边区的反奸路线是在反奸斗争中逐步形成并逐步完善的。这条反奸路线的内容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九条方针”，即“首长负责，亲自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一个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宽大政策”；还有一个是“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这三个部分组成了正确完整的反奸路线。而错误路线就是“逼、供、信”。

第二，必须正确判断敌情，这是开展反奸斗争的前提。陕甘宁边区在整风前确实破获了一批特务案件，但却由此而得出“特务如麻”的结论则是错误的。1942年12月3日康生在高干会上讲：“这一时期，反革命在边区的活动是极

端严重。党内许多同志对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对党内的宽大政策，曲解为放任主义。”因而，整风转入审干后，反奸斗争一浪高一浪，以致发展为“抢救失足者”运动。毛泽东纠正了这两种偏向。他说：对待敌情的看法，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特务如麻”。他分析了反奸斗争经过三个阶段：“一个叫熟视无睹或者叫做天下太平，一个叫做特务如麻，再一个叫做甄别工作分清是非轻重。”“究竟天下太平不太平，我讲天下又太平又不太平，太平是真，不太平也是真的。绝大多数的人，绝大多数的党员是天下太平，是没有问题，是可靠的。但是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①对敌情分析失当，右了会放纵特务；“左”了又会误伤人民，这是个严肃的问题。

第三，反奸斗争中实行宽大政策，既能分化瓦解、转化消极因素，又能防止误伤好人，实践证明是一条成功的经验。陕甘宁边区在反特务斗争中，始终坚持对被清出的暗害分子实行宽大政策。所谓宽大政策就是以“宽大为主，镇压为辅，感化改造为主，惩罚为辅。”“区别其罪大恶极的与一时失足的，怙恶不悛的与愿意改造的，首要的与胁从的，坚决的与动摇的，狡猾的与坦白的等等情况，予以分别处理。除罪大恶极坚决不愿改悔者外，均不加杀害，给以宽大待遇，予以改过自新之路，并加以感化改造，争取其中彻底改过者为革命服务。”这一政策其所以是成功的经验，无论就当时的情况及以后经过革命长时期的检验，都

^① 引自1944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报告《反特务问题》。

有其积极的意义。就当时来说，保证了少犯错误。一方面保护了好人，对搞错了的人，由于宽大政策的保护，免遭诬害，得到平反。另一方面，经过调查，对真正的暗害分子，起到“动摇敌人内部的思想，瓦解敌人的队伍”的作用。

第四，调查研究，广泛发扬民主，认真听取群众意见，特别是被审查者的意见，是防止或减少错误的重要一环。当时一些单位运动的领导者，不了解国统区、敌占区的情况，凭主观推断，靠“逼、供、信”。甚至有的被审查者供出了问题，但由于不符合主观想象，便不相信。葭县有一名县参议员，在坦白运动中承认是陕西省调统室特情人员，并交出了榆绥分区调统室的真实证据，但主管审讯的人并不相信，认定原有的怀疑，硬逼他承认是复兴社分子。

陕甘宁边区审干和抢救运动中出现的“左”的错误，除了社会根源外，还由于：一是我党历史上“左”倾路线的影响，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没有彻底肃清。二是受共产国际“左”的影响，受斯大林的错误影响。一次会上，有的领导批评“抢救运动”的错误，康生辩解说：“严格审查是完全必要的”，“苏联党就是这样搞的”。康生从苏联回来不久，套用苏联的经验是很自然的。加之，从很多资料表明，康生此人“左”是一贯的，整人是一贯的，反奸运动中的错误，他应负直接的责任。

1945年3月，蒋南翔给刘少奇和党中央写的《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对“抢救运动”的估计，至今看也仍然是比较正确的。他说：“若就单纯的保卫工作的观点来说，

这自然是有成绩的；但若就党的全面的利害得失衡量起来，那应说是得不偿失。”他又说：“假使一个国家，在国内发现了少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的第五纵队，因此就立刻颁发全国总动员令，对隐藏着少数第五纵队公开宣战，那么，大家知道：动员和武装起来的将士就要寻找敌人作战，但敌人是非常之少而又非常之隐藏，于是找错对象，自相火并，也就只能命定地成为必然的结果了。在这种盲目的战斗中，虽然也会碰巧击中一些敌人，但却更多地伤害了自己。”^①好在我们党产生的错误，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党自己来纠正的。以后发生的一些错误，直至“文革”中的错误也都是我们党自己纠正的，而且从思想上理论上作了彻底否定，这些都雄辩地证明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马列主义的党。

^① 见蒋南翔：《关于抢救运动的意见书》，见《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4期。

东北军学兵队简史

东北军学兵队简史编写小组

东北军学兵队是张学良将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后，为培训东北军抗日骨干而建立的。学兵队于1936年8月组成，9月在西安正式成立。大多数学员是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招收的进步青年，其中大部是民先队员，也有一些共产党员。学兵队成立后，立即建立起秘密党支部和党总支，在东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党的工作，积极发展党员，党员人数发展到200人左右，成为党在东北军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东北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7年5月，学兵队被蒋介石勒令解散。党组织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将有条件在东北军工作的同志，分散到东北军各部队，继续坚持工作，其余同志分配到华北等地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绝大多数学兵队员，在党的领导下，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些同志英勇牺牲，许多同志后来成为党、政、军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事实证明了东北军学兵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党为了争取和改造东北军而组织领导的一支革命力量，是党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在国民党统治区大批培训革命干部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为改造国民党军队成为抗日武装力量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一、学兵队成立的历史背景和经过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军统帅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铣电），葬送了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1933年日寇又侵占了热河省，1935年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吞并全中国。当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2月，北平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立即掀起全国人民抗日运动新高潮，但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顽固地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祸国政策，一面残酷镇压抗日爱国运动，一面调集大军，围剿长征北上的抗日红军。1935年9月，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东北军成了“剿共”的先锋。从1935年9月到11月，东北军同红军在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交战中，连续被歼灭近3个师，损兵折将，伤亡惨重，这使东北军官兵极为震惊。南京政府不但不予补充，反而乘机将被歼灭师的番号取消，扣发军饷，使东北军上下官兵极为气愤。自从东北沦亡以来，几十万东北军民流亡关内，受到种种压迫和歧视，进入西北以来，更是备受流离颠沛之苦。残酷的事实，使东北军广大官兵逐渐认识到：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如果要再打下去，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就更难实现了。因而厌恶内战、抗日复

土的情绪普遍高涨。

早在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出国到德、意考察，以为法西斯可以救中国，幻想通过执行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实现其收复东北的愿望。然而，事实使他失望了。他转而劝蒋改变国策，却遭到蒋多次训斥，使他处于深深地苦闷之中。在东北军广大官兵要求抗日复土的情绪影响下，在全国抗日高涨和东北爱国民主人士的推动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学良开始认真考虑寻求新的出路。

1935年12月，党中央确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20名党和红军领导人联名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申明党的主张，表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首先停战，联合抗日。同时党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从各方面加强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并派中央特派员朱理治到西安直接领导。长期在东北军中做党的工作的刘澜波等同志根据实际情况，顶住要兵不要官的“左”倾兵运工作的压力，积极开展争取中上层军官同情抗日救亡，保护进步人士的工作，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东北军做出了有效的成绩。党还应张学良之请，派刘鼎为代表在张学良身边做联络工作，对促进张学良联共抗日作了积极贡献。红军在前线，发动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老家去的强大政治宣传攻势，深深地打动前线官兵抗日复土的心情，大大地改进了东北军同红军和群众的关系。红军执行了正确的俘虏政策，提高了被俘官兵的政治觉悟，释放后成了红军

的义务宣传员，使东北军广大官兵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中坚力量。被俘的六一九团团团长高福源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主动要求回东北军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2月间，李克农先后与王以哲、张学良会谈，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同年4月9日，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这次会谈，对于促进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伟大的成功。

延安会谈时，张学良提出，东北军部队极需进行抗日教育，请红军给予帮助。他对东北军缺乏抗日干部，深为焦虑。周恩来提出，缺乏抗日干部，可以采用举办训练班的办法来解决，这对张学良启发很大。刘鼎也向张学良建议，招收青年学生入伍以培训抗日骨干。6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王曲举办了以联合抗日为目的的三期军官训练班。选择团以下、连以上军官参加。9月，张学良组织了“抗日同志会”，自任会长，吸收拥护抗日的骨干分子参加，作为抗日核心组织，同时，筹建“抗日学生队”，培养抗日骨干。筹建经过如下：

1936年2月，张学良以东北大学校长名义邀请学生代表宋黎、韩永赞、马绍周等3人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为中心，就北平学生运动、东北大学和东北军的前途等问题作了5次长谈。3月间，张学良密召宋黎到洛川，要宋以秘书身份到前线考察部队情况。宋黎了解到东北军官兵虽有强烈抗日的愿望，但对“攘外安内”的祸国政策还认识不清，旧习气较重，营连军官数量少，政治素质也差，不能适应

抗日的需要。根据这一情况向张学良建议办陆军学校，培养中下级抗日军官。苗勃然也提出了类似建议。5月间，北方局决定在东北军中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东北军中地下党的工作。宋黎向刘澜波汇报了向张学良提出办陆军学校的建议，刘澜波非常赞成，认为这是党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要宋再给张学良写信，详述办军校的建議。7月初，张学良找宋黎谈办军校问题，宋讲了办个千人规模的陆军学校的意见，张学良考虑到办陆军学校南京不会允许，于是决定办个学生队，放在卫队二营（以后通称学兵队）。当即责成宋和参秘室主任应德田、参谋孙铭久具体筹办。学兵队于是就很快成立起来了。东工委委托宋黎负责领导学兵队党的工作。

二、学兵队学员的来源和组织编制

1936年8月，通过北平地下党招收的学员，大多数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大、中学生，不少是“民先”队员，一部分是社会进步青年，少数是原在北平工作的党员，在开头，转来党员关系的约有20多名。

第一批学员110多人，由赵天野带队，8月下旬从北平西站登上三节军用闷罐车。车上虽然拥挤闷热，但大家情绪很好，一路上畅谈国家大事，高唱救亡歌曲，气氛十分热烈。到西安后，由队副于维哲到车站接待，带到浴池洗澡、推光头、换军装，住在西安东城门内楼，编为一队，后改为一连。这批学员中的党员有高翔（郭峰）、任志远、张

折、侯晓岚、李震（谢克东）、刁向坚、刘景希（谷牧）、张岗、王一平、王克奎（乔晓光）等。先成立临时支部，郭峰任支部书记，郭峰调五十三军后，成立了正式支部，支部书记是张折，后是任志远。

第二批 100 多人，也是赵天野带队，于 10 月下旬到西安。他们同第一批学员一样，一路上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并在火车上举行了纪念鲁迅逝世的活动。到西安后，也是洗澡、推光头、换军衣，住在东城门外楼，编为四连。这批学员中的党员有吴山、张勉、李正南、袁直心（袁心纯）、程容、林山复（凌旺）、刘克宏、金铎（金铁群）、王晓星、丁光（汤丁光）等。支部书记是张勉。这时由于党员逐渐增多，为加强领导成立了总支，下属三个支部（含军官支部）。

11 月间，关时润、吴铎去北平招收第三批学员，经地下党介绍，招收到 200 多人。因为国民党发现东北军学兵队招收学员，迟迟不给调拨车皮。不久，西安事变发生，军车停开。他们于是自己买票，改由同蒲线西行。车到韩城时，被冯钦哉部阻留，不准去西安，这批人就分散了。有的辗转去延安，有的返回北平，只有少数人到了西安，参加了学兵队。

三连成立于西安事变前不久，人数约有 60 余人。最先到达的是 9 名广东青年学生，原拟去延安，经组织决定留在学兵队。以后又陆续从上海、河南、山西、武汉、西安等地来了几十人，这个连住在平民新房。这批学员中的党员有赵秋苇（罗立斌）、何天鹏、王盾（王志清）、吴振刚、吕志先、任士舜、安志文等。支部书记何天鹏。也属总支

领导。

三个连及队部总数约为 370 人。

学兵队的组织编制和整编后干部配备情况大致如下：

学兵队设队部。队长康鸿泰（共产党员），西安事变前一天调任一〇五师八团团长，后由邬庆林继任。队副孙巨奎、于维哲（共产党员）。负责政治工作的先是关时润，后是陈再励（共产党员）。负责教务工作的是李滋新。负责庶务工作的是周品一、陈哲。专职政治教官孔叔东（孔祥祯，北方局派来）、李梦龄（东工委从西安二中调来）。

一连下设三个排，九个班。连长王匡，一排长王琳瑛，二排长罗广智，三排长张景尧。

四连下设三个排，九个班。连长刘名显，一排长贾风林，二排长朱云飞，三排长张哲。

三连下设两个排，六个班。连长先为傅文章，后为张景尧，排长为李敬时。

排长以上军事干部都是从部队和洛阳军校东北籍毕业生中选调来的，军事班长是卫队二营和洛阳军校教导大队派来的，政治班长是从学员中选用的。

三、学兵队的训练生活

1936 年 9 月初开始入伍训练，18 日正式开学。学员一律按普通士兵待遇，每人发给两条军用毛毯，一铺一盖。睡在铺着草垫的地板上。吃的是二等兵的伙食标准。吃饭时间只限十分钟，内务要求整齐。为了保密和安全，平时一

律不准下城楼，生活虽然艰苦，训练十分紧张，但大家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一派生机。

军事课是训练的重要部分。军事教育由连、排长担任，课程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筑城》、《测绘》等。教学方法采取讲授与实习相结合，以实用于作战为目的。如进行制式教练，就将学员带到城墙上练习步伐、队形、方向变换等。进行战斗训练，则从单个教练开始，逐步进行班、排、连的教练，进而进行打野外、练习班、排、连的进攻和防御，紧急集合、夜行军、露营等。进行射击教练，则到操场上瞄三角，练习武器的拆卸和组装，实弹射击等。进行筑城教练，则到野外练习利用地形地物，作卧、跪、立姿的单人掩体和机枪掩体，构筑交通壕等。有一次进行野外练习，目的地是60里以外的咸阳周陵。学员全副武装，携带作业工具，路上练习常行军（每小时8里）和急行军（每小时12里）。到达宿营地后，还练习了架设帐篷，放哨警戒、偷袭等课目。由于军事教官都是军校毕业的，军事素质较好，学员又都是知识分子，接受和理解能力较强，所以训练时间虽然不长，教学进度较快，但成绩是很好的。

政治课是一门主课，以提高学员政治思想水平，团结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为宗旨。政治教育内容是：（一）马列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二）时事政治，实际上是中国近代革命史，重点是抗日救国斗争历史和现状；（三）抗日的理论和实际（印有小册子）；（四）苏联革命，中国苏区，红军的斗争历史和现状；（五）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政治课除由专职政治教官讲授外，还请刘鼎讲《军队的政治工

作》、《红军的军事民主》，请朱理瀚讲《社会发展史》，宋黎讲《当前的形势与任务》，请杜重远、车向忱、徐永昶、万毅等知名人士作讲演，请高福源团长介绍苏区情况。曾经被俘的于维哲队副也介绍过苏区见闻、毛主席的讲话、党和红军对他的教育感化等情况。讲课、作报告、作讲演的人，往往是“题目单纯”而内容广泛，借题宣传革命理论，宣传中国共产党、苏区和红军，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等，学员对政治课很感兴趣，学习很努力。学兵队的军事干部也随堂听课，他们的学习也很积极，有的加入了共产党。

政治课采取集体上大课和分组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大家联系当前形势讨论得很热烈。当时决定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有两种完全对立的政策，一种是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是救国的政策；一种是蒋介石顽固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这是祸国政策。这两种完全对立的政策，是学兵队讨论最热烈的问题。学兵队员虽然大多数受过“一二·九”运动的锻炼，抗日爱国热情很高，但是也有少数人对“安内攘外论”认识模糊，对蒋介石存在幻想。党组织根据东工委的布置，有意识地引导大家深入批判“安内攘外”的祸国政策和所谓“长期准备论”、“唯武器论”、“七日亡国论”等谬论。许多同志用大量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这个祸国政策的推行，使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东北沦亡，华北告危，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正是这个政策的推行，使千百万人民遭到屠杀，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也正是这个政策的推行，抗日爱

国运动受到残酷的镇压，爱国有罪，抗日坐牢，特务横行，草菅人命，民主自由荡然无存！有的同志在发言时声泪俱下，十分感人。通过这段政治学习和讨论，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团结抗日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在此期间，党组织在学兵队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

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毛泽东对东北军学兵队很重视，尤其关心政治教育。1936年12月5日，毛泽东曾给刘鼎发来一份电报。有一段是专门对学兵队的政治学习的指示，原文是：“学兵队的教材，可请理治编，教员由南、波找平津的同情分子担任”（理治即朱理治，南指南汉宸，波指刘澜波）。

学兵队除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外，文娱宣传活动也是很活跃，很出色的。学兵队中，人才济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利用“俱乐部”这个公开组织，运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如出墙报，编写歌曲、剧本，组织歌咏队、口琴队、话剧组、篮球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革命歌曲等。在俱乐部活动中，王林、梁彦、李伟、徐瑞林等都是活跃分子。学兵队常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大众的歌手》、《保卫马德里》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学兵队最爱唱的《学兵队队歌》是由学员王林作词、梁彦谱曲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由王林作词、徐瑞林作曲的，后来流行全国。

《学兵队队歌》的歌词是：

我们，是一伙流浪汉，

我们，是一群爱国犯，
家乡，家乡，一片沃野的家乡，早成了倭寇的屠场。
自由，自由，救亡图存的自由，已经被剥夺得丝毫没有。
看哪，全国的愤怒已达到沸点，全世界解放的浪潮正在狂卷。
同学们，我们要掀起抗日的暴风，我们要站在世界浪潮的前头。
冲啊！勇敢地向前冲！
杀！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歌词是：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我们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
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倭寇屠杀了我东北父老，
又进关来蹂躏我们四万万同胞。
听吧！爹妈兄弟在老家哭叫，英勇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吼。
我们不要再自煎自熬，教敌人笑哈哈地袖手取巧。
兄弟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携起手来，打回老家去！

这些歌曲，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强烈愿望，唱

出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心声，鼓舞着人们的抗日斗志和决心。学兵队不仅在东城门楼上引吭高歌，每当全副武装在市内行进或野外演习时，也是边走边唱，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安人民，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话剧组进行过几次演出。舞台是用床板搭的。观众坐在砖地上。演出的话剧有《中华的母亲》、《回春之曲》、《苏州夜话》、《喇叭》、《压迫》、《打回老家去》等。《打回老家去》的剧本是王林同学编写的，曾连续演出三次。第一次演出时就收到强烈的效果。观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警卫二营的一名士兵，失声大哭，被人扶出会场。二营士兵们看了这个剧，纷纷要求打回老家去，拒绝打内战。

各连都出了墙报，刊登了学员写的许多短小精悍宣传抗日、表达思想的短文。王林同学曾把上海出的英文《密勒氏评论》上刊登的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的谈话译成中文，首次在一连编的墙报上刊登，对大家的影响很大。

学兵队的政治活动中，还有以下几件事值得记述：

“九·一八”五周年那天，学兵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会场在城内东南角的打靶场上。会场正面悬挂着一幅由张岗设计的象征着白山黑水图形的旗帜，全体学员面向东北，会场气氛庄重严肃。东工委书记刘澜波讲了话：他说，东北军流亡关内已经五年了，我们不应该忘记家乡还有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过着悲惨的生活。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他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军事政治，严格遵守纪律，为

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故土贡献一切力量。他的讲话，慷慨激昂，引起在场人员的强烈共鸣。东工委成员苗勃然、宋黎和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久也参加了大会。韩滔代表学兵队讲了话。大会最后在高唱《纪念九·一八》歌声中结束。歌词是：“九·一八”血痕未干，东三省山河未还，海可枯，石可烂，国耻一日未雪，国民责任未完。

10月19日，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逝世。几天后学兵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学兵队员张桂主持，学兵代表汪洋讲了话。他表示一定要学习鲁迅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为抗日救亡进行不懈的斗争。班、排、连军事干部代表也讲了话。一排长贾风林在讲话中叙述了自己所遭受的失地流亡的苦难经历后，大声疾呼：“我们要打下东城门楼去，走上抗日救亡的前线！”全场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11月中旬，日伪军进犯绥远，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援绥运动。学兵队在党的组织领导下，也发起援绥运动，组织了报告会、讨论会。在讨论会上，王西萍提出直接去绥远参加抗战的要求，王远音提出到绥东、晋西北做战地群众工作的意见，也有人提出东北军应假道山西开赴绥远参加抗战的意见。这些意见，不管在当时是否可行，但大家真是热血沸腾，对蒋介石的祸国内战政策极端愤慨。大家认为，挽救民族危亡，不能空谈抗日，应以实际行动支援绥远抗战，于是派出由尚效飞等组成的代表团去向张学良请愿援绥。党组织还发动学员集体绝食，表示坚定不移的决心，队部当即答应把大家的要求转达张学良。第三天

下午，张学良将军在金家巷卫队营营部接见了全体队员，作了极其坦率诚恳的讲话。他首先对大家关心当前局势表示嘉许。接着说，他身上压着国难家仇，要求抗日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但是抗日不能只凭一时血气之勇，必须全国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才能把日本赶出中国去。国内的问题不解决，意见不一致，抗日是不可能的。最后说，许多真实情况你们还不了解，我现在也不便向你们说明，希望大家相信我，我一定要很快促成一致抗日。我绝不会在你们面前食言。这次请愿援绥，对张学良将军决心逼蒋抗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2月9日，西安市1.5万多名学生，在“东北民众抗日救亡会”（简称“东救”）、“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和西安学联的组织领导下，冒着凛冽的寒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纪念“一二·九”一周年的游行请愿运动。学兵队曾派代表秘密联系。在游行中，特务警察竟开枪打伤竞存小学的一名12岁的小学生。群众怒不可遏，决定整队去临潼向前来西安指挥“剿匪”的蒋介石请愿，要求严惩凶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得知此消息，立即电令张学良派兵制止，如果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张学良接电话后，乘汽车追到十里铺，他激动地对游行群众说：“我和你们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迫切。你们现在回去吧，我代表你们向委员长转达你们的要求。在一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回答你们。”学生这才整队而归。这天，学兵队全副武装到大雁塔打野外。在行经市内时，高唱救亡歌曲，与游

行群众相呼应。下午，在返回途中，听说有一名小学生竟被警察开枪打伤，群情激奋，义愤填膺。到东城门楼后，由康队长下令举行了分列式，以示抗议。当天晚上，又举行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紀念会。会上有报告及话剧、歌咏、诗歌朗诵等节目，气氛十分热烈，表达了学兵队员们的抗日决心。

西安东城门上集合的这一群抗日爱国青年，早就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被称之为“红色大本营”。他们派密探化装成车夫小贩，日夜巡逻监视。

四、西安事变时的学兵队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多次苦谏蒋介石放弃“安内攘外”政策，提出一致抗日的要求，均遭严厉斥责。蒋最后进行摊牌，提出或者“剿共”，或者东北军调福建，十七路军调豫皖，限三日回答。这是张、杨绝不能接受的，迫使张、杨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动了逼蒋抗日的军事行动。

学兵队员是西安事变的目击者，参加者，并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受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最深刻最实际的教育和锻炼。

“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紀念会后，卫队二营另有任务，要学兵队“自己保卫自己”。12月11日，每连每人都发了百发子弹、手榴弹，班配机枪，12日凌晨前紧急集合，一、四连成散兵线布置在东城墙上，面向城内构筑单人掩体。后

来又命令如果看到宪警向我逼近时就开枪射击。大家严阵以待。拂晓前，城内响起阵阵激烈枪声，不久就停止了，似乎没有发生特别激烈的战斗。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在猜想。早晨8点钟左右，从小东门开来几辆卡车，坐着二营的战士。说是蒋介石被扣了，同学们立刻沸腾起来。“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向二营的战士致敬”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着大家议论纷纷：对蒋介石该怎么办？绝大多数主张公审蒋介石，枪毙蒋介石。也有少数人说，为了团结抗日不能杀。随即看到《西京民报》的号外，上面发表了张、杨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消息，公布了张、杨的八项主张。大家更加兴奋，认为久已渴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这天终于快要来到了。上午，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蒋介石已被送到新城去了，十七路军把蒋介石的十几名高级将领全部扣押在西京招待所了，国民党的几十架飞机和飞行人员全部扣留了，西安警察大队和宪兵团全被缴械了，国民党省党部已被抄了，大家又是一片欢腾。下午2时，孙铭久来作报告。他介绍了活捉蒋介石的经过后，郑重宣布：学兵队的训练生活即将结束，全体队员立即准备接受新的任务。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天晚上，学兵队员们又请参加临潼捉蒋的辛德义、陈志孝和张化东详细介绍捉蒋的经过和打死杀害北平爱国青年的刽子手、原宪兵三团团长现任蒋介石侍从武官蒋孝先的经过。讲的人讲得兴高采烈，听的人听得津津有味，直到吹熄灯号时，还不愿走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2月12日，就在这种兴奋欢乐的气氛中度过了。

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全体队员都接受了指定的任务。有的去接收电台、报社、邮电局；有的派去军警督察处清查国民党别动大队和逃散的宪警人员；有的去接收国民党的档案；有的去看管被扣押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被扣留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有的协同西安各城门站岗部队，检查可疑行人。很多同学到街头，宣传张、杨的“八项主张”。学兵队员还组织了一个合唱团，到广播电台演播抗日救亡歌曲。李伟、梁彦、伊洪、王随蓬、程牧、孙毅人、刘杰等参加以张寒暉为团长的“一二·一二”话剧团，除在西安公演外，还到红军驻地三原演出。在演出王林编写的《火山口上》时，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和英国记者贝特兰也来观看，同观众一起热烈鼓掌。贝特兰还到后台访问演员和剧作者。

在西安东城墙下，有一处大院，叫平民新房，是中央军的俘虏收容所，那里关押着400多名红军西路军失败时的流散人员和妇女小孩。何畏之、王建中、谷小波等同学协同卫队二营将他们释放，向他们宣传了西安事变前后的情况和红军已同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消息，宣布他们已经获得自由。王屏、尹先炳、魏园运、郭根堂、黄生科等当即参加学兵队，编入三连。30多名十几岁的少年，组成一个小宣传队进行演出宣传，其他同志和家属后来由“东救”送回陕北。学兵队的这些活动，对于宣传张、杨“八项主张”鼓舞人心，维持社会治安、清查坏人、保卫胜利果实等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国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形成极

其紧张复杂的局面。南京方面，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12日下午南京派了30架飞机飞往西安上空，既是示威也是想把蒋介石置于死地，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反对讨伐，力主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同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西安方面，张、杨联共抗日，逼蒋抗日的主张是一致的，但他们的部下和社会各界人士认识不一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2月16日何应钦下令“讨伐”，数十万大军开进潼关，并派飞机轰炸渭南和赤水车站，局势突然紧张。面临着这种复杂局势，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纵观全局，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6日晚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到达西安，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同张、杨举行会谈，取得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致意见。同时，对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和中下级军官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对待不同意见的人，反复耐心地进行说服。当时，在西安工作的地下党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缺乏思想准备，认识也不一致。周恩来亲自找地下党同志谈话，传达中央指示，共同分析形势，统一思想认识。周恩来找东工委宋黎和西北特支谢华作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传达和解释了党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阐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应服从民族矛盾的道理，要求地下党的同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全力以赴，所有在东北军和西北军中工作的同志都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说服群众，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学兵队的多

数同志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缺乏认识，思想较混乱，派到临潼接受蒋介石电台的人员，自行办了个“雷电社”，以极左的观点向国外发布消息，引起周恩来严重关注，责成宋黎查明制止。宋黎向学兵队党组织传达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关于和平解决西安问题的指示，并请博古给东北军中的3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作报告，阐述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关系。学兵队中的党员骨干有20多名。党员听了传达后，经过学习讨论，开始认识到中央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现在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的矛盾，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蒋介石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但他更接近英美帝国主义，英美同日本在华利益发生矛盾，蒋介石抗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西安事变中虽然扣留了蒋介石，但他的军事力量并未受到损失，如果把蒋介石杀了，不但不能停止内战，反而会使何应钦等亲日派利用南京统治机构，发动更大的内战；不但不能抗日，反而会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进一步侵略中国的便利。因此，我们应当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逼蒋抗日。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同意抗日，就可以将他放回。这是全国的大局，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不管遇到什么复杂局势，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住这个大局。大家的认识提高了，思想统一了，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全力以赴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西安事变最后终于和平解决了，为中国革命开创了新局面。

五、抗日宣传大队

12月14日，西安方面正式宣布撤消西北“剿匪”总部，停止一切“剿共”工作，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下设政治处，应德田任主任。政治处内设组织、宣传、民运、总务等科。罗瑞卿化名罗谷光任政治处的民运科长。当时，国民党派到东北军的政训人员已被扣留，政治处决定组织抗日宣传大队，取代国民党的政训人员。军设大队，师设中队，团设宣传员。学兵队员大部分被分配到抗日宣传队，并组成五个大队。何畏之、赵天野、王建中、侯晓岚、李正南分任大队长，同时任党总支部书记。师设党支部，各师支部书记有方惠德、曲及先、丁光、宁风岐、王克奎、王远音、吴山等同志。宣传队员一律穿军衣、扎武装带、配紫边胸章，无军官阶衔。宣传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西安事变”的意义和张、杨的“八项主张”，宣传“三位一体”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等。宣传队出发前，罗瑞卿作了“怎样做政治宣传工作”的报告，列举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一些实例，对大家的教育和启发很大。宣传队到达部队后，东北军各级官佐和士兵，认为是张学良将军派来的，所以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宣传队的工作重点首先放在争取中上层军官上，以利于进一步深入到部队中去。宣传的方法多种多样，诸如与各级军官谈心，交朋友，利用到部队巡视之机进行讲演宣传，组织连队文书写标语、发传单、出

墙报，帮助士兵写家信，教官兵唱抗日救亡歌曲等。有的还在附近农村中向群众宣传抗日。东北军广大官兵看到这些青年宣传员同国民党派来的政训人员完全不一样，没有架子，能说心里话，所以普遍表示欢迎。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决定建立一支新军，名为抗日先锋总队，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孙铭久任总队长，赵龙滔任参谋长，陈再励任政治处主任。下设三个支队，相当于团。一部分学员分配到抗日先锋队工作。有的同志担任了支队政治处主任、政治指导员等职务。当时张学良还将三个警卫营合并成立了一个特务团，孙铭久任团长，少数学员分配到这个团工作。

宣传队在部队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做了大量的政治宣传工作，宣传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之在东北军官兵中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在当时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扣押、军心不稳的情况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后来的抗日战争也起到了播种的作用。

六、青年训练班

张学良将军根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轻信蒋介石口头接受了六项条件，就于12月25日下午亲自把蒋介石送回南京。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审判扣押。并调集大军向陕西推进，引起东北军、十七路军和西安各界人士的极大震惊。当时西安方面最关紧要的问题是加强内部团结。但东北军少壮派中的少数极端分子，不顾大局安危，

不遵守三方决议，于1937年2月2日，将王以哲将军杀害，导致东北军内部分裂，使局势急转直下。由于“二·二”事件的发生，东北军元老派痛恨孙铭久，进而迁怒于学兵队，因而把西安事变后派到各军、师、团做政治宣传工作的学兵队员赶出部队，学兵队员陆续撤到邠州待命。其中几十名学兵队员，路经红军驻地三原云阳镇时，纷纷要求参加红军。当时在西安的刘澜波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情况，周恩来转告前线红军指挥部，说服大家回东北军工作。杨尚昆亲自做说服工作，他指出：在当前情况下，我们派人到东北军工作很不容易，你们在东北军中工作了一段时间，已有一定的基础，党要你们回东北军工作。于是大家离开云阳镇，经淳化、枸邑、翻山涉水到达联军总部所在地邠州。先期到邠州的宋黎为了保存学兵队这支进步力量，以“东救会”名义，向东北军各军、师将领发表宣言，力陈学兵队员是东北家乡子弟，是张学良将军训练的抗日学生，对他们要悉心爱护，不应歧视，更不应排斥打击，澄清了一些人的糊涂认识。2月中旬，通过上层统战关系，将撤回的200余人改编为青年训练班，组织他们学习，实则是保护起来。这就是成立青年训练班的背景和缘由。

青年训练班由洪钊任主任，郭维城任副主任，下分三个中队，十几个班。青训班成立后，东工委考虑到西安事变后，党组织经过几次变动，原先的组织系统已经打乱，横的关系发生较多，需要重新调整；又鉴于多数党员入党不久，对党的基本知识缺乏了解，有些党员在“二·二”事件的突然袭击下，思想混乱，组织纪律也出现涣散现象；加

之当时白色恐怖又有卷土重来之势，党的活动要更加机警隐蔽，因此，决定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首先建立了党总支，李震任总支书记，任志远任副书记，赵天野、郑里坚、张岗为委员。总支部下设七个支部（内有一个军官支部）分别由王西萍、何天鹏、李都、汪洋、徐锐林等同志任支部书记。同时向党员进行形势与任务的教育，组织党员学习《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和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讲话等文件（这些文件是西安事变后由《西京民报》秘密印刷的，有的是当时油印的）。在组织整顿中，开除了携党费潜逃的原支部书记张勉出党，给两名严重违犯组织纪律的领导干部以警告处分。经过这次整顿，提高了党员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加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纠正了一些错误思想倾向，增强了党的战斗堡垒作用。不少同志说，这是入党以来受到的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此期间，还发展了一批党员。当时在青训班还成立了“俱乐部”，组织并选举产生了“俱乐部”常务委员会。党组织提名的王建中、罗立斌、尚效飞等同志都当选为常委。为了加强党对俱乐部的领导，在党总支的领导下，成立了俱乐部党团（党组），袁心纯任党团书记，党团成员有张岗、尚效飞、罗立斌等同志。俱乐部经常组织学员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下乡进行社会调查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文艺宣传活动，如出墙报、唱救亡歌曲、演出话剧等。政治教官孔叔东、李梦龄还给全体队员继续讲授《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近代史》等，对提高学员的政治理论水平有很大的帮

助。邠州青年训练班从成立到改编，约有一个多月时间。

七、军官差遣二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甲案，即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公路一线，十七路军移驻泾渭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蒋军进驻西安。这虽然远不如西安事变形成的“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三方团结一致，还能够保存联合抗日的局势。但是蒋介石采取分化拉拢的手段，利用“二·二”事件，极力破坏“三位一体”，东北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转而接受了乙案，即东北军移驻安徽淮河流域，“三位一体”就这样被破坏了。1937年3月中旬，东北军陆续东开，青训班也随军东开，到了咸阳后，为了避免遭受国民党的迫害，改编为军官差遣二队，少数人到蚌埠后编入差遣一队。这时，东工委已决定改组，刘澜波、宋黎身份已经暴露，调到北方局东北特委工作，东工委改由项乃光（后叛变，当了军统特务）、高锦明组成，均随军到安徽蚌埠。差遣二队于4月间到安徽，住在怀远县淝河镇。队长李树庚，下设3个分队，12个班，人数约200人，总支书记李震调走后，任志远任总支书记。总支部下属支部没有变动。这时，形势变了，环境变了，队员实际处于待命分配的状态。但党仍然坚持领导和组织全队，利用俱乐部这个公开组织，组织读书会，进行理论学习；运用出墙报、歌咏、话剧等形式，积极进行抗日宣传，鼓舞

大家的革命斗志。当时怀远县城有一所中学和师范学校，党组织队员同中学生进行过几次联欢，演出一些具有抗日内容的节目，在学生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党组织还布置党员密切联系当地群众，要求每个党员在群众中交几个朋友，开展群众工作。此时又发展了一批党员。

5月中旬，邢英在淮河游泳时，不幸溺死。他是学兵队中年龄较小的一个，平时积极活跃，具有坚强的抗日意志。壮志未酬身先死，引起大家深深地悲痛。党组织了一次具有政治内容的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各班都送有挽联。当尚效飞致悼词时，全场痛哭失声。王建中写了“哭邢英”的七言绝句：“失地亡家怨恨多，请纓无路奈若何！东流淮水皆含泪，屈子遭风逐逝波。”表达了大家的悲愤心情。会上国民党一个特务也受到感化，他痛哭流涕地坦白了自己的罪过，认为大家是真心抗日的，自己愿意共同抗日。追悼会后，全队举行抬棺游行，在《五月的鲜花》歌声中，将邢英葬在遍开石榴花的涂山之麓。这次追悼活动，上海、北平、天津的报纸都作了报导，引起群众的极大同情，但也暴露了差遣二队的政治面目，更加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1937年5月，蒋介石勒令解散差遣二队，东北军学兵队自1936年9月成立以来，三经改编，历时10个月，至此结束。

八、学兵队员的去向

学兵队是在中国革命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成立的，在党的领导下，培养成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它既是改造东北军的骨干，又在斗争中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在被解散后，人员虽然分散了，但革命意志没有动摇，在各条战线上，为党的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学兵队的去向，大体可分三个方面。

一是到延安。在“二·二”事件突然发生后，派到东北军做宣传工作的一部分同志，由于种种原因去了延安，约有三四十人。怀远差遣二队解散后，由党组织介绍去延安的有凌旺（林山复）、杨恬等人。

二是分配到东北军工作的约百余人。由于部队分散，东北军各军师的工委就分别改由所在地的各中央局、分局、省委领导。曾担任过东北军各军、师工委领导职务的有：四十九军工委书记杨西光，委员谢东屏、赵天野；五十一军工委书记王西萍，委员徐锐林；五十三军工委委员郭峰、张桂；六十七军工委书记李震，委员冯启贤、王克功，任志远、郑里坚、谢东屏、李都、丁彦等先后到该军工作过；谷牧先到六十七军，后到五十七军；五十九军工委书记曹建华，随即改为两个师工委；百十二师工委书记先为吴山，后为谷牧，委员有曲径、郭儂等；百十一师工委书记张苏平，委员为曹建华、王振乾等。骑兵军建立了党支部，许光庭任支部书记。其他同志分别担任师、团营总支、支部工作

或党的交通工作。他们都以普通军官或士兵的公开身份为掩护，进行艰苦危险的秘密工作，并发展了一批党员。直到1940年根据党中央指示陆续撤出。

抗战爆发后，东北军参加了上海、台儿庄等大的战役及一些中、小战役，表现出英勇不屈不怕牺牲的抗日精神。在这些部队中原学兵队的党员和新发展的党员，他们中有些英勇牺牲了。

三是分配到华北各地工作。差遣队在怀远遣散时，北方局曾派宋黎到怀远安排队员去向。当时华北抗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急需一批干部。除有条件留在东北军工作的队员，分别到东北军各部队外，其余调回北平，“七·七”事变前后，陆续分到华北各地。王宿人、王曙天、高毅、冯良骥、于之、白洁等30余人去山西牺盟会工作；张化东、翟亚夫、陈忠一、陈明、罗平、金雪松、武诚、冯凯、刘景平、傅聪敏、胡伊、庄彝尊、王文、霍志德、霍炎、解方平、包乾等20多人到绥远工作；张加洛、陈琳瑚、丁光、汪洋、韩去非、谭灵光等10多人去山东工作；王建中、藏超羸、金振中、杨耀生、尚英、杜伯华、王达、李望东等20余人到平西工作；康鸿泰、张折、吴铎、高福来、伊洪、孙静、邹宝酿、张效臣、王雷、程志刚、罗铁军、刘杰等到石友三部工作；还有少数同志留在北平工作。

学兵队的同志们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不断成长，在各工作岗位上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左纵队 全部经过了青海班玛地区

张世华 索 南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一部分部队曾经经过青海省果洛班玛地区，这是一段过去鲜为人提到的史实。几年来，经过青海省一些同志的积极努力，挖掘出不少史料，使这段史实的脉络和轮廓变得清晰了。红二方面军经过青海的情况已基本搞清。^①最近两年，我们又发现了不少有关红四方面军左纵队和部分红军领导人经过青海省班玛地区的史料和其它佐证。这些材料说明：1936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由甘孜等地北上向阿坝、包座挺进时，左纵队全部都经过了青海省的班玛地区。

1936年7月2日，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率领的从湘鄂川黔根据地长征的红二、六军团在甘孜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的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所属二、六军团的番号不变。三十

^① 参见《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班玛地区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1984年《青海党史通讯》第4期）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青海省果洛地区专题资料》（中共青海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撰写）。

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编入二方面军的建制。7月初，二、四方面军北上与党中央会合。四方面军的部队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今金川县）等地出发北上，向靠近甘南的包座、班佑一线前进。左纵队由朱德、张国焘指挥，于7月3、4两日从甘孜、东谷等地出发北上，取道青海果洛班玛地区，向川北阿坝地区挺进。二方面军先后随左纵队四方面军部队之后跟进。^①左纵队由三十军、骑兵独立师、红军总部、总部五局、四军十师、十一师、西北局党校和三十二军组成。左纵队的先遣军由三十军八十九师、骑兵师和红军总部五局（教育局）组成，由李先念率领于6月下旬已从甘孜出发，任务是为左纵队后续部队筹集粮食和探查道路。7月1日，先遣军在色达筹得一批牛羊后，从色达的日清沟出发，继续向西倾寺前进，2日到达西倾寺。7月6日，六军团从东谷出发，到日清沟会同三十二军北上。8日，朱德、张国焘率部向西倾寺开进。11日，二军团从东谷出发北上。12日，左纵队先头部队在李先念率领下到达青海省班玛县作木沟。同日，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经唐摇沟（唐牙，今班玛县知钦乡第三牧委会牧场）于是日到达西倾寺、鱼托寺。以后，进入青海班玛县，过玛可河，经绒玉（今班前乡）、王楼（今王柔）、哑公寺（今亚尔堂）、作木沟等地，于7月22日到达阿坝。二方面军总部率二军团，继六军团之后经西倾寺，7

^①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第一卷第294页，《红四方面军战史》（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史》（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

月 22 日到绒玉，26 日到阿坝与六军团和三十二军会合。

从 1936 年 7 月 3 日李先念率领的先遣军进入唐摇沟起，到二军团 7 月 26 日到达阿坝与六军团和三十二军会师止，左纵队同二方面军大部队在青海省班玛地区活动时间大致有 20 至 22 天。行军的大致路线是：唐摇沟→西倾寺→鱼托寺→绒玉→王柔→亚尔堂→作木沟→阿坝。^①

左纵队经过青海班玛地区的大体人数，我们也依据有关史料作了探讨，二方面军三个军约 15000 人，^②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十师、十一师、骑兵独立师、西北局党校、红军总部、总部五局约 10000 余人。^③总计约 25000 余人。

左纵队北上向阿坝、包座前进时，全军都经过了青海省班玛地区。

还有如下史实根据：

1、朱德、张国焘 1936 年 7 月 13 日 17 时给徐向前的电报中说：“先念率八十九、骑兵两师昨到作木沟，明（14）日可到达阿坝。”“六军今到绒玉，已无粮，二军明（14）日由东谷出发，每人带有十天干粮。”“左纵以一部出阿坝西北或由齐哈马过河打牛厂，实有必要。”^④

这封电报中的“作木沟”是今班玛县江日堂、班前、灯塔三乡的牧场。“绒玉”是今班玛县的班前乡一带（解放后曾是任玉区），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这两地都是班玛地区的腹地。这封电报充分说明，左纵队中的四方面军、红军

① ②③参见梁慧荣《三大主力会合时的人数为什么有两种说法》，《党史研究》1985 年第 6 期。

④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

总部和二方面军经过了班玛地区。

2、傅钟在《飒爽英姿，永垂军史》^①一文中说：长征途中，廖承志兴致勃勃地为傅钟画了头像，并写上了时间、地点。书中还刊载了这幅画。画的右下角写有“11、7、1936于绒玉”。经查，画中的“11、7、1936”是采用西方人书写时间的方法写上时间的，即日月年的顺序书写法，应是1936年7月11日。傅钟当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廖承志因受张国焘迫害打击，随红军总部一起行动。这张画像证实，红四方面军总部中的一部分和红军总部到过班玛的绒玉地区。

由于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经过青海的史实已经弄清，从下列事实中，可以印证四方面军的左纵队经过青海的事实。

1、当时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张子意在《长征日记》中记载：1936年7月21日“我军到达离阿坝50里地之山下露营，三十军同志送牛120头来。”7月23日，“我三十二军及十七师、模范师均到达。十七师、模范师因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带、臭尸，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200人。”关于“臭尸”，张子意在日记中的注解中说，是“指先头部队宰马为食，剥去皮肉，留下骨架已发臭。我部取骨架上的残肉而食之。”这两处记载都说明在作为二方面军先头部队的六军团和三十二军之前，还有其它部队走在前面，即左纵队的

^① 见《廖公在人间》，中国新闻社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其它部队，同时也说明六军团、三十二军、二军团和二方面军总部是跟随左纵队中的四方面军的行军路线前进的。

2、肖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一文的第五部分《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中说：“四方面军大队走前面，对后面虽然有照顾，但他们人多，很难顾及……”这也清楚地说明，二方面军的行军路线是跟随四方面军的路线前进的。

3、据《朱德年谱》记述：1936年7月3日，“朱德、张国焘率领的由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一师和第三十军八十九师以及红一方面军的第三十二军组成的左纵队从甘孜地区北上，红二、六军团沿左路纵队行进路线前进……”这说明，二方面军是随左纵队中的四方面军的行进路线前进的。^①

除上面这些根据之外，还有一些材料中也反映了左纵队北上途中经过青海的情况。这些材料是：陈伯钧的《长征日记》、许世友《第三次过草地》（刊于《回顾长征》）、吴先恩《朱总司令来到红四方面军》（刊于《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下卷）、《长征在雪山草地》（170—171页，四川省阿坝州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红军长征在四川》（307—308页，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纂）和《四川党史月刊》1988年第9期等。

红军左纵队之所以由川康边境挺进青海南部的班玛地区，是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马步芳在果洛地区仅有一

^① 《朱德年谱》第152页。

个骑兵团和一些藏族部落武装驻防，兵力比较分散，对红军的行军构不成大的威胁；二是班玛是果洛地区最大的农业区，也是川康青边境地区主要的产粮区之一，便于解决部队筹粮问题。当时二、四方面军这样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兵团实行战略转移分几路纵队进军，既便于机动灵活，又便于筹粮，解决给养困难。左纵队到达西倾寺以后，吃粮已很困难。只有向北进入青海班玛地区，边筹粮边前进。

五大至六大期间山西省党的组织状况

赵 朴

党的五次大会后，中央常委于1927年5月14日讨论了山西党的工作。此后由于马日事变发生，随之武汉国民党中央步步走向反动，进而于“七·一五”清党反共，党中央无暇顾及山西的工作。直到7月中、下旬，山西临时省委才向中央作了一个报告，要求中央派能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才到山西省委工作，与山西临委建立每月一次的固定交通关系。中央在审查了山西临时省委的报告之后，于8月4日指示山西临委“注意秘密工作”，指出党在全国已处于“白色恐怖下，再不注意全部组织及工作，必致完全倒台”。关于派指导人才去山西工作问题，中央答复“一时尚无适当人，有时再派”。中央还指示：“军事工作亦应本着独立政策，不可专赖可利用之军队”，“应注意于武装工农，创造自己武力之工作”。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后，8月11日，中央常委在讨论北方工作、确定北方局的组成人员、辖区、任务、驻地等等的同时，决定“山西应成立正式省委”，归北方局管辖，并仍应向中央报告工作。9月上旬北方局成立之后，也一时无暇顾及山西。直到9月下旬才决定给山西临时省委写信，

要其派省委负责人到北方局来商谈工作，并准备进行改组。

据山西临委报告，到9月底，山西各地党的组织状况如下：祁县——1926年即建立了特别支部，1927年5月，省委派人进行了整顿，党员成分：小学教员占2/3，农民占1/3。介休——过去只有青年团的组织，没有党的组织，也不大注意发展党的工作，不久前由团员中介绍了若干人入党。霍县——党的组织在山西省来说是历史最早者之一，不久前已进行了改组，提拔了新同志负责。赵城——党组织较能领导群众斗争，但也没有注意于党的发展。不久前省委派人去整顿。党员中农民成分占2/3。洪洞——党员的质量不十分好，活动力量薄弱，不久前已派人去整顿和发展。平阳——为晋南中部的政治中心，阎锡山反动后被捕十余人，一些人失踪，现在的负责人比较幼稚。翼城——不久前派人去整顿。夏县——过去在无政府主义者势力之下，不久前已建立和发展了党的组织，正准备大的发展。河东、猗氏、安邑有党员若干人。晋城——工作较有头绪，党员质量也比较好，国民党党部、工会、县农民协会和学生联合会都在党领导之下，阎锡山反动后也受了相当损失。长治——过去没有多少工作，仅在学生中间有些活动，所以在国民党清党中没有受什么损失；国民党党部和党员也能听我们的指挥。屯留——党员质量比较好，对农民有相当的组织。离石——党的历史较长，5月间派人去工作，已有了头绪。汾阳——因负责人的问题，工作未能开展。定襄——党的工作较有头绪。阳泉——是山西最大的工业区，共有党员若干人在这里工作。此外：临县、文水、太谷、平遥、

安泽、交城、垣曲、汾西等县均有相当工作。忻县、襄陵、绛县、高平、襄垣、平定、万泉、解县、新绛、曲沃等县，党员均不到 10 人。

1927 年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实行全国总暴动。同月，山西省委派代表到北方局汇报工作，于 15 日写了书面报告。报告列述了从党的五次大会到 10 月这一时期中山西省政局变化和斗争情况以及工人、农民运动的发展状况和趋势。对于今后工作，报告提出：“在党的方面要赶快成立各路的特委，指挥附近工作，在斗争的过程中来发展党的组织。”12 月 4 日，中央常委讨论北方工作，通过了一个《中央北方工作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党的组织之健全与发展是最重要的。工农分子仍应继续提拔于各指导机关，党的基础应确立在工农成分之上，党内讨论应继续发展，党内民主化应继续扩大，务使党员群众真能积极起来，管理党务，监督指导机关。另一方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知识分子的极端民主化的要求也是不能容许的。”“山西目前任务是即须派一中坚分子携带党的一切新精神前去改组党部，扩大民众运动向阎锡山取进攻之势，……”

大约是 1928 年 1 月上、中旬，中央北方五省巡视员蔡和森决定了一个《山西工作方针》。“方针”认为：“组织与领导此广大的不满的工农群众不停的为着目前的争斗进而至于发展工农群众的大暴动，完全推翻阎锡山的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是山西党部一般工作的总方向。”关于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方针”要求：“党的工厂支部和

党团应在其中起很好的领导作用”；强固村农民协会，“党的村支部及党团应在其中起很好的指导作用”。关于党的组织工作，“方针”指出：“山西党部已经有五年以上的历史，……山西负责同志反映群众的革命情绪，素来有一种‘蛮干’的倾向，与其他党部的书生习气不同”；但在被北方区屡次斥责之后消沉下去了；“所以现在肃清过去北方区机会主义的影响是重要任务之一。同时过去由北京党所输入之组织上的机会主义毛病（机械的纪律，宗法的伦理，学院式的教育训练等）亦应彻底铲除。”《山西工作方针》还强调：“在每一斗争中（无论大小）尽量地吸收最革命的工农分子入党是非常之重要的。一切阻碍组织发展的不正确的观念，皆应极力铲除。”“发展党内的讨论，使党员群众尽量批评过去一切错误，遵照新方针改组一切党部指导机关，最革命的工农同志尽可能的负担或参加指导工作。自小组支部以至省委负责人一律由（党员）群众代表会选举，除非目前组织很弱或全无基础的地方之外，一律废除委任指派制。这是目前组织上的重要任务之一。”

为了贯彻 11 月中央扩大会议的新政策，山西临委于 1928 年 2 月 11 日在霍县召集了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新政策，决定了山西工作的方针，并改组了省委。选举王世益（印刷工人）、杨高五（兵工厂工人）、彭芳（织布工人）、李旺（鞋匠工人）、邓国栋、关广荃、王鸿钧（三人均为知识分子）7 人为执委，并推定王世益为书记，王鸿钧为出席党的六次大会的代表。会议决定：不参加工农运动的同志不能担负指导机关的责任；各级指导机关的组

成以工农分子过半数为原则。会议还决定并开除了过去数月间回到家乡不做工作的干部分子 20 余人。

山西临时省委认为：“山西的党在过去完全建筑在知识分子和小手工业工人身上，无产阶级分子（如兵工、铁路、矿工、纱工）就没有注意到。所以党的成分以及指导机关一直到支部，完全是小资产阶级分子，形成党的机会主义的浓厚色彩”。“领导工农斗争，大多半不在自己的口号之下，到现在还是在白色恐怖的国民党旗帜之下。”因此，山西临委认为，为要执行中央扩大会议决定的新政策，“当然先要从组织上洗刷动摇不定的分子，发展工农分子，改造党的各级机关”，“将党的权力放在工农的肩上”。临委并具体规定：（一）根据中央扩大会议决议案改组党的各级组织；（二）洗刷机会主义的以及动摇不定的分子，扩大和发展党的工农和士兵成分；（三）在新政策之下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四）将全省划为祁（县）介（休）、赵（城）霍（县）、河东、太原、离（石）汾（阳）、晋城、阳泉等 7 个暴动区域，并以祁介区为中心，各区组织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五）各级组织应按时开会；（六）征收党费；（七）党的一切政策要从下级讨论起；（八）切实分配每个党员以适当工作。

到 1928 年 2 月底或 3 月初，山西临时省委下正式的和临时的县、市委共 39 个，党员共计 709 人。市、县委中较健全能活动者为太原、定襄、离石、汾阳、祁县、介休、霍县、赵城、平阳、翼城、夏县、猗氏、安邑、河东、阳泉、晋城、长治、屯留、汾西、芮城等。据不完全的统计：太原有工人党员 300 人左右，介休有党员四五十人，赵城、霍

县一带有七八十人，安邑、交城一带有三四十人，离石、晋城各有十余人。

山西临委霍州扩大会议之后，2月底或3月初，王鸿钧作为山西省出席党的六次大会的代表，偕同省临委派赴中央的交通汪铭赴上海。在他们离开山西不几天，山西临委就遭到破坏，省委委员杨高五、关广荃、邓国栋、王世益均被捕去。王鸿钧、汪铭在赴上海途中，在开封从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后，王鸿钧决定回山西临委去主持工作，由汪铭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王鸿钧并于3月11日写了一封信，交汪铭连同临委其它文件一起送呈中央。

3月中旬末或下旬初，汪铭到达上海，向中央报告了临委被破坏和几个委员被捕等情况，要求中央：（一）将“一切通告文件补发山西”；（二）与山西建立交通关系，或将发给山西的文件一并交给河南省委，由山西临委派人去取，以节省经费和时间；（三）关于山西工作，“要求中央给一方针”；（四）“派有暴动经验的同志到山西参加指导机关”；（五）山西党内有一些过去重要的及负省委工作责任的党员表现“怠工”，如何处置，请中央“加以指示”；（六）给山西临委拨发经费，以便开展工作，“山西新成立各特委一切建设与用具如油印等”也需要经费以“备办一切”。汪铭强调：“关于山西经费问题，要中央特别注意，因为山西也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域。”

中央在审查了山西临委的报告并与汪铭谈话之后，于3月26日写信给山西省委，指出：“据你们的报告，你们预备把全省划成几个区域，每个区域设一特委指挥暴动，鸿

钧同志的来信更说准备把省委移到介休去指挥暴动。中央认为你们这种决定错误了，你们显然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山西党的任务，不是暴动，而是依据工农群众的切身要求领导他们斗争，在斗争中建立他们各自的组织，“并进行工农武装之建设，在斗争中扩大并改造党的组织”，以“造成暴动的群众基础”。中央指示：加强太原、祁介、赵霍等重点区域的工作是对的，但是，“在每一个区域斗争尚未广大发动的时候可以^不组织特委由省委指导更较正确”。中央肯定山西临委“在组织上能够多提取工农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工作，改造了各市县党部，这种精神是很好的。”同时也指出：“党的改造须从斗争中随时完成，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所以以后你们仍要注意在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党的组织，改造各级指导机关，使党成为工农斗争的勇敢的有力的领导者。”中央还指出：“至于知识分子因这种改组而有表示‘怠工’的，当然是不好的现象。因为中央不明白详细情形不能决定具体的办法，但认为党的处置可分别来说：如果是为机会主义辩护而不接受新政策实行新政策的，省委当坚决的与他们奋斗，最后不能改变则执行政治纪律；如不是为机会主义辩护同时又接受新政策，而只是由于个人问题或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上的原因，则省委应当先采取教育训练的方法去纠正他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犯机会主义的多，而且容易犯机会主义，这是对的；但反机会主义不能就是反知识分子，这条也须分开。”关于派干部及经费问题，中央说明：“派人来参加省委指导机关，中央因为有激烈斗争的省份负责同志牺牲于白色恐怖之下

者过多，无人可调来山西，即临时巡视员暂时亦无法可派。经费因中央种种困难不能按时寄来，预支尤绝无可能，望你们从农暴中谋经济的独立。”

王鸿钧由开封返回山西时，已是3月底。由于杨高五身上带有全省党组织通讯地址未及时毁掉而被搜去，各地组织相继几乎全部遭到了破坏。因此，王鸿钧从运城一直到达霍县才接上头。到霍县后，王鸿钧与县委书记杨振华商议的结果，决定杨振华去太原找人。不久，太原书记阎念先到霍县，王鸿钧才了解到省临委及各地组织破坏的情况。王鸿钧、阎念先、杨振华以及霍县新书记李光杰开会商讨之后，决定恢复临委组织，并拟了一个7人的临委组成人员名单：王世隆（印刷工人，从顺直派回山西者）、王鸿钧、阎念先、汪铭、秦晋翰（榆次工人）、赵炳一（学生）、杨活心（农民），并决定王世隆任书记。4月，汪铭由上海返回山西之后，进一步决定一面将名单连同详细工作报告交赴中央之交通周凉芳，送请中央批准，一面发给已恢复的各地党组织征求意见并得到了各地的同意。不久，赵炳一、杨活心被捕，以后表现消极；秦晋翰也因感到过去牺牲太大表现消极而回家，王世隆因为经济上的关系不能到职，实际上只剩下了王鸿钧、汪铭、阎念先3人支持工作。又因为汪铭到各县去巡视，阎念先赴太原，王鸿钧一人留霍县作为省委之中心，3人不能集中在一起。

阎念先到太原后，与杨振华决定重新登记太原党员，但仅登记到工人党员2人，知识分子党员16人。继之组成了一个7人的市委，以赵元（书记）、李探华、杨振华3人组

成常委。6月，济南惨案和因之而起的新的反日运动风潮传到太原，太原市委一周内发出了三次传单，引起阎锡山大肆逮捕，市委常委李探华也被捕去。

更 正

本刊第36辑目录第1页第3行及正文第1页第1行“‘立群电台’文电选”应为“‘力群电台’文电选”；第135页第8行中“1959年”应为“1958年”，特予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平津唐点线委员会》补遗

安 捷

编者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平津唐点线委员会》一书之后，读者给我们来信，反映该书有“遗漏与误差。比如说在1939年夏天燕京大学党支部成立以前，这个学校的革命力量并未停止战斗，有党员和民先队员在进行活动；对于中国大学党支部则根本没有提到……”与此同时，寄来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现将来文略加删节刊登如下，供读者参考。

一、1937年秋—1939年夏燕京大学的民先队

燕京大学在“一二·九”时期开始建立了一支革命队伍。其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民先队员在抗战前分布在这所高等学府的各系各年级中。卢沟桥炮声响后，他们大都纷纷离京，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从1937年秋到1939年夏，在燕京大学继续读书并坚持革命斗争的，有共产党员杜若和一批民先队员。

杜若原名杜含英，是社会系三五届学生，1936年初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燕大党支部委员、该校“左联”党支部书记和民先小队长。1937年秋天，她和一些民先队员商量，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虽然不能像“一二·九”时那样轰轰烈烈地活动，但是，可以进行一些比较隐蔽的斗争。于是又和一些作风稳健的民先队员建立了联系，之后逐渐扩大串联，把一批民先队员组织起来。

1938年春，北平地下党城委派人来和杜若联系。城委通过杜若来领导燕大民先。到1939年春，先后联系杜若的主要是赵元珠，此外还有孙以亮和另一位姓黄（或者姓周）的女同志。

当时，在燕大支持民先活动的进步人士有外籍教授夏仁德夫妇。他们家的客厅往往是民先集会的场所。也有些民先队员曾在国文系主任董鲁安家中接头联系。

从1937年秋到1939年夏，燕京大学的民先队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1) 募捐支援抗日队伍。高天辉、姚克荫听到平西、平北抗日游击队英勇杀敌的消息，就倡议募捐。民先队员们将募集来的衣物、药品等等，通过地下党转交给平西抗日游击队。

(2) 纪念国际妇女节。如女民先队员们在1938年的3月8日的白天和晚上，分别在杜若和冯秉珊的宿舍里，秘密召开小型纪念会。她们怀着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而献身的激情，互相倾诉自己的思想、志愿，并低声地唱《国际歌》。

(3) 利用春假，组织民先及其所联系的进步群众一起

骑自行车到卢沟桥，凭吊抗日战场，抒发革命情怀。

(4) 以基督教团契为掩护进行活动。在日寇残暴统治下，团契是可以公开活动的组织。为了团结群众和掩护自身的活动，民先队员们也单独成立团契，取名“耶稣之友”。并聘请夏仁德夫妇为顾问。他们在夏仁德的小客厅里，座谈形势、研究工作、讨论问题。如他们讨论过：上帝是主张仁慈的，可是日本帝国主义却大举入侵，企图灭亡中国，是异常凶狠残暴的敌人，必须彻底打败日本，才能挽救中国。参加这一活动的除民先队员外，还有李锡智、李培伦、孙贡三等等。

(5) 组织读书会。一种形式是以团契为单位，另一种形式是以宿舍为单位，三四人一组。他们传阅的有艾思奇、沈志远、陈豹隐、河上肇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鲁迅的作品、俄国文学、苏联文艺、美国进步文学，以及介绍苏联和苏区情况的《萍踪寄语》、《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红星照耀中国》等等。

(6) 利用外国通讯社的报导进行抗日宣传。如杜若发现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周报上刊有外国记者卡尔森撰写的有关游击队见闻的文章，就译成中文，在民先队员和进步同学中传阅。曹秉衡更是逐期地仔细阅读《密勒氏评论》的每一条报导、每一则新闻，从中寻找出有关抗战的消息和敌后根据地的情况，按原文摘录在黑板上，加上一个并不显眼的标题。不知者以为是学术通知，却不料它是宣传抗战消息。此外，在一次小型学术会上，当讨论到靠老百姓抗战怎能抵得住敌人的飞机和大炮时，曹秉衡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结合他在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切身体会和感受，以流畅的英语，讲出了为什么只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战胜日本法西斯的道理。

(7) 传阅秘密宣传材料及民先队刊《自学》(民先自1938年改称“自学社”，出版的油印刊物就叫《自学》)。地下党常常将有关的秘密宣传品或《自学》交给家在城里住的民先队员带到燕园，供队员们传阅。《自学》中转载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给队员们极大的鼓舞。

(8) 输送队员去抗日根据地。仅1938年暑假，一次就送走了高天辉等8人。

(9) 举办夜校，联系群众宣传群众。一是继“七·七”前的做法，由民先队员轮流到燕大东门外挑补花工厂，教女工识字，讲八路军抗日杀敌的故事。二是将附近居民中为燕大网球场捡球的失学儿童们组织起来，教识字，讲述浅显的革命道理，如什么是资本家，什么是工人，劳动人民为什么受剥削等，并教女工和失学儿童唱救亡歌曲。

1939年春，杜若因撰写毕业论文，就将男、女民先队员分别交由姚克荫、陈浩联系。直接领导姚克荫和陈浩的是北平地下党城委书记周彬。1939年夏天，杜若毕业后，就由进步的外籍女传教士凯瑟林·霍尔(中文名叫何明清)带领，从曲阳县境进入晋察冀边区，投入了新的战斗生活。

二、中国大学党支部

中国大学党支部成立于1940年上半年。

1939年初，共产党员彭飞入中国大学政经系读书。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团结群众，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直接领导彭飞的是平津唐点线委员会负责人赵普宣（也叫赵非或朱俊）。

彭飞原名彭鸿泉，是1937年5月在唐山南安寨子小学任教时，经王子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到校后，经党内同志的介绍，认识了政经系的进步青年边荫堤。经彭飞的帮助，边荫堤的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于1939年下半年加入了党。边荫堤将他的同班好友、爱国青年傅宗义介绍给彭飞。在彭飞、边荫堤的帮助下，1940年上半年，傅宗义也参加了党。经赵普宣批准，他们三人组成了中国大学党支部，彭飞任支部书记。

边荫堤有两个中学时期的同学，一个叫贺永卿，原籍东北，有亡国之恨，在辅仁大学读书；一个叫蒋颐图，在师范大学读书，在家庭中受其早年参加革命的兄长的影响，思想进步。经过培养，二人于1940年下半年被接收入党。1941年上半年，组织上又将叶辉（原名吴春野，系天津钟纺第六纱厂的原党支部书记）转到中国大学党支部。叶先在北方中学读书，不久转到北新桥一个绣花厂工作。

到1941年上半年，中国大学党支部共有党员6人。其中男5人（中大3人，辅仁大学1人，师范大学1人），女工1人。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书就到旧书摊上去寻找。如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找到后，就秘密地传阅。大家都在各自比较接近的社会关系

中做抗日宣传工作，注意发现政治条件比较好的列为党的培养对象。边荫堤的堂兄任西四北大街小学校长，主张抗日，拥护八路军。他们争取他为革命工作。平西根据地几次派干部到北平办事都住在他的学校，得到他的热情接待，积极掩护。1941年暑假，贺永卿因病回到东北，党支部还有5名党员。秋天，上级领导人赵普宣被捕。他们从此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直到1945年日寇投降后，他们辗转去张家口找到了晋察冀城工部，汇报了他们的情况，要求留在解放区。经城工部长刘仁同意，他们5人留在解放区，并给分配了新的任务。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七辑

作者 =

页数 = 1 0 0 0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